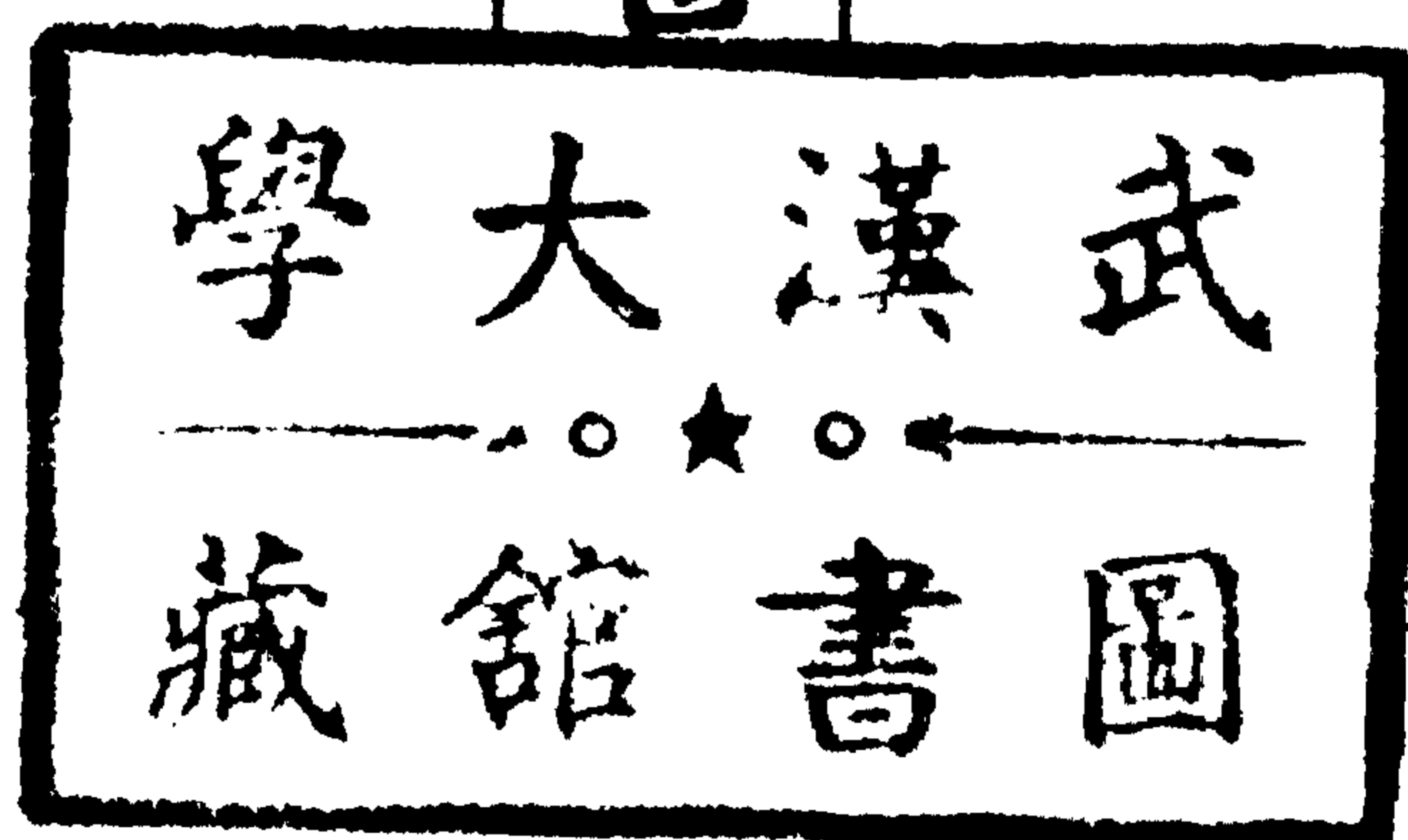


魯迅全集

第四卷

魯迅全集

第
四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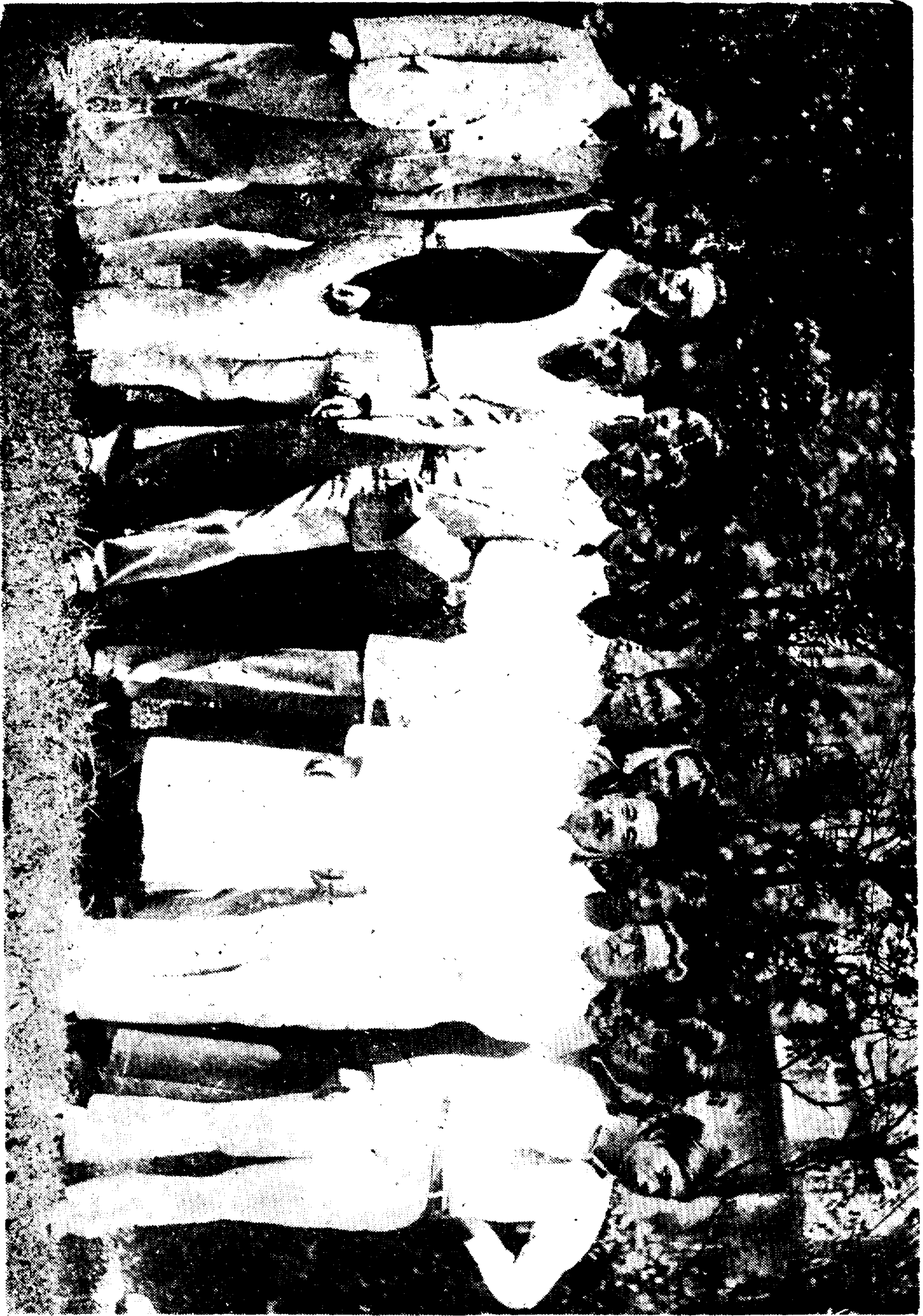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1948



五十歲慶祝會時攝



一八藝社暑期木刻演講會，講師爲丙山嘉吉(自右第三人)先生擔任口譯(自右第五人)

第四卷

三閒集

二心集

偽自由書

魯迅全集 第四卷 目次

三 閒 集

序言……………一五

——一九二七年——

無聲的中國……………三

怎麼寫（夜記之一）……………二元

在鐘樓上（夜記之二）……………三元

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并來信）……………五〇

匪筆三篇……………五三

某筆兩篇	五九
述香港恭祝聖誕	六二
弔與賀	六七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朧	七二
看司徒喬君的畫	八〇
在上海的魯迅啓事	八三
文藝與革命（井冬芬來信）	八六
扁	九七
路	九九
頭	一〇一
通信（井Y的來信）	一〇五
太平歌訣	一二三
劃共大觀	一二五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二八
革命咖啡店	二五
文壇的掌故（并徐勻來信）	二六
文學的階級性（并愷良來信）	二三

——一九二九年——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二六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二〇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二二
『皇漢醫學』	二四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	二五
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二五
柔石作『二月』小引	二六
『小彼得』譯本序（文略，見第十四卷本書。）	
流氓的變遷	二〇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一六三
書籍和財色	一六五
我和『語絲』的始終	一六八
魯迅譯著書目	一八〇

二 心 集

序言	一九五
----	-----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二〇二
習慣與改革	二二七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二三〇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二三四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二三六
我們要批評家	二四三
好政府主義	二四六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二四九

『進化和退化』小引……………二五二

『藝術論』譯本序（文略，見第十七卷本書。）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夜記之五，不完。）……………二五五

——一九三一年——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二六二

柔石小傳……………二六五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二六七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二七〇

上海文藝之一瞥……………二七六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二九三

答文藝新聞社問……………二九五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二九六

沈渣的泛起……………三二一

以腳報國·····	三二五
唐朝的釘梢·····	三二八
『夏娃日記』小引·····	三三〇
新的『女將』·····	三三三
宣傳與做戲·····	三三六
知難行難·····	三三九
幾條『順』的翻譯·····	三三三
風馬牛·····	三三六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三三九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三四二
『野草』英文譯本序·····	三四五
『智識勞動者』萬歲·····	三四七
『友邦驚詫』論·····	三四九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三五二
答北斗雜誌社問·····	三五三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井Y及T來信）	三五
關於翻譯的通信（井J・K來信）	三六〇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文，井附記）	三八三

偽自由書

前記	四一九
觀劇	四二三
逃的辯護	四二五
崇實	四二七
電的利弊	四二九
航空救國三願	四三一
不通兩種	四三四
【因此引起的通論】：「最通的」文藝（王平陵）	四三六
【通論的拆通】：官話而已	四三九
賭咒	四四一

戰略關係	四四二
【備考】：奇文共賞（周敬儕）	四四四
頌蕭	四四六
【又招惱了大主筆】：蕭伯納究竟不凡（大晚報）	四四八
【也不佩服大主筆】：前文的案語	四五二
對於戰爭的祈禱	四五三
從諷刺到幽默	四五六
從幽默到正經	四五六
王道詩話	四六〇
伸冤	四六三
曲的解放	四六七
文學上的折扣	四七〇
迎頭經	四七三
『光明所到……』	四七六
止哭文學	四七九

【備考】：提倡辣椒救國（王慈）	四八二
【硬要用辣椒止哭】：不要亂咬人（王慈）	四八三
【但到底是不行的】：這叫作愈出愈奇	四八五
『人話』	四八七
出賣靈魂的祕訣	四九〇
文人無文	四九三
【備考】：惡癖（若谷）	四九五
【風涼話？】：第四種人（周木齋）	四九六
【乘涼】：兩誤一不同	四九八
最藝術的國家	五〇一
現代史	四〇四
推背圖	五〇七
『殺錯了人』異議	五二〇
【備考】：殺錯了人（曹聚仁）	五二二
中國人的生命圈	五二五

內外	五二八
透底	五二〇
【來信】：（祝秀俠）	五二三
【回信】	五二四
『以夷制夷』	五二六
【跳跟】：『以華制華』（李家作）	五二九
【搖擺】：過而能改（傅紅蓼）	五三一
【只要幾句】：案語	五三四
言論自由的界限	五三五
大觀園的人才	五三八
文章與題目	五四〇
新藥	五四三
『多難之月』	五四六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五四八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五五〇

王化·····	五三
天上地下·····	五六
保留·····	五九
再談保留·····	六二
『有名無實』的反駁·····	六五
不求甚解·····	六八
後記·····	七一

三
閒
集

序 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牠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爲『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鬥，因此就大

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喫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爲翻閱刊物，剪貼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於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牠燒得精光，我也以可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諺。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彷彿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昇爲作家或教

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爲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着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纔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書裏。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爲了盧布』說，就是老譜裏面的一着。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

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迹，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纔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覩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這集子裏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卻只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裏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只要看一

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于驚爲『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爲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爲『有閒』，而且『有閒』還至于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爲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鍊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尙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并記。

一九二七年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

三的
開
集

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牠了，甚至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Orlando。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

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

『革命』這兩個字，在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爲『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爲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于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爲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于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够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

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于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

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爲我們說着古代的話，說着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呀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于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纔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于叫孩子從此躺在牀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

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纔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纔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怎麼寫

——夜記之一——

寫什麼是一個問題，怎麼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牠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子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麼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

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訂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沈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牠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沈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牠，但我愈想，牠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着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纔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麼哀愁，什麼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

椅子上——上，撫摩着蚊咬的傷，直到牠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搔，直到牠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喫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只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刀一鎗，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迹。牠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只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迹永遠鮮活，也只是證明文人是徼倖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麼』倒也不成什麼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這麼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了卜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面上畫着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面上畫着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牠是宣傳品。發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並不發煩。但對於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雜誦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但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係的。也是凡事切己，則格外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面上的騎馬的英雄，將牠買來了。回來後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注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因為我那時所看的只有這兩種。下面抄一點報上的話：

『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麼，這樣做』

兩刊物。聞這樣做爲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別人創辦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當初將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攔下了。現在還記得做什麼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爲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面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于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纔見面，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麼反對，或對立的。我拏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裏就這樣說：『在一般C P氣燄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C P，不祇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 P

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那麼，確是如此了。

這里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這麼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爲我新來而且灰色。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錄。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郁達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麼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二次的革命是階級鬭爭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爲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適宜于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爲『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面，談過好幾回，只覺他穩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況得罪于國。怎麼一下子就這麼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尋方向轉換的塗中，變成看談文學了。我這種模模糊糊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麼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裏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而且敘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過于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于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于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只執滯于體裁，只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爲宜，對於文藝，

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迹，而不滿于『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于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罣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為不在假，而在以假為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獅騎羊，石子變白鴿，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眾裝出撒錢模樣道：Hiuzaa! Hiuzaa! 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噴出來的是裝在刀柄裏的蘇木汁，Hiuzaa 一够，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識着這是戲法，

而全心沈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着擡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牠一頁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麼，爲什麼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爲牠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爲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尙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爲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

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在鐘樓上

——夜記之二——

也還是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

『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開

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着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着沈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彷彿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着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于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面保持着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麼？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里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諡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于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

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爲『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爲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爲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裏裝飯喫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爲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只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卽等于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着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

不在那里了，也許竟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纔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里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够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麼都不管。只要可喫的，牠就喫，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裏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樓上的老鼠，彷彿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卻大抵懷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于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于說是還未熟悉本地

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卻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尸二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爲然，我們以爲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爲教授，學生以我爲先生，廣州人以我爲『外江佬』，『孤子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爲特別而記住的 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 *Ti-na-na* 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着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爲屋外的電燈幾乎

Hanbaran 被他偷去，所以要 *Tin-na-na* 了。』于是就彷彿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但雖只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 *sin*。故 *Tinhei* 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于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

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于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裏，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喫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喫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喫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于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于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祕藏題目，分配卷子……于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于是

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臺灣，自己也可以算作臺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只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讎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託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K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

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爲『在革命』爲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喫得太閑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閒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適宜于閒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只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只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飢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爲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爲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于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

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會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噫！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噫！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會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喫一頓飯，有時只喫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于反而攔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爲了葉遂寧和梭波里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

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沈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見了。後來纔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覩『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只好是這樣罷。

辭顧頤剛教授令「候審」

來信

魯迅先生：

頃發一掛號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學轉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鈔一分奉覽。

敬請大安。

頤剛敬上。

十六，七，廿四日。

鈔件

魯迅先生：

頡剛不知以何事開罪於先生，使先生對於頡剛竟作如此強烈之攻擊，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見漢口中央日報副刊上，先生及謝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對頡剛者，蓋欲伸黨國大義，而頡剛所作之罪惡直爲天地所不容，無任惶駭。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如頡剛確有反革命之事實，雖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則先生等自當負發言之責任。務請先生及謝先生暫勿離粵，以俟開審，不勝感盼。

敬請大安，謝先生處並候。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廿四日

回 信

頡剛先生：

來函謹悉，甚至於嚇得絕倒矣。先生在杭蓋已聞僕于八月中須離廣州之訊，于是頓生妙計，命以難題。如命，則僕尙須提空囊賃屋買米，作窮打算，恭候偏何來遲，提起訴訟。不

如命，則先生可指我爲畏罪而逃也；而況加以照例之一傳十，十傳百乎哉？但我意早決，八月中仍當行，九月已在滬。江浙俱屬黨國所治，法律當與粵不異，且先生尙未啓行，無須特別函挽聽審，良不如請卽就近在浙起訴，爾時僕必到杭，以負應負之責。倘其典書賣褲，居此生活費綦昂之廣州，以俟月餘後或將提起之訴訟，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報副刊未見；謝君處恕不代達，此種小傀儡，可不作則不作而已，無他祕計也。此復，順請
著安！

魯迅。

匪筆三篇

今之『正人君子』論事有時喜歡講『動機』。案動機，我自己知道，介紹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傷忠厚的。旅資將盡，非逐食不可了，許多人已知道我將于八月中走出廣州。八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謂『學者』的信，說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且叫我『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命令被告楞腹恭候于異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開審，真是霸道得可觀。第二天偶在報紙上看見飛天虎寄亞妙信，有『提防劍仔』的話，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獨笑，還想到別的兩篇東西，要執紹介之勞了。這種拉扯牽連，若即若離的思想，自己也覺得近乎刻薄，——但是，由牠去罷，好在『開審』時總會結帳的。

在我的估計上，這類文章的價值卻並不在文人學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後來只在北京的『平民週刊』上發表過一篇模範監獄裏的一個囚人的自序，其餘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後，不知怎樣了，現在卻還想搜集。要誇大地說起來，則此類文章，于學術上也未始無用；我記得 Lombroso 所做的一本書——大約是『天才與狂人』，請讀者恕我手頭無書，不能指實——後面就附有許多瘋子的作品。然而這種金字招牌，我輩卻無須掛起來。

這回姑且將現成的三篇介紹，都是從香港『循環日報』上採取的。以其都不是韻文，所以取阮氏『文筆對』之說，名之曰筆。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無任歡迎。但此後擬不限有韻無韻，並且廓大範圍，並收土匪，騙子，犯人，瘋子等等的創作。但經文人潤色，或擬作贗作者不收。

其實，古如陳涉帛書，米巫題字，近如義和團傳單，同善社乩筆，也都是這一流。我想，凡見于古書的，也都可以抄出來編為一集，和現在的來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麼不同。

來件想托北新書局代收，當擇尤發表，——但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開審』或下

了牢監的話。否則，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閑話休題，言歸正傳——

一 撕票佈告

潘平

廣州佛山缸瓦欄維新碼頭發現爛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簍衣覆蓋男子屍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隻，白旗一面，書明云云。由六區水警，將該屍艇移泊西醫院附近。驗得該屍頸旁有一鎗孔，直貫其鼻，顯係生前轟斃。查死者年約三十歲，乃穿短線衫褲，剪平頭裝者。

南海紫洞潘平佈告。

為佈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祿步共擄得鄉人十餘名，困留月餘，并望贖音。茲提出祿步洞沙鄉，姓許名進洪一名，槍斃示衆，以儆其餘。四方君子，特字週知，切勿視財如命！此佈。

（據七月十三日循環報）

二 致信女某書

金吊桶

廣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黃卓生，新會人，日前有行騙陳社恩、黃心、黃作樑夫婦銀錢單據，爲警備司令部將其捕獲，又搜獲一封固之信，內空白信箋一張，以火烘之，發現字迹如下：——

今日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呂純陽先師下降，查明汝信女係廣西人。汝今生爲人，心善清潔，今天上玉皇賜橫財四千五百兩銀過你，汝信享福養兒育女。但此財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鴿票七百五十元左右。老來結局有個子，第三位有官星發達，有官太做。但汝終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條命極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橫財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與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無事。若不信解除，汝條命得來十分無夫福無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見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爲要可也。汝想得財得子者，爲夫福者，有夫權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禮，交合陰陽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順從先生者，汝條命有好處，無安樂也……

(據七月二十六日循環報)

三 詰妙嫦書

飛天虎

香港永樂街如意茶樓女招待妙嫦，年僅雙十，寓永吉街三十號二樓。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時許，散工之後，偕同女侍三數人歸家，道經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漢三四人，要截於途，詰妙嫦曰：汝其爲妙玲乎？嫦不敢答，閃避而行。詎大漢不使去，逞兇毆之，凡兩拳，且曰：汝雖不語，固認識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毆，大哭不已，歸家後，以爲大漢等所毆者爲妙玲，故尙自怨無辜被辱，不料翌早復接恐嚇信一通，按址由郵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毆，確爲尋己，乃將事密報偵探，並告以所疑之人，務使就捕雪恨云。

亞妙女招待看啓者：久在如意茶樓，用諸多好言，毆辱我兄弟，及用滾水來陸之兄弟，靈端相勸，置之不理，與續大發雌雄，反口相齒，亦所謂惡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毆打已搥，亦非介意，不過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內答覆，妥講此事，若有無答覆，早夜出入，提防劍

仔，決列對待，及難保性命之虞，勿怪書不在先，至於死地之險也。諸多未及，難解了言，順候，此詢危險。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飛天虎謹。

（據八月一日循環報）

某筆兩篇

昨天又得幸逢了兩種奇特的廣告，仍敢執紹介之勞。標點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該稱什麼筆呢，想了兩天兩夜，沒有好結果。姑且稱爲『某筆』，以俟博雅君子教正。

這回的『動機』比較地近於純正，除希望『有目共賞』外，似乎並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發生了一種妄想。記得前清時，曾有一種專選各種報上較好的論說的，叫作『選報』。現在如有好事之徒，也還可以辦這一類的刊物。每省須有訪員數人，專收該地報上奇特的社論，記事，文藝，廣告等等，彙刊成冊，公之於世。則其顯示各種『社會相』也，一定比游記之類要深切得多。不知 C

F 男士以爲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飯之前。

其一

熊仲卿 榜名文蔚。歷任民國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兼作良醫，尤擅女科。
住本港跑馬地黃泥涌道門牌五十五號一樓中醫熊寓，每日下午應診及出診。電話總局
五二七零。

（右一則見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環日報。）

謹案：以吾所聞，向來或稱世醫，以其數代爲醫也；或稱儒醫，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稱官醫，以其亦爲官家所僱也；或稱御醫，以其曾經走進（？）太醫院也。若夫「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而又「兼作良醫」則誠曠古未有者矣。而五「長」做全，尤爲難得云。

其二

徵求父母廣告余現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純無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繼逝世，余獨取家資，來學廣州。自思自覺單身兒子，有非常之寂寞。於是自願甘心爲人兒子。并自願傾家產而從四方人事而無兒子者。有相當之家庭，且欲兒子者，請來函報告（家庭狀況經濟地位若何，）并寫明通訊地址。俟我回覆，方接洽面商。閱報諸君而能介紹我好事成功者，應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當有謝謝。申一〇六

通訊處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余希成具。

（右一則見同日廣州民國日報。）

謹案：我輩生當澆漓之世，於『徵求伴侶』等類廣告，早經司空見慣，不以爲奇。昔讀茅泮林所輯『古孝子傳』，見有三男皆無母，乃共迎養一不相干之老嫗，當作母親一事，頗以爲奇。然那時孝廉方正，可以做官，故尙能疑爲別有作用也。而此廣告則挾家資以求親，懸百金而待薦，雜誦之餘，烏能不欣人心之復返於淳古，表而出之，以爲留心世道者告，而爲打爹罵娘者勸哉？特未知閱報諸君，可知廣州有欲兒子者否？要知道倘爲介紹，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謝謝』者也。

述香港恭祝聖誕

記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聖誕，香港恭祝，向稱極盛。蓋北方僅得東鄰鼓吹，此地則有港督督率，實事求是，教導有方。僑胞亦知崇拜本國至聖，保存東方文明，故能發揚光大，盛極一時也。今年聖誕，尤爲熱鬧，文人雅士，則在陶園雅集，卽席揮毫，表示國粹。各學校皆行祝聖禮，往往歡迎各界參觀，夜間或演新劇，或演電影，以助聖興。超然學校每年祝聖，例有新式對聯，貼於門口，而今年所製，尤爲高超。今敬謹錄呈，乞昭示內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國主義者：——

乾 男校門聯

本魯史作春秋，罪齊田恆，地義天經，打倒賊子亂臣，免得赤化宣傳，討父仇孝，共產公妻，破壞綱常倫紀。

墮三都，出藏甲，誅少正卯，風行雷厲，剷除貪官悍吏，訓練青年德育，修身齊家，愛親敬長，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門聯

母憑子貴，妻藉夫榮，方今祝聖誠心，正宜遵懷三從，豈可開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誤會自由，趨附潮流成水性。

男稟乾剛，女占坤順，此際尊孔主義，切勿反違四德，動說有乜所謂，有乜所謂，至則不知所謂，隨同社會出風頭。

埋猶言合，乜猶言何，有猶言無，蓋女子小人，不知雅訓，故用俗字耳。輿論之類，琳琅尤多，今僅將載于循環日報者錄出一篇，以見大概：——

孔誕祝聖言感

佩 蓀

金風送爽。涼露驚秋。轉瞬而孔誕時期屆矣。邇來聖教衰落。邪說囂張。禮孔之舉。惟港中人士。猶相沿奉行。至若內地。大多數不甚注意。蓋自新學說出。而舊道德日卽於淪亡。自新人物出。而古聖賢胥歸於淘汰。一般學子。崇持列寧馬克斯種種謬說。不惜舉二千年來炳若日星之聖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詆人也。不曰腐化卽曰老朽。實則若曹少不更事。鹵莽滅裂。不惜假新學說。以便其私圖。而古人之大義微言。儼如肉中刺。眼中釘。必欲拔除之而後快。孔子且在於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誕之可言。嗚呼。長此以往。勢不至等人道於禽獸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經教猶存。當此祝聖時期。濟濟跲跲。一時稱盛耶。雖然。吾人祝聖。特爲此形式上之紀念耳。尤當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倫理。重實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近及遠。由內及外。皆有軌道之可循。天不變道亦不變。自有礪鑿之理由在。雖暴民囂張。摧殘聖教。然浮雲之翳。何傷日月之明。吾人當蒙泉剝果之餘。傷今思古。首當發揮大義。羽翼微言。子輿氏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生今之世。羣言淆亂。異說爭鳴。衆口鑠金。積非成是。與聖教爲難者。向祇楊墨。就貴詞而

闢之爲吾道作干城。樹中流之砥柱。若乎張皇耳目。塗飾儀文。以敷衍爲心。作例行之舉。則非吾所望於祝聖諸公也。感而書之如此。

香港孔聖會則于是日在太平戲院日夜演大堯天班。其廣告云：——

祝大成之聖節，樂奏鈞天，彰正教於人羣，歡騰大地。我國數千年來，崇奉孔教，誠以聖道足以維持風化，挽救人心者也。本會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堯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遊龍戲鳳。夜通宵先演六國大封相及風流皇后新劇。查風流皇后一劇，情節新奇，結構巧妙。惟此劇非演通宵，不能結局，故是晚經港政府給發數特別執照。演至通宵……預日沽票處在荷李活道中華書院孔聖會辦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

香港孔聖會謹啓。

風流皇后之名，雖欠雅馴，然『子見南子』，論語不諱，惟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者，能知此意耳。餘如各種電影，亦復美不勝收，新戲院則演『濟公傳四集』，預告者尙有『齊天大聖大鬧天宮』，新世界有『武松殺嫂』，全係國粹，足以發揚國光。皇后戲院之『假

面新娘』雖出鄰邦，然觀其廣告云：『孔子有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請君今日來看「假面新娘」以證孔子之言。然後知聖人一言而爲天下法，所以不愧稱爲萬世師表也。』則固亦有裨聖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曾聞至聖之微言，崇正闢邪，幸有大英之德政。愛國劬古之士，當亦必額手遙慶，恨不得受一塵而爲氓也。專此布達，卽頌

輯祺。

聖誕後一日，華約瑟謹啓。

弔與賀

語絲在北京被禁之後，一個相識者寄給我一塊剪下的報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國晚報的華燈欄，內容是這樣的：

弔喪文

孔伯尼

頃聞友云：『語絲已停，』其果然歟？查語絲問世，三年於斯，素無餘潤，常經風波。以久特聞，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堅壯，豈意中道而崩？『閑話』失慎，『隨感』傷風歟？抑有他故耶？豈明老人再不興風作浪，叛徒首領無從發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餘憤；義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語絲派』已亡，衆恐少息，『擁旗

黨』猶在，五色何憂？從此狂瀾平靜，邪說殲絕。有關風化，良匪淺鮮！則語絲之停也，豈不懿歟？所惜者餘孽未盡，禍根猶存，復萌故態，誠堪預防！自宜除惡務盡，何容姑息養奸？興仁義師，招撫並用；設文字獄，賞罰分明。打倒異端，懲辦禍首；以安民心，而屬衆望。豈惟功垂不朽，曷止德及黎庶？抑亦國旗爲榮耶？效狂飆之往例，草語絲之哀辭，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朝鮮君子，乞勿忽之。

未廢標點，已禁語體之秋，陽歷晦日，杏壇上。

先前沒有想到，這回卻記得起來了。去年我在廈門島上時，也有一個朋友剪寄我一片報章，是北京的每日評論，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陽歷的日子被剪掉了。內容是這一篇：

輓狂飆

燕 生

不料我剛作了讀狂飆一文之後，狂飆疾終於上海正寢的訃聞隨着就送到了。本來狂飆的不會長命百歲，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但牠夭折的這樣快，卻確乎

『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當這與『思想界的權威者』正在宣戰的時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結果，多心的人也許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面，『這話當然不確，』『不過』自由批評家所走不到的光華書局，『思想界的權威』也許竟能走得到了，於是乎狂飆乃停，於是乎狂飆乃不得不停。

但當今之世，權威亦多矣，狂飆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歟？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飆雖停，而長虹終於能安然走到北京，這個，我們倒要向長虹道賀。

嗚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轟轟烈烈之際，則有五教授慨然署名於擁護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幾何時，而自由批評已成爲反動者唯一之口號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隨線裝書以入於毛廁坑中乎！嘻嘻！咄咄！

語絲本來並非選定了幾個人，加以恭維或攻擊或詛咒之後，便將作者和刊物的榮枯存滅，都推在這幾個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這回的禁終于燕京北寢的訃聞，卻『也

許』不『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面』去了罷。誠然，我亦覺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

但是，這個，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國旗道賀。

十二月四日，於上海正寢。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朧

舊曆和新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着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連產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扎和突變來。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他們先前在做什麼，為什麼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只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將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衆』。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

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禮。』一到將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鎚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于是在這里留着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並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里也就留着一點朦朧。于是想要朦朧而終于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于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裏，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于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着人稱託爾斯泰爲『卑汙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

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澈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纔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裏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攬。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麼什麼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衆日日顯得着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够向無產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裏，卻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為看準了將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倚幫強者，寧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着，跑過去了。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產階級根性，拉『大眾』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

倘若難于『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麼階級，無論所處是什麼環境，只要『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鬪爭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

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

代表着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裏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

我們的批判者纔將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眾』的時候，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並且似乎要將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有閒就是有錢』云）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這纔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閒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只是『獲得大眾』便算完事了。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裏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那成仿吾的『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

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冷靜』並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閒暇』也有三個了。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只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于被『奧伏赫變』（『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麼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爲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爲將『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了。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爲什麼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產者差來的蘇秦的游說』。但當現在『無產者未曾從有產者意識解放以前』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盡是資產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因爲這極澈

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這樣——

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只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裏去了。但革命的藝術家，也只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只能這樣。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爲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爲革命的藝術家。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閒暇』，能靜聽他們自敘的功勳，那也就成爲一樣的戰士了。最後的勝利。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爲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 Upton Sinclair，創造月刊也背了 Vigny 在『開步走』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爲，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喫，我便將于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裏，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爲我喜歡。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

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陞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裏，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產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着『藝術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便是這。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裏的『武器的藝術』了罷。那麼，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裏了呢？只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看司徒喬君的畫

我知道司徒喬君的姓名還在四五年前，那時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課，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

這些自然應該最會打動南來的游子的心。在黃埃漫天的人間，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爭鬪，深紅和紺碧的棟宇，白石的欄干，金的佛象，肥厚的棉襖，紫糖色臉，深而多的臉上的皺紋……凡這些，都在表示人們對於天然並不降服，還在爭鬪。

在北京的展覽會裏，我已經見過作者表示了中國人的這樣的對於天然的倔強的魂靈。我曾經得到他的一幅『四個警察和一個女人。』現在還記得一幅『耶穌基督，』有一個女性的口，在他荆冠上接吻。

這回在上海相見，我便提出質問：

『那女性是誰？』

『天使，』他回答說。

這回答不能使我滿足。

因為這回我發見了作者對於北方的景物——人們和天然苦鬪而成的景物——又加以爭鬪，他有時將他自己所固有的明麗，照破黃埃。至少，是使我覺得有『歡喜』（Joy）的萌芽，如脅下的矛傷，儘管流血，而荆冠上卻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說的嘴唇。無論如何，這是勝利。

後來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風景相對照，可以知道他揮寫之際，蓋諗熟而高興，如逢久別故人。但我卻愛看黃埃，因為由此可見這抱着明麗之心的作者，怎樣爲人和天然的苦鬪的古戰場所驚，而自己也參加了戰鬪。

中國全土必須溝通。倘將來不至于割據，則青年的背着歷史而竭力去拂黃埃的中

看司徒喬君的畫

國彩色，我想，首先是這樣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夜，于上海。）

在上海的魯迅啓事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從開明書店轉到M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別後，多久沒有見面了。前蒙允時常通訊及指導……』

我便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我不到杭州，已將十年，決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別，所以她所看見的，是另一人。兩禮拜前，蒙M女士和兩位曾經聽過我的講義的同學見訪，三面證明，知道在孤山者，確是別一『魯迅。』但M女士又給我看題在曼殊師墳旁的四句詩——

『我來君寂居，

喚醒誰氏魂？

飄萍山林跡，

待到它年隨公去。

魯迅遊杭 弔老友

曼殊句

一，一〇，十七年。』

我于是寫信去打聽寓杭的江君，前天得到回信，說確有人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就在城外教書，自說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銷了八萬部，但自己不满意，不遠將有更好的東西發表云云。

中國另有一個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魯迅，我是毫沒法子的。但看他自敘，有大半和我一樣，卻有些使我爲難。那首詩的不大高明，不必說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說『待到它年隨公去』也未免太專制。『去』呢，自然總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隨』曼殊，卻連我自己也夢裏都沒有想到過。但這還是小事情，尤其不敢當的，倒是什麼對別人豫約『指導』之類……。

我自到上海以來，雖有幾種報上說我『要開書店』或『游了杭州』其實我是書店也沒有開，杭州也沒有去，不過仍舊躲在樓上譯一點書。因爲我不會拉車，也沒有學製無煙火藥，所以只好這樣用筆來混飯喫。因爲這樣在混飯喫，于是忽被推爲『前驅』，忽

被擠爲『落伍』那還可以說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個『魯迅』替我說教，代我題詩，而結果還要我一個人來擔負，那可真不能『有閑，有閑，第三個有閑』連譯書的工夫也要沒有了。

所以這回再登一個啓事。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文藝與革命

來信

魯迅先生：

在新聞報的學海欄內，讀到你底一篇文學和政治的歧途的講演，解釋文學者和政治者之背離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日前的安寧爲滿足，這滿足，在感覺銳敏的文學者看去，一樣是胡塗不澈底，表示失望。終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腳。我覺得這是世界各國成爲定例的事實。最近又在語絲上讀到民衆主義和天才和你底『醉眼』中的朦朧兩篇文章，確實提醒了此刻現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義和革命文學的迷夢的人們之朦朧不少，至少在我是這樣。

我相信文藝思潮無論變到怎樣，而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這是不得否認的。這是說，文藝之流，從最初的什麼主義到現在的什麼主義，所寫着的內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練的才技，造成一篇優美無媲的文藝作品，終是一樣。一條長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現的形相，雖然不同，而長江還是一條長江。我們看它那下流的廣大深緩，足以灌田畝，駛巨舶，便忘記了給它形成這廣大深緩的來源，已覺糊塗到透頂。若再斷章取義，說：此刻現在，我們所要的是長江的下流，因為可以利用，增加我們的財富，上流的長江可以不要，有着簡直無用。這是完全以經濟價值去評斷長江本身整個的價值了。這種評斷，出于着眼在經濟價值的商人之口，不足為怪；出于着眼在藝術價值的文藝家之口，未免昏亂至于無可救藥了。因為拿藝術價值去評斷長江之流，未始沒有意義，或竟比之下流較為自然奇偉，也未可知。

真與美是構成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的兩大要素。而構成這真與美至于最高等級，便是造成一件藝術品，使它含有最高級的藝術價值，那便非賴最高級的天才不可了。如果這個論斷可以否認，那末我們為什麼稱頌荷馬、但丁、沙士比亞和歌德呢？我們為什麼不

能創造和他們同等的文藝作品呢，我們也有觀察現象的眼，有運用文思的腦，有握管伸紙的手？

在現在，離開人生說藝術，固然有躲在象牙塔裏忘記時代之嫌；而離開藝術說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的本相，他們無須談藝術了。由此說，熱心革命的人，儘可投入革命的羣衆裏去，衝鋒也好，做後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藝作那既穩當又革命的勾當？

我覺得許多提倡革命文學的所謂革命文藝家，也許是把表現人生這句話誤解了。他們也許以爲十九世紀以來的文藝，所表現的都是現實的人生，在那裏面，含有顯著的時代精神。文藝家自驚醒了所謂『象牙之塔』的夢以後，都應該跟着時代環境奔走；離開時代而創造文藝，便是獨善主義或貴族主義的文藝了。他們看到易卜生之偉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國革命時期內的作家葉遂寧和戈理奇們的熱切動人；便以爲現在此後的文藝家都須拿當時的生活現象來詛咒，刻劃，予社會以改造革命的機會，使文藝變爲民衆的和革命的文藝。生在所謂『世紀末』的現代社會裏面的

人，除非是神經麻木了的，未始不會感到苦悶和悲哀。文藝家終比一般人感覺銳敏一點。擺在他們眼前的既是這麼一個社會，蘊在他們心中的當有怎麼一種情緒呢！他們有表現或刻劃的才技，他們便要如實地寫了出來，便無意地成爲這時代的社會的呼聲了。然而他們還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藝術，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稱頌爲改革社會的先驅，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稱爲人道主義的極致者，還須賴他們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經幾個真知灼見的批評者爲之闡揚而後可。然而，真能懂得他們的藝術的，究竟還是少數。至于葉遂寧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說了，戈理基呢，聽人說，已有點灰色了。這且不說。便是以藝術本身而論，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譏笑那不切實的詩人的詩。況且我們以藝術價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還是疑問呵。

實在說，文藝家是不會拋棄社會的，他們是站在民衆裏面的。有一位否認有條件的文藝批評者，對於泰奴 (Taino) 的時間條件，認爲不確，其理由是：文藝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藝家，還是站在那時候，以那時候做的生活環境地盤而出發，所以

他畢竟是那時候的民衆之一員，而能在朦朧平安中看出殘缺和破敗。他們便以熟練的才技，寫出這種殘缺和破敗，于藝術上達到高級的價值爲止，在他們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在創造時，他們也許只顧到藝術的精細微妙，並沒想到如何激動民衆，予民衆以強烈的刺激，使他們血脈憤張，而從事于革命。

我們如果承認藝術有獨立的無限的價值，藝術家有完成藝術本身最終目的之必要，那末我們便不能而且不應該撇開藝術價值去指摘藝術家的態度，這和拿藝術家的現實行爲去評斷他的藝術作品者一樣可笑。波特來耳的詩並不因他的狂放而稍減其價值。淺薄者許要咒他爲人羣的蛇蝎，卻不知道他底厭棄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們平常譏刺一個人，還須觀察到他的深處，否則便見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標準，既沒有看到他的深處，又拋棄了衡量藝術價值的尺度，便無的放矢地攻刺一個忠于藝術的人，真的糊塗呢還是別有用意！這不過使我們覺到此刻現在的中國文藝界真不值一談，因爲以批評成名而又是創造自許的所謂文藝家者，還是這樣地崇奉功利主義呵！

我——自然不是什麼文藝家——喜歡讀些高級的文藝作品，頗多古舊的東西，很有人說這是迷舊的的時代擯棄者。他們告訴我，現在是民衆文藝當世了，嶄新的專爲第四階級玩味的文藝當世了。我爲之愕然者久之，便問他們：民衆文藝怎樣寫法？文藝家用什麼手段，使民衆都能玩味？現在民衆文藝已產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後的民衆能够賞識所謂民衆文藝者已有幾分之幾？莫非現在有許多新三字經，或新神童詩出版了麼？我真不知民衆化的文藝如何化法，化在內容呢，那我們本有表現民衆生活的文藝了的；化在技藝上吧，那末一首國民革命歌儘够充數了，你聽：『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多麼宏壯而明白呵！我們爲什麼要別的文藝？他們不能明確地回答，而我也糊塗到而今。此刻現在，纔從民衆主義與天才一文裏得了答案，是：

『無論民衆藝術如何地主張藝術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藝術作品無論如何有無限的價值等差，這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普遍性啦，平等性啦這一類話，意思不外乎是說藝術的內容是關於廣衆的民間生活或關於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這種內容的藝術，始可以供給一般民衆的玩味。藝術備有像這種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說是不

可以否認的，然而藝術作品既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以上，那些比較高級的藝術品好，就可以說多少能够供給一般民衆的玩味，若要說一切人都能够一樣的精細，一樣的深刻，一樣的微妙——換句話說，絕對平等的來玩味牠，那無論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實。』

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最先進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層的先進的少數人能够了解，等到這種思想透入羣衆裏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先進的思想了。這些話，是告訴我們芸衆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覺不敏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不平等，除了詛咒造物的不公，我們還能怨誰呢？這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人類的演進史，可以一筆抹殺，而革命也不能發生了。世界文化的推進，全賴少數先覺之衝鋒陷陣，如果各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發達到極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謂『螺旋式進行』一句話，還不是等于廢話？藝術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進退，藝術自不能除外。民衆化的藝術，以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差來說，簡直不能成立。自然，藉文藝以革命這夢囈，也終究是一種夢囈罷了！

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

回 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現在要做一個什麼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夥，是不行的，至少，在現在的上海灘上。因為並非藝術家，所以並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讚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是內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不過近來的批評家，似乎很怕這兩個字，只想在文學上成仙。

各種主義的名稱的勃興，也是必然的現象。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衆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有多少占權，那自然也會有民衆文學——說得澈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中國的批評界怎樣的趨勢，我卻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覺得各專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或者

兼用各種尺。有的說要真正，有的說要鬪爭，有的說要超時代，有的躲在人背後說幾句短短的冷話。還有，是自己擺着文藝批評家的架子，而憎惡別人的鼓吹了創作。倘無創作，將批評什麼呢，這是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腸的。

別的此刻不談。現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鬪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社會停滯着，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裏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爲這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

鬪爭呢，我倒以爲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爲什麼不鬪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着，于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爲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尙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鬪爭文學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他，我以爲

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

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的文學者會經常作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于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薦』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牠是文藝。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卻只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身上去。那麼，剩下來的

思想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罷？我給你看兩句馮乃超的劇本的結末的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兒：我們反抗去！』

四月四日。魯迅。

扁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

于是各各以意爲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爲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着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還要由此生出議論來。這個主義好，那個主義壞……等等。

鄉間一向有一個笑談：兩位近視眼要比眼力，無可質證，便約定到關帝廟去看這一天新掛的扁額。他們都從漆匠探得字句。但因爲探來的詳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個便不服，爭執起來了，說看見小字的人是說謊的。又無可質證，只好一同探問一個過路的

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麼也沒有。扁還沒有掛哩。』

我想，在文藝批評上要比眼力，也總得先有那塊扁額掛起來纔行。空空洞洞的爭，實在只有兩面自己心裏明白。

（四月十日。）

路

又記起了Google做的巡按使的故事——

中國也譯出過的。一個鄉間忽然紛傳皇帝使者要來私訪了，官員們都很恐怖，在客棧裏尋到一個疑似的人，便硬拉來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後，那人跑了，而聽說使者真到了，全臺演了一個啞口無言劇收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並未派遣。這車夫的本階級意識形態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罷。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裏尋，在客店裏尋，在洋人家裏尋，在書鋪子裏尋，在咖啡館裏尋……。

文藝家的眼光要超時代，所以到否雖不可知，也須先行擁篲清道，或者僂僂奉迎。于是做人便難起來，口頭不說『無產』便是『非革命』，還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險了。這真要沒有出路。

現在的人間也還是『大王好見，小鬼難當』的處所，出路是有的。何以無呢？只因多鬼祟，他們將一切路都要糟蹋了。這些都不要，纔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聲明了因為沒法子，只好暫在礮屁股上掛一掛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野草序）

還只說說，而革命文學家似乎不敢看見了，如果因此覺得沒有了出路，那可實在是
很可憐，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動筆了。

（四月十日。）

頭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報上有一篇梁實秋教授的關於盧騷，以為引辛克來兒的話來攻擊白璧德，是『借刀殺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擊盧騷，理由之二，則在『盧騷個人不道德的行爲，已然成爲一般浪漫文人行爲之標類的代表，對於盧騷的道德的攻擊，可以說即是給一般浪漫的人的行爲的攻擊……』

那麼，這雖然並非『借刀殺人』卻成了『借頭示衆』了。假使他沒有成爲『一般浪漫文人行爲之標類的代表』就不至于路遠迢迢，將他的頭掛給中國人看。一般浪漫文人，總算害了遙拜的祖師，給了他一個死後也不安靜。他現在所受的罰，是因爲影響罪，不是本罪了，可歎也夫！

以上的話不大『謹飭』，因為梁教授不過要筆伐，並未說須掛盧騷的頭，說到掛頭，是我看了今天申報上載湖南共產黨郭亮『伏誅』後，將他的頭掛來掛去，『遍歷長岳，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當局，竟沒有寫了列寧（或者湖而上之，到馬克斯；或者更湖而上之，到黑格爾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狀，一同張貼，以正其影響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評家。

記得三國志演義記袁術（？）死後，後人有詩歎道：『長揖橫刀出，將軍蓋代雄，頭顱行萬里，失計殺田豐。』當三個有閒之暇，也活剝一首來弔盧騷：

『脫帽懷鉛出，先生蓋代窮。頭顱行萬里，失計造兒童。』

（四月十日。）

通信

來信

魯迅先生：

精神和肉體，已被困到這般地步——怕無以復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撐了病體向『你老』作最後的呼聲了！——不，或者說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極明白：你是在給別人安排酒筵，『泡製醉蝦』的一個人。我就是其間被製的一個！

我，本來是個小資產階級裏的驕子，溫鄉裏的香花。有喫有著，儘可安閒地過活。只要夢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滿足，委實一無他求。

吶喊出版了，語絲發行了（可憐新青年時代，我尙看不懂呢，）說鬚鬚，論照相之類一篇篇連續地戟刺着我的神經。當時，自己雖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們的淺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賣，在馬路上吶喊得洋溢，隨了所謂革命的勢力，也奔騰澎湃了。我，確竟被其吸引。當然也因我嫌棄青年的淺薄，且在想自己生命上找一條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認識了人類的欺詐，虛偽，陰險……的本性！果然，不久，軍閥和政客們棄了身上的蒙皮，而顯出本來的猙獰面目！我呢，也隨了所謂『清黨』之聲而把我一顆沸騰着的熱烈的心清去。當時想：『素以敦厚誠樸』的第四階級，和那些『遜世之士』的『居士』們，或許尙足爲友吧？——唉，真的，『令弟』豈明先生說得是：『中國雖然有階級，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發財，』而且我幾疑置身在紀元前的社會裏了，那種愚蠢比鹿豕還要愚蠢的言動（或者國粹家正以爲這是國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於叫我究竟怎麼辦呢？

利，莫利於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貫穿了我的心，於是乎吐血。轉輾牀上不能動已幾個月！

不錯，沒有希望之人應該死，然而我沒有勇氣，而且自己還年青，僅僅廿一歲。還有愛人。不死，則精神和肉體，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鐘。愛人亦被生活所壓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遺產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對亦徒唏噓！

不識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這毒藥者是先生，我實完全被先生所『泡製』。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請你指示我所應走的最終的道路。不然，則請你麻痺了我的神經，因為不識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習醫，想必不難『還我頭來！』我將效梁遇春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勸告你的：『你老』現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為軍閥們趕製適口的鮮味，保全幾個像我這樣的青年。倘為生活問題所驅策，則可以多做些『擁護』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貴之不及，『委員』、『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請指示我！莫要『為德不卒』

或北新，或語絲上答覆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諒我寫得草率，因病中，乏極！

一個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書。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當答覆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為我不能如你的所囑，不將來信發表。來信的意思，是要我公開答覆的，那麼，倘將原信藏下，則我的一切所說，便變成『無題詩N百韻』令人莫名其妙了。況且我的意見，以為這也不是恥笑。自然，中國很有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雖然喫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雖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當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無以對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該能原諒的罷，彼此都不過是靠徼倖，或靠狡滑，巧妙。他們只要用鏡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臉來的。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裏原也藏着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於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虛

布，闊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鋪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說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雖然有人指定爲我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麼——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爲下等人勝于上等人，青年勝於老頭子，所以從前並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一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並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尙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裏』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爲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于是接着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只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于是覺得正像是『聚而殲旃』，很不免哀痛。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

的人道主義，』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于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恆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確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麼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鬭爭。』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我在這里引出革命文學家來，並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並非我和什麼人協商，或自己要說什麼，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於事實是無干的。我疑心喫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鉅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

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於是從那裏面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閒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尙未成功』的文學家。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吶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致的。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對於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內疚了。那麼，一切死者，傷者，喫苦者，都和我無關。先前真是擅負責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裏輕鬆了，又有些想活動。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沈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麼沈重。近大半年來，徵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裏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

了我的文章，斷定是『反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于人，實在沒有什麼影響，——只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于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別一面來想一想。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別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而你並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喫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膽，那麼，第二、就是太認真。革命是也有種種的。你的遺產被革去了，但也有將遺產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勝，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麼，我沒有罪戾麼？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學家，用明槍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將來我所受的傷的總計，我就劃一部分賠償你的尊『頭』。

這里添一點考據：『還我頭來』這話，據三國志演義，是關雲長夫子說的，似乎並非

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於動手了，這決不是什麼『前進呀，殺呀，青年呵』那樣英氣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覆，只得在這裡說幾句。第一、要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裏，將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第二、要愛護愛人。這據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緊，你只要做幾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麼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後悔輕信了我的話。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別一條的。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後也。

先生，我將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因為只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

多傷。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壞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趁便先辯幾句罷：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將這些寶貝放在肚子裏，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別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隨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並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隨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這也並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閒暇，即使偶然涉及什麼，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機』或『良心』，卻也許並不這樣的。

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爲止。並且順頌

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

四月十日。

太平歌訣

四月六日的申報上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南京市近日忽發現一種無稽謠傳，謂總理墓行將工竣，石匠有攝收幼童靈魂，以合龍口之舉。市民以訛傳訛，自相驚擾，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懸紅布一方，上書歌訣四句，藉避危險。其歌訣約有三種：（一）人來叫我魂，自叫自當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急早回家轉，免去頂墳壇。（三）你造中山墓，與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當。（後略）

這三首中的無論那一首，雖只寥寥二十字，但將市民的見解：對於革命政府的關係，對於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經寫得淋漓盡致。雖有善于暴露社會黑暗面的文學家，恐怕也

難有做到這麼簡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則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

看看有些人們的文字，似乎硬要說現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背着這一夥市民進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年後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

近來的革命文學家往往特別畏懼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卻毫不客氣，自己表現了。那小巧的機靈和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只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時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罷，被遺棄了的現實的現代，在後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實還是同在。你不過閉了眼睛。不過眼睛一閉，『頂石墳』卻可以不至于了，這就是你的『最後的勝利。』

（四月十日。）

剷共大觀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報上，又有一段長沙通信，敘湘省破獲共產黨省委會，『處死刑者三十餘人，黃花節斬決八名。』其中有幾處文筆做得極好，抄一點在下面：

……是日執行之後，因馬（淑純，十六歲）、志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係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級，又懸之司門口示衆，往觀者更衆。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爲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衆，則看郭亮首級後，又赴教育會看女屍。北門一帶民衆，則在教育會看女屍後，又往司門口看郭亮首級。全城擾攘，剷共空氣，爲之驟張；直至晚間，觀者始不似日間之擁擠。

抄完之後，覺得頗不妥。因為我就想發一點議論，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說，我是只喜歡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責罰我傳播黑暗，因此咒我滅亡，自己帶着一切黑暗到地底裏去。但我熬不住，——別的議論就少發一點罷，單從『爲藝術的藝術』說起來，你看這不過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麼有力。我一讀，便彷彿看見司門口掛着一顆頭，教育會前列着三具不連頭的女屍。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這也許我猜得不對，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許多『民衆』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着，嚷着……再添一點蛇足，是臉上都表現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在我所見的『革命文學』或『寫實文學』中，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強有力的文學。批評家羅喀綏夫斯奇說的罷：『安特列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卻並不怕；契訶夫不這樣，我們倒恐怖了。』這百餘字實在抵得上小說一大堆，何況又是事實。

且住。再說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們又要責我散佈黑暗，阻礙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現在易犯嫌疑，忠實同志被誤解爲共黨，或關或釋的，報上向來常見。萬一不幸，沈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這些來，也許未免會短壯士之氣。但是，革命被頭掛退的事

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于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蛀空。這並非指赤化，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麼？倘必須前面貼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纔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雖是投機，成敗之數也不能預卜的。

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衆，其實還不很管什麼黨，只要看『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覩或耳聞了好幾次了。

（四月十日。）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英勇的刊物是層出不窮，『文藝的分野』上的確熱鬧起來了。日報廣告上的戰線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戰士。承蒙一個朋友寄給我三本，纔得看見了一點鎗煙，並且明白弱水做的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裏的有一粒彈子，是瞄準着我的。爲什麼呢？因爲先是『醉眼』中的朦朧做錯了。據說錯處有三：一是態度，二是氣量，三是年紀。複述易於失真，還是將這粒子彈移置在下面罷：

『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後的論戰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量氣太窄了。最先（據所知）他和西滢戰，繼和長虹戰，我們一方面覺得正直是在他這面，一方面又覺得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現在又和創造社戰，

辭鋒仍是尖酸，正直卻不一定落在他這面。是的，仿吾和初梨兩人對他的批評，是可以有反駁的地方，但這應莊嚴出之，因為他們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冷嘲熱刺，只有對於冥頑不靈者為必要，因為是不可理喻。對於熱烈猛進的絕對不合用這種態度。他那種態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適足表出「老頭子」的確不行吧了。好吧，這事本該是沒有勉強的必要和可能，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們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

這一段雖然並不涉及是非，只在態度，量氣，口吻上，斷定這「老頭子」的確不行，從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殺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卻很像第三者從旁的批評。從我看來，「尖酸刻薄」之處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會有「老頭子」氣的，這恐怕因為我「冥頑不靈」不得已而用之的罷，或者便是自己不覺得。不過我要指摘，這位隱姓埋名的「水先生」，其實是創造社那一面的。我並非說，這些戰士，大概是創造社裏常見他的腳踪，或在藝術大學裏兼有一隻飯碗，不過指明他們是相同的氣類。因此，所謂戰線，也仍不過是創造社的戰線。所以我和西澄、長虹戰，他雖然看見正直，卻一聲不響，今和創造社戰，便只

看見尖酸，忽然顯戰士身而出現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回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了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並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澧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讚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為先兩回是正直在我這面的罷，也還是因為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們同系、同社、同派、同流……從他們那一面看來，事情可就兩樣了。我『和西澧戰』了以後，現代系的唐有壬會說語絲的言論，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長虹戰』了以後，狂飈派的常燕生會說狂飈的停版，也許因為我的陰謀。但除了我們兩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記得了罷。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過去的。

這次對於創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於是『論戰』便變成『態度戰』、『量氣戰』、『年齡戰』了。但成仿吾輩的對我的『態度』戰士們雖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這位批評家于吶喊出版時，即加以譏

刺道：『這回由令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得多了。』這傳統直到五年之後，再見於馮乃超的論文，說是『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麼？還有，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爲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爲小說舊聞鈔，是並不相干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卻加以編排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這使李初梨很高興，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裏，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但是還不够，他們因爲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爲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還要加注道：『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而這一個『老』的錯處，還給『戰線』上的弱水先生作爲『的確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於用了他們的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裏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量氣』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爲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爲『卑污』的託爾斯泰，

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魯迅誠恐惶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纔不至於『的確不行』麼？

至于我是『老頭子』，卻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的時候，他也曾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這回弱水這一位『小頭子』對於這一節沒有話說，可見有些青年究竟還懷着純朴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將『冷嘲熱刺』的用途，也瓜分開來，給『熱烈猛進的』製定了優待條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經不屬於那一類，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時沒有真上戰線去，受過創傷，倘使身上有了殘疾，那就又添一件話柄，現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這是『不革命』的好處，應該感謝自己的。

其實這回的不行，還只是我不行，無關年紀的。託爾斯泰、克羅頗特庚、馬克斯，雖然言行有『卑污』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鬪了一生，我看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鬍子。因為我一個而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確乎應該想起來的，他後來真是暮

年景象，因為反對白話，不能論戰，便從橫道兒來做一篇影射小說，使一個武人痛打改革者——說得『美麗』一點，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藝』了。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都諱言黑暗，捧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個證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關鍵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這一階級將被『奧服赫變』及早變計，于是歸根結蒂，分明現出 *Fascisti* 本相了。但我以為『老頭子』如此，是不足慮的，他總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還像他的東拉西扯。

又來說話，量氣又太小了，再說下去，就要更小，『正直』豈但『不一定』在這一面呢，還要一定不在這一面。而且所說的又都是自己的事，並非『大貧』的民衆……但是，即使所講的只是個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見個人，有些人卻也看見背景或環境。例如魯迅在廣東這一本書，今年戰士們忽以為編者和被編者希圖不朽，于是看得『煩躁』也給了一點對於『冥頑不靈』的冷嘲。我卻以為這太偏於唯心論了，無所謂不朽，不朽

又幹嗎，這是現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會有這一本書，其實不過是要黑字印在白紙上，訂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罷了。無論是怎樣泡製法，所謂『魯迅』也者，往往不過是充當了一種的材料。這種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的創造社也在所不免的。託羅茲基雖然已經『沒落』，但他會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裏。我以爲他這話卻還是對的。

（四月十日。）

革命咖啡店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廣告式文字，昨天在報章上看到了，仗着第四個『有閒，』先抄一段在下面：

『……但是讀者們，我卻發現了這樣一家我們所理想的樂園，我一共去了兩次，我在那裏遇見了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郁達夫等。並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裏高談着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裏默默沈思，我在那裏領會到不少教益呢。……』

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灼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沈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

多多『醜陋的農工大衆，』他們喝着，想着，談着，指導着，獲得着，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

何況既喝咖啡，又領『教益』呢？上海灘上，一舉兩得的買賣本來多。大如弄幾本雜誌，便算革命；小如買多少錢書籍，即贈送真絲光襪或請喫冰淇淋——雖然我至今還猜不透那些惠顧的人們，究竟是意在看書呢，還是要穿絲光襪。至于咖啡店，先前只聽說不過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飽眼福』罷了。誰料這回竟是『名人，』給人『教益，』還演『高談，』『沈思』種種好玩的把戲，那簡直是現實的樂園了。

但我又有幾句聲明——

就是：這樣的咖啡店裏，我沒有上去過，那一位作者所『遇見』的，又是別一人。因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總覺得這是洋大人所喝的東西（但這也許是我的『時代錯誤，』不喜歡，還是綠茶好。二、我要抄『小說舊聞』之類，無暇享受這樣樂園的清福。三、這樣的樂園，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脣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纔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材料；如我者，在戰線上就宣布過一條『滿口黃牙』的罪狀，到那里去

高談，豈不褻瀆了『無產階級文學』麼？還有四、則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後門遠處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氣息罷了。你看這裏面不很有些在前線的文豪麼，我卻是『落伍者』，決不會坐在一屋子裏的。

以上都是真話。葉靈鳳革命藝術家曾經畫過我的像，說是躲在酒罈的後面。這事的然否我不談。現在所要聲明的，只是這樂園中我沒有去，也不想去，並非躲在咖啡杯後面在騙人。

杭州另外有一個魯迅時，我登了一篇啓事，『革命文學家』就挖苦了。但現在仍要自己出手來做一回，一者因為我不是咖啡，不願意在革命店裏做裝點；二是我沒有創造社那麼闊，有一點事就一個律師，兩個律師。

（四月十日。）

文壇的掌故

來信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爲着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囂。』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並不『囂』，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爭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

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階級的文學。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爭，便開始攻擊。

至于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為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纔有進步，纔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為根據的。——可是又無他們的澈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為一談。——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為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為『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於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只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只算預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並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

撰安！

徐勻。

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至于『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

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X（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號）纔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含混地只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澈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確是無產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鬪爭文學，一講鬪爭，便只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鬪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卻不肯喫一點革命者往難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僞，並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

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爲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爲這是很可惜，也覺得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卻也有已經得到好結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他們去』，又改換姓名（石厚生）做了一點璫魯迅之後，據日本的無產文藝月刊戰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並且在那邊被尊爲『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家』了。

魯迅。

八月十日。

文學的階級性

來信

魯迅先生：

侍桁先生譯林癸未夫著的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本來這是一篇絕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觀的問題，理論未免是勉強一點，也許是著者的誤解唯物史觀。

他說：

「以這種理由若推論下去，有產者的個人性與無產者的個人性，「全個」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說不承認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有共同的人性。再換一句話說，有產者與無產者只是有階級性，而全然缺少個人性的。」

這是什麼話！唯物史觀的理論，豈是這樣簡單的。牠的理論並不否認個人性，因此，也不否認思想、道德、感情、藝術。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藝術，都是受支配于經濟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個人性，我們就以個人性而論。譬如農村經濟宗法社會裏拿妻子爲男子的財產，但是文化進步到今日的社會，就承認妻子有相當的人格。這個觀念，當然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雖然是共同，卻並非天賦的，仍然逃不了經濟的支配。有產者和無產者物質生活上受經濟的影響而有差等，個人性同樣地受經濟的影響而卻是共同的。並不是有產者和無產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經濟制度的影響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駁唯物史觀，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樣的是圓頂方趾，要喫飯，要睡覺，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這來駁唯物史觀，爽快得多了。

最後，我須聲明：我是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工。因爲是職工，所以學識的譴陋是誰都可以肯定的。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達意和不妥之處。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馬克斯學說的人來爲唯物史觀打一打仗。

因爲避學者嫌疑起見，以信底形式而寫給魯迅先生，能否發表，是編者的特權了。

愷良於上海，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回信

愷良先生：

我對於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麼。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論，他將話兩次一換，便成爲『只有』和『全然缺少』，卻似乎決定得太快一點了。大概以弄文學而又講唯物史觀的人，能從基本的書籍上一一鈎剔出來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幾本別人的提要就算。而這種提要，又因作者的學識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階級意識明了銳利起來，就竭力增強階級性說，而別一面就容易招人誤解。作爲本文根據的林氏別一篇論文，我沒有見，不能說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極端，但中國卻有此例，竟會將個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謂個人性，）個人主義即利己主義混爲一談，來加以自以爲唯物史觀底申斥，倘再有人據此來論唯物史觀，那真是糟糕透頂了。

來信的『喫飯睡覺』的比喻，雖然不過是講笑話，但脫羅茲基曾以對於『死之恐

佈』爲古今人所共同，來說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實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爲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着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有馬克斯學識的人來爲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贊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

魯迅。

八月十日。

一九二九年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西湖博覽會上要設先烈博物館了，在徵求遺物。這是不可少的盛舉，沒有先烈，現在還拖着辮子也說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徵求的，末後又有『落伍者的醜史』，卻有些古怪了。彷彿要令人於飲水思源以後，再喝一口髒水，歷親芳烈之餘，添嗅一下臭氣似的。

而所徵求的『落伍者的醜史』的目錄中，又有『鄒容的事實』，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沒有錯而鄒容不是別人，那麼，據我所知道，大概是這樣的：

他在滿清時，做了一本革命軍，鼓吹排滿，所以自署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後來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裏了，其時蓋在一九〇二年。自然，他所主張的不過是

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當然也不知道共產主義。但這是大家應該原諒他的，因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會纔成立。

聽說中山先生的自敘上就提起他的，開目錄的諸公，何妨於公餘之暇，去查一查呢？
後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

（二月十七日。）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

但至今，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底的文學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爲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全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闌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卻更爲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因此那些終于爲人所注重了。

在現在的環境中，人們忙于生活，無暇來看長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頃刻間，而仍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用數頃刻，遂知種種作風，

種種作者，種種所寫的人和物和事狀，所得也頗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這些原因還在外。

中國于世界所有的大部傑作很少譯本，翻譯短篇小說的卻特別的多者，原因大約也爲此。我們——譯者的彙印這書，則原因就在此。貪圖用力少，紹介多，有些不肯用盡盡氣力的壞處，是自問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點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壞的意思。還有，是要將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裏，可以較不容易於散亡。我們——譯者，都是一面學習，一面試做的人，雖于這一點小事，力量也還很不够，選的不當和譯的錯誤，想來是一定不免的。我們願受讀者和批評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識。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于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幾句，情不可卻，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着一羣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纔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鎗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

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纔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爲什麼呢，因爲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激，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喫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沈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卽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着『光復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爲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爲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鍊。但後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

有些反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鍊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喫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擡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里呢，連『頭』也沒有，那里說得到『擡』。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澈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倣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多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

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徵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爲仇爲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於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纔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

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麼，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日本的雜誌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衆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爲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紹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皇漢醫學』

革命成功之後『國術』、『國技』、『國花』、『國醫』鬧得烏煙瘴氣之時，日本人湯本求真做的皇漢醫學譯本也將乘時出版了。廣告上這樣說：

『日醫湯本求真氏於明治三十四年卒業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後應世多年覺中西醫術各有所長短非比較同異捨短取長不可爰發憤學漢醫歷十八年之久彙集吾國歷來諸家醫書及彼邦人士研究漢醫藥心得之作著「皇漢醫學」一書引用書目多至一百餘種旁求博考洵大觀也……』

我們『皇漢』人實在有些怪脾氣的：外國人論及我們缺點的不欲聞，說好處就相信，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便紹介。這也正是同例，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卒業

者何止數千人，做西洋醫學的也有十幾位了，然而我們偏偏刮目於可入無雙譜的湯本先生的皇漢醫學。

小朋友梵兒在日本東京，化了四角錢在地攤上買到一部岡千仞作的觀光紀游，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來游中國的日記。他看過之後，在書頭卷尾寫了幾句牢騷話，寄給我了。來得正好，鈔一段在下面：

『二十三日，夢香、竹孫來訪。……夢香盛稱多紀氏醫書。余曰，「敝邦西洋醫學盛開，無復手多紀氏書者，故販原板上海書肆，無用陳餘之芻狗也。」曰，「多紀氏書，發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醫術大開，譯書續出，十年之後，中人爭購敝邦譯書，亦不可知。」夢香默然。余因以爲合信氏醫書（案：蓋指全體新論）刻于寧波，寧波距此咫尺，而夢香滿口稱多紀氏，無一語及合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蘇杭日記下二頁。）

岡氏於此等處似乎終於不明白。這是『四千餘年古國古』的人民的『收買廢銅爛鐵』脾氣，所以文人則『盛稱多紀氏』，武人便大買舊礮和廢鎗，給外國『無用陳餘

之芻狗』有一條出路。

岡氏距明治維新後不久，還有改革的英氣，所以他的日記裏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評家或云與其看世紀末的煩瑣隱晦沒奈何之言，不如上觀任何民族開國時文字，證以此事，是頗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

大家都說要打俄國，或者『願爲前驅』，或者『願作後盾』，連中國文學所賴以不墜的新月書店，也登廣告出賣關於俄國的書籍兩種，則舉國之同仇敵愾也可知矣。自然，大勢如此，執筆者也應當做點應時的東西，庶幾不至於落伍。我于是在七月廿六日新聞報的快活林裏，遇見一篇題作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的敘述詳細而昏不可當的文章，可惜限於篇幅，只能摘抄：

『……迺嘗讀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開國以後。奄有欽察阿速諸部。命速不台征蔑里吉。復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戰至太和嶺。泊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爲前驅。隨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哥等伐西域。十年乃大舉征俄。

直逼耶烈贊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長子求赤遂於其地即可汗位。可謂破前古未有之紀載矣。夫一代之英主。開創之際。戰勝攻取。用其兵威。不難統一區宇。史冊所敘。縱極鋪張。要不過禹域以內。訖無西至流沙。舉朔北遼絕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猶復鼓其餘勇。進逼歐洲內地。而有歐亞混一之勢者。謂非吾國戰史上最

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得乎……』

那結論是：

『……質言之。元時之兵鋒。不僅足以扼歐亞之吭。而有席捲包舉之氣象。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勇氣者。固自有在。余故備述之。以告應付時局而固邊圉者。』

這只有這作者清攏先生是蒙古人，倒還說得過去。否則，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求赤在莫斯科『即可汗位』，那時咱們中、俄兩國的境遇正一樣，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爲什麼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爲自己的先人，彷彿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的呢？

倘照這樣的論法，俄國人就可以作『吾國征華史之一頁』，說他們在元代奄有中國的版圖。

倘照這樣的論法，則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歐亞混一之勢』『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後人『之勇氣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癡已出，殊『非吾國戰史上最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也！

（七月二十八日。）

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這是一個青年的作者，以一個現代的活的青年爲主角，描寫他十年中的行動和思想的書。

舊的傳統和新的思潮，紛紜於他的一身，愛和憎的糾纏，感情和理智的衝突，纏綿和決撒的迭代，歡欣和絕望的起伏，都逐着這小小十年而開展，以形成一部感傷的書，個人的書。但時代是現代，所以從舊家庭所希望的『上進』而渡到革命，從交通不大方便的小縣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從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偉大的社會改革——但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梁。

一個革命者，將——而且實在也已經（！）——爲大眾的幸福鬪爭，然而獨獨寬恕

首先壓迫自己的親人，將鎗口移向四面是敵，但又四不見敵的舊社會；一個革命者，將爲人我爭解放，然而當失去愛人的時候，卻希望她自己負責，並且爲了革命之故，不願自己有一個情敵，——志願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處就愈少，可以自解之處也愈多。——

終於，則甚至閃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剎那間爲惟一的現實一流的陰影。在這里，是屹然站着，一個個人主義者，遙望着集團主義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梁。

釋迦牟尼出世以後，割肉喂鷹，投身餉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說教的倒算是大乘，總是發達起來，我想，那機微就在此。

然而這書的生命，卻正在這里。他描出了背着傳統，又爲世界思潮所激盪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漸寫來，並無遮瞞，也不裝點，雖然間或有若干辯解，而這些辯解，卻又正是脫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將爲現在作一面明鏡，爲將來留一種記錄，是無疑的罷。多少偉大的招牌，去年以來，在文攤上都掛過了，但不到一年，便以變相和無物，自己告發了全盤的欺騙，中國如果還會有文藝，當然先要以這樣直說自己所本有的內容的著作，來打退

騙局以後的空虛。因爲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漸向戰場的一段，無論意識如何，總之，許多青年，從東江起，而上海，而武漢，而江西，爲革命戰鬪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種種的希望，死在戰場上，再看，不見上面擺起來的是金交椅呢還是虎皮交椅。種種革命，便都是這樣地進行，所以掉弄筆墨的，從實行者看來，究竟還是閒人之業。

這部書的成就，是由於曾經革命而沒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說的人們，當有許多發生同感。

技術，是未曾矯揉造作的。因爲事情是按年敘述的，所以文章也傾瀉而下，至使作者在後記裏，不願稱之爲小說，但也自然是小說。我所感到累贅的只是說理之處過于多，校讀時刪節了一點，倘使反而損傷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責任。還有好像缺點而其實是優長之處，是語彙的不豐，新文學興起以來，未忘積習而常用成語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亂用誰也不懂的生語如創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藝和大衆隔離，這部書卻加以掃蕩

了，使讀者可以更易于了解，然而從中作梗的還有許多新名詞。

通讀了這部書，已經在一月之前了，因為不得不寫幾句，便憑着現在所記得的寫了這些字。我不是什麼社的內定的『鬪爭』的『批評家』之一員，只能直說自己所願意說的話。我極欣幸能介紹這真實的作品于中國，還渴望看見『重上征途』以後之作的
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於上海，魯迅記。

柔石作『二月』小引

衝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沈沈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倒也並非如蜘蛛張網，專一在待飛翔的游人，但在尋求安靜的青年的眼中，卻化爲不安的大苦痛，這大苦痛，便是社會的可憐的椒鹽，和戰士孤兒等輩一同，給無聊的社會一些味道，使他們無聊地持續下去。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于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尙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溼，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裏。他極想有爲，懷着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終于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爲一小齒輪，跟着大齒

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瞿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覩宮女們睡態之醜，於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為是醉飽後的嘔吐。那麼，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後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于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恣態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魯迅記於上海。

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傢伙，則都是『天』。

孔子之徒爲儒，墨子之徒爲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爲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餽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

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中的章秋谷，以為他給妓

女喫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槓，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爲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憎惡嘲罵的，但只嘲罵一種人，是做嘲罵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不以其不滿于現狀的人爲然的，但只不滿于一種現狀，是現在竟有不滿于現狀者。

這大約就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然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鬪毆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麼？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爲就是這一個道理。

但老例，劊子手和皂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于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

現在新月社的批評家這樣盡力地維持了治安，所要的卻不過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決不實現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別一種維持治安法，竟連想也不准想了。從此以後，恐怕要不滿于兩種現狀了罷。

書籍和財色

今年在上海所見，專以小孩子爲對手的糖擔，十有九帶了賭博性了，用一個銅元，經一種手續，可有得到一個銅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專以學生爲對手的書店，所給的希望卻更其大，更其多——因爲那對手是學生的緣故。

三 閱 集

書籍用實價，廢去『碼洋』的陋習，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書局的，後來上海也多仿行，蓋那時改革潮流正盛，以爲買賣兩方面，都是志在改進的人（書店之以介紹文化者自居，至今還時見于廣告上，）正不必先定虛價，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騙的把戲。然而將麻雀牌送給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對於這樣簡捷了當，沒有意外之利的辦法，是終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現了，先是小試其技：送畫片。繼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

對折，但自然又不是舊法，因為總有一個定期和原因，或者因為學校開學，或者因為本店開張一年半的紀念之類。花色一點的還有贈絲襪，請喫冰淇淋，附送一隻錦盒，內藏十件寶貝，價值不貲。更加見得切實，然而確是驚人的，是定一年報或買幾本書，便有得到『勸學獎金』一百元或『留學經費』二千元的希望。洋場上的『輪盤賭』付給贏家的錢，最多也不過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買書，那『希望』之大，遠甚遠甚。

我們的古人有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現在漸在實現了。但後一句，『書中自有顏如玉』呢？

日報所附送的畫報上，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而登載的什麼『女校高材生』和什麼『女士在樹下讀書』的照相之類，且作別論，則買書一元，贈送裸體畫片的勾當，是應該舉爲帶着『顏如玉』氣味的一例的了。在醫學上，『婦人科』雖然設有專科，但在文藝上，『女作家』分爲一類卻未免濫用了體質的差別，令人覺得有些特別的。但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獸站着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

博士也改絃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此道遂有中衰之歎了。

書籍的銷路如果再消沈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員賣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給買主又有得到『勸學』、『留學』的款子的希望。

我和『語絲』的始終

同我關係較爲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爲『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去年，非罵魯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沒落的時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給我兩本中途的山雨，打開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和孫伏園君在北京因被晨報館所壓迫，創辦語絲，現在自己一做編輯，便在投稿後面亂加按語，曲解原意，壓迫別的作者了，孫伏園君卻有絕好的議論，所以此後魯迅應該聽命於伏園。這聽說是張孟聞先生的大文，雖然署名是另外兩個字。看來好像一羣人，其實不過一兩個，這種事現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壞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崙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前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

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

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爲戰鬪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 Anatole France 的小說了。

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寓裏來爲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爲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

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園爲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沈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週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是什麼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會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爲語

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爲難，便由于這一點。但是，叱吧兒狗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峯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于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入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

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于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

『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于「吶喊」而終于「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

的餘波，從我這裡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于是小峯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只好捱住了多睜眼而少開口的小峯，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贏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

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務，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牠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六年。

這一年，小峯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託的。于是擔任了。從這時起，我纔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

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里逕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尙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于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爲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爲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登載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卻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于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

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裏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卻確實也在消沈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然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介紹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着我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上，就能見『虎標良藥』的招牌。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只要有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

是在文壇上做工夫。語絲初辦的時候，對於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為是同人雜誌，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機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于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並非惡行，但善後辦法，卻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向醫藥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幾封詰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來的反對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當機廠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峯，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並無答覆，但從此以後，廣告卻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峯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為這時對於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只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並非純粹的同人雜誌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峯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峯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于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爲什麼，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於語絲四年中的瑣事。試將前幾期和近幾期一比較，便知道其間的變化，有怎樣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幾乎不提時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這是因爲容易充滿頁數而又可免於遭殃。雖然因爲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裏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至今尙爲舊的和自以爲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力是屬於往昔的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M·阿爾志跋綏夫作中篇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一九二二年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曲。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愛羅先珂童話集（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雲（俄國V·愛羅先珂作童話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吶喊（短篇小說集，一九一八至二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國小說史略上册（改訂之北京大學文科講義。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悶的象徵（日本廚川白村作論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中國小說史略下册（印行所同上。後合上册爲一本。）

一九二五年

熱風（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評。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說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短評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續編（短評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說舊聞鈔（輯錄舊文，間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廚川白村作隨筆，選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刊之一，今歸北新

書局。）

一九二七年

墳（一九〇七至二五年的論文及隨筆。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華夕拾（回憶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書局另排印行。）

唐宋傳奇集十卷（輯錄并考正。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八年

小約翰（荷蘭F·望·藹覃作長篇童話。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詩。北新書局印行。）

而已集（短評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選譯。印行所同上，今絕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板垣鷹穗作。印行所同上。）

落谷虹兒畫選（并譯題詞。朝華社印行藝苑朝華之一，今絕版。）

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店印行文藝理論小叢書之

一）

藝術論（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〇年

藝術論（俄國G·蒲力汗諾夫作。光華書局印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水沫書店印行同叢書之一。）

文藝政策（蘇聯關於文藝的會議錄及決議。並同上。）

十月（蘇聯A·雅各武萊夫作長篇小說。神州國光社收稿爲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今尙未印。）

一九三一年

藥用植物（日本刈米達夫作。商務印書館收稿，分載自然界中。）

毀滅（蘇聯A·法捷耶夫作長篇小說。三閒書屋印行。）

譯著之外，又有所校勘者，為：

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遺。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叢書堂鈔本，并補遺。未印。）

所纂輯者，為：

古小說鈞沈三十六卷（輯周至隋散逸小說。未印。）

謝承後漢書輯本五卷（多于汪文臺輯本，未印。）

所編輯者，為：

莽原（週刊。北京京報附送，後停刊。）

語絲（週刊。所編為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後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書

局印行，後廢刊。）

奔流（自一卷一冊起，至二卷五冊停刊。北新書局印行。）

文藝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冊。大江書店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為：

故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印行。烏合叢書之一。）

心的探險（長虹作雜文集。同上。）

飄渺的夢（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詩選。北新書局印行。）

所校訂，校字者，為：

蘇俄之文藝論戰（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北新

書局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十二個（蘇聯A·勃洛克作長詩，胡敦譯。同上。）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V·但兼珂等作短篇小說集，董秋芳譯。同上。）

勇敢的約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間故事詩，孫用譯。湖風書局印行。）

夏娃日記（美國馬克·土溫作小說，李蘭譯。湖風書局印行。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之

一。）

所校訂者，為：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說。朝華社印行，今絕版。）

小小十年（葉永蓀作長篇小說。春潮書局印行。）

窮人（俄國F·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說，韋叢蕪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黑假面人（俄國L·安特來夫作戲曲，李霽野譯。同上。）

紅笑（前人作小說，梅川譯。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H·至爾·妙倫作童話，許霞譯。朝華社印行，今絕版。）

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行。）

浮士德與城（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戲曲，柔石譯。神州國光社印行現代文藝

叢書之一。）

靜靜的頓河（蘇聯M·峻羅訶夫作長篇小說，第一卷，賀非譯。同上。）

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蘇聯V·伊凡諾夫作小說，侍桁譯。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為：

士敏土之圖（德國C·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印。）

鐵流（蘇聯A·綏拉菲摩維支作長篇小說，曹靖華譯。）

鐵流之圖（蘇聯I·畢斯凱萊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燬。）

我所譯著的書，景宋曾經給我開過一個目錄，載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但是並不完全的。這回因為開手編集雜感，打開了裝着和我有關的書籍的書箱，就順便另抄了一張書目，如上。

我還要將這附在三閒集的末尾。這目的，是爲着自己，也有些爲着別人。據書目察核起來，我在過去的近十年中，費去的力氣實在也並不少，即使校對別人的譯著，也真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並且毫不懷着有所利用的意思。雖說做這些事，原因在於『有閒』但我那時卻每日必須將八小時爲生活而出賣，用在譯作和校對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沒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沒有先前那麼起勁了。

但這些陸續用去了的生命，實不只成爲徒勞，據有些批評家言，倒都是應該從嚴發落的罪惡。做了『衆矢之的』者，也已經四五年，開首是『作惡』後來是『受報』了，有幾位論客，還幾分含譏，幾分恐嚇，幾分快意的這樣『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卻並不全是這樣想，我以爲我至今還是存在，只有將近十年沒有創作，而現在還有人稱我爲『作者』卻是很可笑的。

我想，這緣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則在於後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確曾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所出的許多書，功罪

姑且弗論，即使全是罪惡罷，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塊不小的斑痕，要『一腳踢開』，必須有較大的腿勁。憑空的攻擊，似乎也只能一時收些效驗，而最壞的是他們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試再一檢我的書目，那些東西的內容也實在窮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創作既因為我缺少偉大的才能，至今沒有做過一部長篇；翻譯又因為缺少外國語的學力，所以徘徊觀望，不敢譯一種世上著名的鉅製。後來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會跨過的。但僅僅宣傳些在西湖苦吟什麼出奇的新詩，在外國創作着百萬言的小說之類卻不中用。因為言太誇則實難副，志極高而心不專，就永遠只能得傳揚一個可驚可喜的消息；然而靜夜一想，自覺空虛，便又不免焦躁起來，仍然看見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塊很大的『絆腳石』了。

對於爲了遠大的目的，並非因個人之利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但對於只想以筆墨問世的青年，我現在卻敢據幾年的經

驗，以誠懇的心，進一個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還有一點，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跨過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纔好。並不明白文藝的理論而任意做些造謠生事的評論，寫幾句閑話便要撲滅異己的短評，譯幾篇童話就想抹殺一切的翻譯，歸根結蒂，于已于人，還都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

當我被『進步的青年』們所口誅筆伐的時候，我『還不到五十歲，』現在卻真的過了五十歲了，據盧南（E. Renan）說，年紀一大，性情就會苛刻起來。我願意竭力防止這弱點，因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但燈下獨坐，春夜又倍覺淒清，便在百靜中，信筆寫了這一番話。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魯迅于滬北寓樓記。

二心集

序言

這里是一九三〇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于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里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

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剝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爲然的人，只有這樣纔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里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爲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纔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爲『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于『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誹，『臣罪當誅今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 (Franz Mehring) 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喫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纔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了，並且仿『三閒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

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于牆，』——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倒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爲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牠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和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爲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

自一併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并記。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一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三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仿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有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着頭皮看

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書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爲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爲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云。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

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爲『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Proletary 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面，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letar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面』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于以現在爲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 *Chemie* 譯作『舍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鍊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爲『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但于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着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雙眉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于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于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

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滢（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着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于還須伸着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A B C 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瞭。」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麼我願意等着，等着，等着。」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裏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着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纔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麼？」

「好好的餵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着』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爲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爲第一要義，因爲「硬着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蹟，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爲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于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于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麼？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于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爲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

也會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于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麼『奇蹟』，『幹什麼』嗎？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頭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于我如浮雲』。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只要有某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

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徵，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爲還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裏，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嘗不比『天書』還難呢？

三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只能根據我所能了解的一點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於這理論的知識，極不完全了。

但對於這罪過，我們（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故曰『們』）也只能負一部分的責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塗或懶惰來負的。『什麼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和託羅茲基的半部文學與革命，

則確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梁先生對於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於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記曰胡塗，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冷氣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高文，結論是並無階級性。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乾淨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麼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麼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麼，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麼馬克斯』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制度，在這制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于富同情心而又態度褻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鬪的慾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于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嘗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

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鬭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纔是正當的生活鬭爭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不至于以為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為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係為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于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于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為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

辛辛苦苦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倘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為無產者所嘔吐了，將只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讚賞而已了。

那麼，此後如何呢？梁先生以為是不足慮的。因為「這種革命的現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後，優勝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佔優越的地位，無產的仍是無產者。」但無產階級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勢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勢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這裏面包括文藝學術。」

自此以後，這纔入了文藝批評的本題。

四

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

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够了，又何必如此『過于富同情心。』『併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

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託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于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鬭爭；馬克斯並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志行吐屬，過于貴族。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託爾斯泰正因為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只同情于貧民而不主張階級鬭爭。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並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于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志行吐屬，過于王侯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後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于『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只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

文學無緣，」但鑑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無干，因為「鑑賞文學也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階級裏，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由我推論起來，則只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識，也可以賞鑑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據。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麼通俗的戲劇、電影、通俗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確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鑑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

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爲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爲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鬭爭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爲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里就給了一個極分明的例證。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勝利的，所以我們去指導安慰他們去』說出『去了』之後，便來『打發』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文學家，那不消說，是他和梁先生一樣地對於無產文學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爲之』的錯誤。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爲鬭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會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爲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爲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雖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也並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爲他推重大

衆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衆能解的東西，當是指託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一看便會了然的語法，歌調，諷諧，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會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並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

最後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的，是最切實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衆，是不對的。新月上就曾有論翻譯之難，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並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資產文明的餘蔭，而且衷心在擁護牠的作家而言。于號稱無產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的成績。但錢杏邨先生也曾辯護，說新興階級，于文學的本領當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這話爲農工而說，是極不錯的。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爲什麼沒有富翁那麼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在卻實在並無剛剛放下

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知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之後，就連先前的文學本領也隨着消失了麼？不會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歷舍·託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爲階級鬭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鬭爭爲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鬭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學和鬭爭兩方面都少關係了。

但中國目前的一時現象，當然毫不足作無產文學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做無產文學，那總算是一種新興文學，總算是文學國土裏的新收穫，用不着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爲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種欺騙。願意這樣的『無產文學』

者，『現在恐怕實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階級去的『無產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後，都決不是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爲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并又一切階級而鬪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藝批評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裏，向南面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邨兩位先生並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那情形可真是『勞資』美了。

五

到這里，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

推想起來，這是很應該跟着發生的問題：無產文學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能懂，那麼，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爲什麼而譯的呢？不是等于不譯麼？我的回答，是爲了我自己，和幾個以無產文學批評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

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陞為『封建餘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見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裏，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于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據。我于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着

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裏去的『報復。』
梁先生說『他們要報復！』其實豈只『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
然而，我也願意于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
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現在是開書鋪，印 Hauptmann 和 Gregory 夫人的劇本了，那時他
還是革命文學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
着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
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
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了，在這裡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說法又兩樣了，在拓荒
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
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只看名目，連想
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
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那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不貪『爽快，』

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够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卻少，志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于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異類的批評家，看見別人來塗寫紙張了，便喟然興歎，不勝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上，至于稱社會科學的翻譯者為『阿狗阿貓』，其憤憤有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的地位，早為讀者所共知』的蔣光乙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病，看見藏原惟人談到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壞，簡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麼？……（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意于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

先生還舉出書名和壞處，蔣先生卻只嫣然一笑，掃蕩無餘，真是普遍得遠了。藏原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理論和小說的，于我個人就極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這樣的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然而現在呢，這些東西，梁實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爲「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爲適宜的了，可惜養病之後，只出了一本一週間，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種的譯本。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種，尼采的則只有半部，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還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爲我們不能像蔣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綿，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這些話，到這裏還應該簡短地補充幾句，就作為本篇的收場。

新月一出世，就主張『嚴正態度』，但于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並不錯，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種『報復』，而非爲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上兩句也不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健』也不能相容了。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于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習慣與改革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歷，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游民，公司僱員，竟也常常慨然長歎，或者說這很不便于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

過舊曆年，明年一準過新曆年麼？」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曆年不可。但日曆上，卻誠然刪掉了陰曆，只存節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曆，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了。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于無成，如沙上建塔，傾刻倒塌。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為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曆上不準註陰曆，卻來了陰陽合曆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曆，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衆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爲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爲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爲『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够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

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爲葉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爲已經爲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鎗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歎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于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後來在申報上，卻看見了更嚴厲，更徹底的批評，因是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爲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初看彷彿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裏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爲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一定的

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激，而這刺激又須利害，這纔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激之一，正如饕餮者饜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喫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纔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藝，就要澈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爲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纔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澈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一，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爲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助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鬪說，反對鬪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

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卻又化爲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爲別的一切，無一相合，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爲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卻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于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於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想喫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張資平氏據說是『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卻已在收穫了。這就是進步，拔步飛跑，望塵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蹤而往呢，就看見他跑進樂羣書店中。

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慾，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喚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昇，何況神心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穫呀，你明白了沒有？

還有收穫哩。申報報告，今年的大夏學生，敬請『爲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去教『小說學』了。中國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

學的，何況小說先生，當然滿肚子小說學。要不然，他做得出來嗎？我們能保得定荷馬沒有『史詩作法』，沙士比亞沒有『戲劇學概論』嗎？

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想女人嗎，不料女人的性慾衝動比你還要強，自己跑來了。朋友，等着罷。但最可憐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遙遙『崇拜』，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小說學』。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爲『右翼』作家的。爲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鬭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裏，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裏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想不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並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眾應

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這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甯，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甯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又如畢力涅、愛倫堡，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着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

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爲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爲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爲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里去，圍着上帝坐着，上帝請他喫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喫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爲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爲勞動大衆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喫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麪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爲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麪包，連黑麪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衆，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

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鬭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他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牠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利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彷彿在客廳裏放着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緻；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鬭爭，批評家也唱着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

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鬪爭底一翼，牠跟着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鬪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麼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

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于吹擂，不務于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卻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于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韜』。所謂韜，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轉合』，藉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用不到牠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牠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

的，因為這于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于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鞫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為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我們要批評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們這里得不到確鑿的統計，）從去年以來，掛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創作小說的讀者已經減少，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于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于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許多是並不是滋養品，是新袋子裏的酸酒，紅紙包裹的爛肉，那結果，是嗅得胸口癢癢的，好像要嘔吐。

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後，轉而去求醫于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然而，大部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社會科學的譯著又風起雲湧了，較為可看的和很

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開始尋求正確的知識的讀者們已經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評家不開口，類似批評家之流便趁勢一筆抹殺：『阿狗阿貓。』

到這里，我們所需要的，就只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批評家的發生，在中國已經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于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志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纔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着氣。一面喘着氣，一面各自以為勝利，唱着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够。他無聲，但他勝利了。

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臺靜農的地之子，葉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後，總還是優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

先生還在和陳西滢相呼應，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懷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後，搖身一變而成爲『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邨先生近來又只在拓荒者上，攙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每一個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閑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于文藝，也可催促牠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凋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

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贊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為『現在有知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爲什麼呢？因爲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麼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卻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爲三民主義者是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接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搾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爲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爲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他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于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纔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裡，不但

「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梁實秋先生爲了拓荒者上稱他爲『資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氣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裏的一個』之後，再下『走狗』的定義，爲『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于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着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于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

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爲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牠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牠的主子，正是牠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牠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敍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爲確當計，還得添個字，稱爲『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知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于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那一篇裏，很巧妙地插進電桿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裏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

指示着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爲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爲『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爲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的電桿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麼，爲將自己的論敵指爲『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

「進化和退化」小引

這是譯者從十年來所譯的將近百篇的文字中，選出不很專門，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處，希望流傳較廣的本子。一以見最近的進化學說情形，二以見中國人將來的運命。

進化學說之于中國，輸入是頗早的，遠在嚴復的譯述赫胥黎天演論。但終于也不過留下一個空泛的名詞，歐洲大戰時代，又大為論客所誤解，到了現在，連名目也奄奄一息了。其間學說幾經遷流，兌佛黎斯的突變說興而又衰，蘭麻克的環境說廢而復振，我們生息于自然中，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嘗加意。此書首尾的各兩篇，即由新蘭麻克主義立論，可以窺見大概，略彌缺憾的。

但最要緊的是末兩篇。沙漠之逐漸南徙，營養之已難支持，都是中國人極重要，極切

身的問題，倘不解決，所得的將是一個滅亡的結局。可以解中國古史難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國人最能耐苦的謬說，還不過是副次的收穫罷了。林木伐盡，水澤涸枯，將來的一滴水，將和血液等價，倘這事能為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所記憶，那麼，這書所得的酬報，也就非常之大了。

然而自然科學的範圍，所說就到這里為止，那給與的解答，也只是治水和造林。這是一看好像極簡單、容易的事，其實卻並不如此的。我可以引史沫得列女士在『中國鄉村生活斷片』中的兩段話作證——

『她（使女）說，明天她要到南苑去運動獄吏釋放她的親屬。這人，同十六個別的鄉人，男女都有，在三月以前被捕和收監，因為當別的生活資料都沒有了以後，他們曾經砍過樹枝或剝過樹皮。他們這樣做，並非出之搗亂，因為他們可以賣掉木頭來買糧食。』……

『南苑的人民，沒有收成，沒有糧食，沒有工做，就讓有這兩畝田又有什麼用處？……一遇到些少的擾亂，就把整千的人投到災民的隊裏去……南苑在那

時（軍閥混戰時）除了樹木之外什麼都沒有了，當鄉民一對着樹木動手的時候，警察就把他們捉住並且監禁起來。』（萌芽月刊五期一七七頁。）

所以這樣的樹木保護法，結果是增加剝樹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進沙漠的出現。但這書以自然科學為範圍，所以沒有顧及了。接着這自然科學所論的事實之後，更進一步地來加以解決的，則有社會科學在。

（一九三〇年五月五日）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

——夜記之五——

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飈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表，大意說狂飈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着那一篇鍛鍊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

結蒂，終于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衆。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呼殆哉』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諡爲『文忠』一般。于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只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杰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爲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爲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麼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里，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已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麼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于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

「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爲己甚，竊以爲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爲然，因爲『中庸』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麼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麼孟子 孔子了。現在革命方纔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不完）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夜記這東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將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爲一集的，那年就發表了兩篇。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題爲『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黨之類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我也就借此偷懶。不再寫下去，現在連稿子也不見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個書店去做雜誌的編輯，來託我做點隨隨便便，看起來不大頭痛的文章。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記，立了這樣的題目。大意是想說，中國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鈔整篇，而須東拉西扯，補綴得看不出縫，這纔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還是等于沒有做，而批評者則謂之好文章或好人。社會上的一切，什麼也沒有進步的病根就在此。當夜沒有做完，睡覺去了。第二天柔石來訪，將寫下來的給他看，他皺皺眉頭，以為說得太囁嚅一點，且怕過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約他另譯一篇短文，將這放下了。

現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經一年有餘了，偶然從亂紙裏檢出這稿子來，真不勝其悲痛。我想將全文補完，而終于做不到，剛要下筆，又立刻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所謂『人琴俱亡』者，大約也就是這模樣的罷。現在只將這半篇附錄在這里，以作柔石的紀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記。

一九三一年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

事情是這樣的——

一段話：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

「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爲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爲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

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沒有什麼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峯先生的不滿，著論闢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于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于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于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

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爲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爲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 貴刊，希爲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啓上。

一月十九夜。

柔石小傳

柔石，原名平復，姓趙，以一九〇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寧海縣的市門頭。前幾代都是讀書的，到他的父親，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營小小的商業，所以他直到十歲，這纔能入小學。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師範學校；一面爲杭州晨光社之一員，從事新文學運動。畢業後，在慈溪等處爲小學教師，且從事創作，有短篇小說集瘋人一本，即在寧波出版，是爲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爲北京大學旁聽生。

回鄉後，于一九二五年春，爲鎮海中學校務主任，抵抗北洋軍閥的壓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寧海青年，創辦寧海中學，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項，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長，改革全縣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鄉村發生暴動。失敗後，到處反動，較新的全被摧毀，寧海中學既遭解散，柔石也單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藝。十二月為語絲編輯，又與友人設立朝華社，于創作之外，并致力于紹介外國文藝，尤其是北歐、東歐的文學與版畫，出版的有朝華週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藝苑朝華五本。後因代售者不付書價，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〇年春，自由運動大同盟發動，柔石為發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也為基本構成員之一，盡力于普羅文學運動。先被選為執行委員，次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五月間，以左聯代表的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畢後，作一個偉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經特別法庭移交龍華警備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槍決，身中十彈。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學上的成績，創作有詩劇人間的喜劇，未印，小說舊時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譯有盧那卡爾斯基的浮士德與城，戈理基的阿爾泰莫諾夫氏之事業及丹麥短篇小說集等。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繁難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智識的青年們意識到自己的前驅的使命，便首先發出戰叫。這戰叫和勞苦大眾自己的反叛的叫聲一樣地使統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羣起進攻，或者製造謠言，或者親作偵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過證明了他們自己是黑暗的動物。

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于是一面禁止書報，封閉

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祕密處以死刑，至今並未宣布。這一面固然在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一面也在證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的力量，因為如傳略所羅列，我們的幾個遇害的同志的年齡、勇氣，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績，已足使全隊走狗不敢狂吠。

然而我們的這幾個同志已被暗殺了，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干的損失，我們的很大的悲痛。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羣衆的，大衆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衆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战斗，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衆的文學。

現在，軍閥的報告，已說雖是六十歲老婦，也爲『邪說』所中，租界的巡捕，雖對於小學兒童，也時時加以檢查；他們除從帝國主義得來的鎗礮和幾條走狗之外，已將一無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說——的敵人。而他們的這些敵人，便都在我們的這一面。

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鬪爭。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爲美國「新羣衆」作——

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爲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爲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這一點，已經由兩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紹介蒲力汗諾夫（Plekhanov）和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的

文藝理論進到中國的時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 Prof. Irving Babbitt）的門徒，感覺銳敏的『學者』憤慨，他以為文藝原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無產者倘要創作或鑒賞文藝，先應該辛苦地積錢，爬上資產階級去，而不應該大家渾身襤褸，到這花園中來吵嚷。並且造出謠言，說在中國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人，是得了蘇俄的盧布。這方法也並非毫無效力，許多上海的新聞記者就時時捏造新聞，有時還登出盧布的數目。但明白的讀者們並不相信它，因為比起這種紙上的新聞來，他們卻更切實地在事實上看見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鎗礮。

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壓了。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綏拉菲摩維支（A. Serafimovitch），伊凡諾夫（V. Ivanov）和奧格涅夫（H. Ognev）不必說了，連契訶夫（A. Chekhov）和安特來夫（L. 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於是使書店只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 Mr. Cat 和 Miss Rose 談天，稱讚春天如何可愛之類——因為至爾妙倫（H. Zur Mühlen）所作的童話的譯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

竭力稱讚春天。但現在又有一位將軍發怒，與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爲「天」，有失人類的尊嚴了。

單是禁止，還不是根本的辦法，於是今年有五個左翼作家失了踪，經家族去探聽，知道是在警備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見，半月以後，再去問時，卻道已經『解放』——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稱——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報章上，絕無記載。接着是封閉曾出新書或代售新書的書店，多的時候，一天五家，——但現在又陸續開張了，我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惟看書店的廣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漢對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爾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統制階級對於文藝，也並非沒有積極的建設。一方面，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喉使的自己的夥。但這立刻失敗了。因爲裏面滿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隻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雜誌，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爲止，已將十種。然而這

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的善於『解放』的名譽，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談汽車，卻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

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救濟的方法，是去強迫早經有名，而並不分明左傾的作者來做文章，幫助他們的刊物的流布。那結果，是只有一兩個胡塗的中計，多數卻至今未曾動筆，有一個竟嚇得躲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裏面的最寶貴的文藝家，是當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未受迫害，為革命的青年所擁護的時候，自稱左翼，而現在爬到他們的刀下，轉頭來害左翼作家的幾個人，為什麼被他們所寶貴的呢？因為他曾經是左翼，所以他們的有幾種刊物，那面子還有一部分是通紅的，但將其中的農工的圖，換上了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的個個好像病人的圖畫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些讀者們，凡是一向愛讀舊式的強盜小說的和新式的肉慾小說的，倒並不覺得不便。然而較進步的青年，就覺得無書可讀，他們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話很多，內容極少——這樣的纔不至于被禁止——的書，姑且安慰飢渴，因為他們知道，與其去買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還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卻無論如何，仍在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

所以，除官辦及其走狗辦的刊物之外，別的書店的期刊，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篇比較之急進的作品去，他們也知道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眾支持，『將來』正屬於這一面。

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迫，榨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象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這事情很使拿刀

的『文藝家』喜歡。他們以為受教育能到會寫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者應該抱住自己的小資產，現在卻反而傾向無產者，那一定是『虛偽』。惟有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偽』好，所以他們的對于左翼作家的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便是更好的文藝。

但是，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卻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着同一的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Passion)，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

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講——

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要講申報，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記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時的申報，還是用中國竹紙的，單面印，而在那裏做文章的，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才子』。

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爲兩種，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卻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着的古今體詩之類。這是說，才子是公開的看紅樓夢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裏也看紅樓夢，則我無從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時叫作『洋場』也叫『夷場』，後來有怕犯諱的，便往往

寫作『彘場』——有些才子們便跑到上海來，因為才子是曠達的，那里都去；君子則對于外國人的東西總有點厭惡，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決不輕易的亂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才子們看來，就是有點才子氣的，所以君子們的行徑，在才子就謂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候，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像紅樓夢，于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麼婊子當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內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後，終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們又幫申報館印行些明清的小品書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燈謎，有入選的，就用這些書做贈品，所以那流通很廣遠。也有大部書，如儒林外史、三寶太監西洋記、快心編等。現在我們在舊書攤上，有時還看見第一頁印有『上海申報館仿聚珍板印』字樣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書盛行的好幾年，後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變了。他們發見了佳人並非因爲『愛才若渴』而做姨子的，佳人祇爲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于是想了種種制伏姨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佔了她們的便宜，敘述這各種手段的小說就出現了，社會上也很風行，因爲可以做嫖學教科書去讀。這些書裏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十（加）猷子，而是在姨子那里得了勝利的英雄豪傑，是才子十流氓。

在這之前，早已出現了一種畫報，名目就叫點石齋畫報，是吳友如主筆的，神仙人物，內外新聞，無所不畫，但對於外國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畫戰艦罷，是一隻商船，而艙面上擺着野戰砲；畫決鬪則兩個穿禮服的軍人在客廳裏拔長刀相擊，至于將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畫『老鴛鴦妓』、『流氓拆梢』之類，卻實在畫得很好的，我想，這是因爲他看得太多了的緣故；就是在現在，我們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畫一般的臉孔。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時務』——這名稱在那時就如現在之所謂『新學』——的人們的耳目。前幾年又翻印了，叫作吳友如墨寶，而影響到後來也實在利害，小說上的繡像不必說了，就是在教科書的插畫上，也常常看見所畫的孩子大抵

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臉橫肉，一副流氓氣。在現在，新的流氓畫家又出了葉靈鳳先生，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的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剝來的，畢亞茲萊是「為藝術的藝術」派，他的畫極受日本的『浮世繪』（Ukiyoe）的影響。浮世繪雖是民間藝術，但所畫的多是妓女和戲子，胖胖的身體，斜視的眼睛——Frôlic（色情的）眼睛。不過畢亞茲萊畫的人物卻瘦瘦的，那是因為他是頹廢派（Decadence）的緣故。頹廢派的人們多是瘦削的，頹喪的，對於壯健的女人他有點慚愧，所以不喜歡。我們的葉先生的新斜眼畫，正和吳友如的老斜眼畫合流，那自然應該流行好幾年。但他也並不只畫流氓的，有一個時期也畫過普羅列塔利亞，不過所畫的工人也還是斜視眼，伸着特別大的拳頭。但我以為畫普羅列塔利亞應該是寫實的，照工人原來的面貌，並不須畫那拳頭比腦袋還要大。

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很受着這『才子+流氓』式的影響，裏面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看了之後，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

才子十流氓的小說，但也漸漸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則因為總是這一套老調子——妓女耍錢，嫖客用手段，原不會寫不完的，二則因為所用的是蘇白，如什麼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類，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們之外，誰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十佳人的書，卻又出了一本當時震動一時的小說，那就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迦茵小傳 (H. R. Haggard: 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據譯者說，原本從舊書攤上得來，非常之好，可惜覓不到下冊，無可奈何了。果然，這很打動了才子佳人們的芳心，流行得很廣很廣。後來還至于打動了林琴南先生，將全部譯出，仍舊名為迦茵小傳。而同時受了先譯者的大罵，說他不該全譯，使迦茵的價值降低，給讀者以不快的。于是纔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實非原本殘缺，乃是因為記着迦茵生了一個私生子，譯者故意不譯的。其實這樣的一部並不很長的書，外國也不至于分印成兩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對於婚姻的見解了。

這時新的才子十佳人小說便又流行起來，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陰花下，像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但有時因為嚴親，或者因為薄命，也竟

至于偶見悲劇的結局，不再都成神仙了，——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到了近來是在製造兼可擦臉的牙粉了的天虛我生先生所編的月刊雜誌眉語出現的時候，是這鴛鴦蝴蝶式文學的極盛時期。後來眉語雖遭禁止，勢力卻並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來，這纔受了打擊。這時有伊孛生的劇本的介紹和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的別一形式的出現，雖然並不是故意的，然而鴛鴦蝴蝶派作為命根的那婚姻問題，卻也因此而諾拉（Nora）似的跑掉了。

這後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的出現。創造社是尊貴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專重自我的，崇創作，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那出馬的第一個廣告上，說有人「壟斷」着文壇，就是指着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卻也正相反，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是一面創作，一面也看重翻譯的，是注意于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的，這些都是小國度，沒有人懂得他們的文字，因此也幾乎全都是重譯的。並且因為曾經聲援過新青年，新離夾舊離，所以文學研究會這時就受了三方面的攻擊。一方面就是創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藝術，那麼看那為人生的藝術的文學研究會自然就是多管閑事，

不免有些『俗』氣，而且還以為無能，所以倘被發見一處誤譯，有時竟至于特做一篇長長的專論。一方面是留學過美國的紳士派，他們以為文藝是專給老爺太太們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爺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學士、藝術家、教授、小姐等等，要會說Yes, No。這才是紳士的莊嚴，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麼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第三方面，則就是以前說過的鴛鴦蝴蝶派，我不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到底使書店老板將編輯小說月報的一個文學研究會會員撤換，還出了小說世界，去流布他們的文章。這一種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創造社的這一戰，從表面看來，是勝利的。許多作品，既和當時的自命才子們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幫助，勢力雄厚起來了。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員的譯著的出版，——這是說，郭沫若和張資平兩位先生的稿件。這以來，據我所記得，是創造社也不再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誤譯之處，來作專論了。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十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敵不過『老上海』的，創造社員在凱歌聲中，終於覺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們的出版者的商品，種種努力，在老板看來，就

等于眼鏡鋪大玻璃窗裏紙人的映眼，不過是『以廣招徠。』待到希圖獨立出版的時，老板就給喫了一場官司，雖然也終於獨立，說是一切書籍，大加改訂，另行印刷，從新開張了，然而舊老板卻還是永遠用了舊版子，只是印、賣，而且年年是什麼紀念的大廉價。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獨立也活不下去。創造社的人們的去路，自然是在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在廣東，于是也有『革命文學』這名詞的出現，然而並無什麼作品，在上海，則並且還沒有這名詞。

到了前年，『革命文學』這名目這纔旺盛起來了，主張的是從『革命策源地』回來的幾個創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自然是因為由于社會的背景，一般羣衆、青年有了這樣的要求。當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跑到實際工作去了，那時還沒有什麼顯著的革命文學運動，到了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羣衆，而死剩的青年們再入于被壓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纔有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于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

挫折；雖然其中也有些是舊文人解下指揮刀來重理筆墨的舊業，有些是幾個青年被從實際工作排出，只好藉此謀生，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在新份子裏，是很有極堅實正確的人存在的。但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畫，很有些錯誤之處的。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纔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地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利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頹廢得快。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据典。譬如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鬪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見一男一女的鄉下人在走路，他就說，『喂，你們這樣子，有傷風化，你們犯了法了！』他用的

是中國法。倘看見一個鄉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說，『喂，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該捉到捕房去！』這時所用的又是外國法。但結果是無所謂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幾個錢就都完事。

在中國，去年的革命文學者和前年很有點不同了。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變，但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裏，還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斷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張十分激烈，以為凡非革命文學，統得掃蕩的人，去年卻記得了列甯愛看岡卻羅夫（Гонтчаров）的作品，覺得非革命文學，意義倒也十分深長；還有最徹底的革命文學家葉靈鳳先生，他描寫革命家，徹底到每次上茅廁時候都用我的吶喊去揩屁股，現在卻竟會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屁股後面了。

類似的例，還可以舉出向培良先生來。在革命漸漸高揚的時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

先前，還曾經說，青年人不但嗥叫，還要露出狼牙來。這自然也不壞，但也應該小心，因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馴服的時候，是就要變而為狗的，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好壞鬪爭』的武器。狗也是將人分為兩種的，豢養牠的主人之類是好人，別的窮人和乞丐在牠的眼裏就是壞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這也還不算壞，因為究竟還有一點野性，如果再一變而為吧兒狗，好像不管閑事，而其實在給主子盡職，那就正如現在的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只好去點綴大學教室了。

這樣的翻着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 A 要變 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于是就變成了 B。譬如水的結冰，溫度須到零點，同時又須有空氣的振動，倘沒有這，則即便到了零點，也還是不結冰，這時空氣一振動，這纔突變而為冰了。所

以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卻並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因為這時已經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但也正因為更加堅實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因為有了這樣的迫壓和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將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喫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麪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有的寫悔過書，有的是反轉來攻擊左聯，以顯出他今年的見識又進了一步。這雖然並非左聯直接的自動，然而也是一種掃蕩，這些作者，是無論變與不變，總寫不出好的作品來的。

但現存的左翼作家，能寫出好的無產階級文學來麼？我想，也很難。這是因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緣故。日本的廚川白村（H. Kuriyakawa）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說：作家之所描寫，必得是

自己經驗過的麼？他自答道，不必，因為他能够體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姦，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裏，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够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於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致命與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並非要將本階級或資產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產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閱於牆，』兩方一樣是敵對。但是，那結果，卻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爲一粒泡沫的。對於這些的作品，我以為實在無須稱之爲無產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爲了將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爲無產階級的作家的。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牠的底細，尤其是認爲敵人的底細。隨手舉一個例罷，先前的列寧青年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將這分爲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爲無產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爲小資產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爲資產階級文學派，卻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這就在表明：這位青年批評家對於愈認爲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鬪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纔有希望。我想，這是在現在環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還可以做得到的。

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着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饉狀態。文

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得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爲『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

在一部舊的筆記小說——我忘了牠的書名了——上，曾經載有一個故事，說明朝有一個武官叫說書人講故事，他便對他講檀道濟——晉朝的一個將軍，講完之後，那武官就吩咐打說書人一頓，人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他既然對我講檀道濟，那麼，對檀道濟是一定去講我的了。』現在的統治者也神經衰弱到像這武官一樣，什麼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佈置了比先前更進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卻用着更利害的流氓手段：用廣告，用誣陷，用恐嚇；甚至於有幾個文學者還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圖得到

安穩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了，較之簡單地用着文藝的鬭爭，就非常費力，而因此也就影響到文藝上面來。

現在上海雖然還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謂文藝雜誌，其實卻等于空虛。以營業爲目的的書店所出的東西，因爲怕遭殃，就竭力選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如說『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類，那特色是在令人從頭看到末尾，終于等于不看。至于官辦的，或對官場去湊趣的雜誌呢，作者又都是烏合之衆，共同的目的只在撈幾文稿費，什麼『英國維多利亞朝的文學』呀，『論劉易士得到諾貝爾獎金』呀，連自己也並不相信所發的議論，連自己也並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說，現在上海所出的文藝雜誌都等于空虛，革命者的文藝固然被壓迫了，而壓迫者所辦的文藝雜誌上也沒有什麼文藝可見。然而，壓迫者當真沒有文藝麼？有是有的，不過並非這些，而是通電、告示、新聞、民族主義的『文學』、法官的判詞等。例如前幾天，申報上就記着一個女人控訴他的丈夫強迫雞姦並毆打得皮膚上成了青傷的事，而法官的判詞卻道，法律上並無禁止丈夫雞姦妻子的明文，

而皮膚打得發青，也並不算毀損了生理的機能，所以那控訴就不能成立。現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訴他的女人的『誣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學，卻學過一點，皮膚被打得發青，肺、肝、或腸胃的生理的機能固然不至于毀損，然而發青之處的皮膚的生理的機能卻是毀損了的。這在中國的現在，雖然常常遇見，不算什麼稀奇事，但我以為這就已經能夠很明白的知道社會上的一部分現象，勝于一篇平凡的小說或長詩了。

除以上所說之外，那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鬧得已經很久了武俠小說之類，是也還應該詳細解剖的。但現在時間已經不夠，只得待將來有機會再講了。今天就這樣爲止罷。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現在有自以爲大有見識的人，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然而這樣的藝術，在現在的社會裏，是斷斷沒有的。看罷，這便是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的人，也已將人類分爲對的和錯的，或好的和壞的，而將所謂錯的或壞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現在的藝術，總要一面得到蔑視、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擁護、支持。

一八藝社也將逃不出這例子。因爲它在這舊社會裏，是新的、年青的、前進的。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們的履歷和作品的題目——故意題得香豔、漂渺、古怪、雄深。連騙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

這里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

自然，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這一面。

我的話，也就是只對這一面說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答文藝新聞社問

——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九月二十一日。）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羣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

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爲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着前膛鎗或後膛鎗，來福鎗，毛瑟鎗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爲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麼？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次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于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爲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够較爲遠聞的特色，于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爲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麼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捲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鬭爭愈加鋒利的时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說是這污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爲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扎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

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羣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

『每天晚上站着那閃爍的羣星之下，手裏執着馬鎗，耳中聽着蟲鳴。四週飛動着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非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鬪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非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非洲的阿剌伯人，

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就明了中國軍閥爲什麼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爲他們自己以爲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爲什麼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爲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

三

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據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卻還有並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於『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是聰明的，他聽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議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薰陶，』並且考據中外史傳之後，接着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

題目的劇詩，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蹟，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幹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構成是漢、韃靼、女真、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後來四種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種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着屍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醜；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螻首變成瘳猛的觸體；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裏蠻爭惡鬪；

千年的棺材洩出牠凶穢的惡臭；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鐵蹄踐着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復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喫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着『幹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喫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爲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已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異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壞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幹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爲未受傅彥長先生的薰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非洲的阿刺伯人了嗎？！

五

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

『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異的。理想和現實本來易于衝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望。于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啊，下個最後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鎗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體築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脚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戰歌。民國日報載）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肉人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鏽住賊子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礮口。

去，戰場上去，

憑着我們一股勇氣，

憑着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

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裏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體』用『純愛的精靈』用『屍體』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里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麼，惟一的路也實在只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志願，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

快起來奮鬥，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衝，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

朋友喲，

準備着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給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羣是發揚踔厲，一羣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

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六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薰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衝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裏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于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幹羅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搜……』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

皇帝也像對於『幹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來帖來敦請的。所以，這瀋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衝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麼，『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沈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擾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洩，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裏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着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背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

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纔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沈滓的泛起

日本佔據了東三省以後的在上海一帶的表示，報章上叫作『國難聲中』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沈滓，新的沈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現在可以說能打仗的，是要操練久不想起的洋鎗了，但也有現在也不想說去打仗的，那就照歐洲大戰時候的德意志帝國的例，來『頭腦動員』以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有的去查『唐書』說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說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記得了文天祥、岳飛、林則徐——但自然，更積極的是新的文藝界。

先說一點另外的事罷，這叫作『和平聲中』。在這樣的聲中，是『胡展堂先生』到

了上海，據說還告誡青年。教他們要養『力』勿使『氣』。靈藥就有了。第二天在報上便見廣告道：『胡漢民先生說，對日外交，應確定一堅強之原則，並勸勉青年須養力，毋洩氣，養力就是強身，洩氣就是悲觀，要強身祛悲觀，須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這樣的寶貝是什麼呢？是美國的一張舊影片，將探險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兩親家遊非洲。』

至于真的『國難聲中的興奮劑』呢，那是『愛國歌舞表演』自己說，『是民族性的活躍，是歌舞界的精髓，促進同胞的努力，達到最後的勝利』的。倘有知道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誰麼？王人美、薛伶仙、黎莉莉。

然而終於『上海文藝界大團結』了。草野（六卷七號）上記着盛況道：『上海文藝界同人，平時很少聯絡，在嚴重時期，除各個參加其他團體的工作外，復由謝六逸、朱應鵬、徐蔚南三人發起，……集會討論。在十月六日下午三點鐘，已陸續到了東亞食堂，……略進茶點，即開始討論，頗多發揮，……最後定名為上海文藝界救國會』云。

『發揮』我們還無從知道，僅據眼前的方法看起來，是先看『兩親家遊非洲』以養力，又看『愛國的歌舞表演』以興奮，更看日本小品文選和藝術三家言並且略進茶

點而發揮。那麼，中國就得救了。

不成。這恐怕不必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囡，也未必會相信。沒有法子，只得再加上兩個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愛國文藝家所主宰的申報所發表出來的——

十月五日的自由談裏葉華女士云：

『無辦法之國民，如何有有辦法之政府。國聯絕望矣。……際茲一髮千鈞，全國國民宜各立所志，各盡所能，各抒所見，余也不才，謹以戰犬問題商諸國人……各犬中，要以德國警犬最稱職，余極主張吾國可選擇是犬作戰……』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談裏『甦民自漢口寄』云：

『日者寓書滬友王子仲良，間及余之病狀，而以不能投身義勇軍爲憾。王子……竟以靈藥一裹見寄，云爲培生製藥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癆咳血，可一試之……余立行試服，則咳果止，兼旬而後，體氣漸復，因念……一旦國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壯志，滅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連病夫也立刻可以當兵，警犬也將幫同愛國，在愛國文藝家的指導之下，真是

大可樂觀，要『滅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囡，也會覺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稱爲『廣告』的，也都不過是出賣舊貨的新廣告，要趁『國難聲中』或『和平聲中』將利益更多的攆到自己的手裏的。

因爲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面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爲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爲泛起來的是沈滓，沈滓又究竟不過是沈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沈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以腳報國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報的自由談裏，又看見了署名寄萍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其中的一段，我覺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

「……有一天我們到比利時一個鄉村裏去。許多女人爭着來看我的腳。我伸起腳來給伊們看。才平服伊們好奇的疑竇。一位女人說「我們也向來不會見過中國人。但從小就聽說中國人是有尾巴的。（即辮髮）都要討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如今才明白這話不確實。請原諒我們的錯念。」還有一人自以為熟悉東亞情形的，帶着譏笑的态度說：「中國的軍閥如何專橫。到處鬧的是兵匪。人民過着地獄的生活。」這種似是而非的話，說了

一大堆。我說「此種傳說全無根據。」同行的某君，也報以很滑稽的話。「我看你們那裏會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等我們革命成功之後，簡直要把顯微鏡來照你們比利時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們的楊女士雖然用她的尊腳征服了比利時女人，爲國增光，但也有兩點『錯念』。其一、是我們中國人的確有過尾巴（卽辮髮）的，纏過小脚的，討過姨太太的，雖現在也在討。其二、是楊女士的腳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女人的腳，正如留學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國的女性一般。留學生大多數是家裏有錢，或由政府派遣，爲的是將來給家族或國家增光，貧窮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麼能同日而語。所以，雖在現在，其實是纏着小脚，『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女人還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談，只要看同一的申報上，記載着多少『呼籲和平』的電，多少募集急賑的廣告，多少兵變和綁票的記事，留學外國的少爺小姐們雖然相隔太遠，可以說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顯微鏡，難道就不能想到用望遠鏡嗎？況且又何必用望遠鏡呢，同一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裏就又說：

「……據說使領館的窮困，不自今日始。不過近幾年來，有每況愈下之勢。譬如逢到我國國慶或是重大紀念日，照例須招待外賓，舉行盛典，意思是慶祝國運方興，兼之聯絡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領館必備盛宴，款待上賓，到了去年，爲館費支絀，改行茶會，以目前的形勢推測，將後恐怕連茶會都開不成呢。在國際上最講究體面的，要算日本國，他們政府行政費的預算，寧可特別節省，惟獨於駐外使領館的經費，十分充足。單就這一點來比較，我們已相形見拙了。」

使館和領事館是代表本國，如楊女士所說，要『慶祝國運方興』的，而竟有『每況愈下之勢』。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人民的過着什麼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國比利時的女人們究竟是單純的，終於請求了原諒，假使她們真『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沒有面子了。

假如這樣，又怎麼辦呢？我想，也還是『就此一笑而散』罷。

唐朝的釘梢

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捨，術語謂之『釘梢』、『釘』者，堅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後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據釘梢專家說，那第二步便是『扳談』；即使罵，也就大有希望，因為一罵便可有言語來往，所以也就是『扳談』的開頭。我一向以為這是現在的洋場上纔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那裏面有張泌的浣溪紗調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迴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從，便須伴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這分明和現代的釘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譯成白話詩，大概可以是這樣：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

只能帶着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但恐怕在古書上，更早的也還能夠發見，我極希望博學者見教，因為這是對於研究『釘梢史』的人，極有用處的。

『夏娃日記』小引

瑪克·吐溫(Mark Twain)無須多說，只要一翻美國文學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紀末至現世紀初有名的幽默家(Humorist)。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開眼笑，就是他那筆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萊門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原是一個領港，在發表作品的時候，便取量水時所喊的訛音，用作了筆名。作品很為當時所歡迎，他即被看作講笑話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遺著，‘The Mysterious Stranger’，一出版，卻分明證實了他是很深的厭世思想的懷抱者了。

含着哀怨而在嘻笑爲什麼會這樣的？

我們知道，美國出過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出過霍桑 (N. Hawthorne)，出過惠德曼 (W. Whiteman)，都不是這麼表裏兩樣的。然而這是南北戰爭以前的事。這之後，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來，因為這之後，美國已成了產業主義的社會，個性都得鑄在一個模子裏，不再能主張自我了。如果主張，就要受迫害。這時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應該怎樣發揮自己的個性，而是怎樣寫去，纔能有人愛讀，賣掉原稿，得到聲名。連有名如荷惠勒 (W. D. Howells) 的，也以爲文學者的能爲世間所容。是在他給人以娛樂。于是有些野性未馴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國，如詹謨士 (Henry James)，有的講講笑話，就是瑪克·士溫。

那麼，他的成了幽默家，是爲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諷刺，則是不甘于這樣的生活的緣故了。因爲這一點點的反抗，就使現在新土地裏的兒童，還笑道：瑪克·士溫是我們的。

這『夏娃日記』 (Eve's Diary) 出版于一九〇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雖然不過一種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點，敘述裏夾着譏評，形成那時的美國姑娘，而作者以

爲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臉上的笑影，卻分明是有了年紀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純熟的手腕，令人一時難以看出，仍不失爲活潑潑地的作品；又得譯者將丰神傳達，而且朴素無華，幾乎要令人覺得倘使夏娃用中文來做日記，恐怕也就如此一樣：更加值得一看了。

萊勒孚 (Lester Ralph) 的五十餘幅白描的插圖，雖然柔輒，卻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許很容易使人記起中國清季的任渭長的作品，但他所畫的是仙俠高士，瘦削怪誕，遠不如這些的健康；而且對於中國現在看慣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圖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處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夜記。

新的『女將』

在上海製圖版，比別處便當，也似乎好些，所以日報的星期附錄畫報呀，書店的什麼什麼月刊畫報呀，也出得比別處起勁。這些畫報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着大人先生們的什麼什麼會開會或閉會的紀念照片而外，還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爲什麼要紹介于社會的呢？我們只要看那說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女士，B女校皇后，性喜音樂。』

『C女士，D女校高材生，愛養叭兒狗。』

『E女士，F大學肄業，爲G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裝束：春天都是時裝，緊身窄袖；到夏天，將褲腳和袖子都撤掉了，坐在海邊，叫作

『海水浴，』天氣正熱，那原是應該的；入秋：天氣涼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東三省，于是畫報上就出現了白長衫的看護服，或托鎗的戎裝的女士們。

這是可以使讀者喜歡的，因為富于戲劇性。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台上，往往掛着一副對子，一面是『戲場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戲場。』做起戲來，因為是鄉下，還沒有『乾隆帝下江南』之類，所以往往是『雙陽公主追狄，』『薛仁貴招親，』其中的女戰士，看客稱之為『女將。』她頭插雉尾，手執雙刀（或兩端都有鎗尖的長鎗），一出臺，看客就看得更起勁。明知不過是做做戲的，然而看得更起勁了。

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于是遠路的文人學士，便大談什麼『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爲國增光。』而同時，畫報上也就出現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

但願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說，『女士』們都得在繡房裏關起來；我不過說，雄兵解甲而密斯托鎗，是富于戲劇性的而已。

還有事實可以證明。一、誰也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懲膺中國軍』的看護隊的照片；二、日本軍裏是沒有女將的。然而確已動手了。這是因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

宣傳與做戲

就是那剛剛說過的日本人，他們做文章論及中國的國民性的時候，內中往往有一條叫作『善於宣傳。』看他的說明，這『宣傳』兩字卻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y”，而是『對外說謊』的意思。

這宗話，影子是有一點。譬如罷，教育經費用光了，卻還要開幾個學堂，裝裝門面；全國的人們十之九不識字，然而總得請幾位博士，使他對西洋人去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殺頭，一面卻總支撐維持着幾個洋式的『模範監獄』給外國人看看。還有，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爲國前驅。』連體操班也不願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滅此朝食。』

不過，這些究竟還有一點影子；究竟還有幾個學堂，幾個博士，幾個模範監獄，幾個通電，幾套軍裝。所以說是『說謊』是不對的。這就是我之所謂『做戲』。

但這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真的做戲，是只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復為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戲臺上的時候是關雲長，是林黛玉，下臺就成了普通人，所以並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後，就永遠提着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只好算是發熱昏了。

不幸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臺的時候，例如楊縵華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國比利時女人的『中國女人纏足說』，為面子起見，用權術來解圍，這還可以說是很該原諒的。但我以為應該這樣就拉倒。現在回到寓裏，做成文章，這就是進了後臺，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而且又將那文章送到中國的申報上來發表，則簡直是提着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裏來了。難道作者真已忘記了中國女人曾經纏腳，至今也還有正在纏腳的麼？還是以為中國人都已經自己催眠，覺得全國女

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相像的還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知難行難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于『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

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麼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于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鬧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聞：

『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係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

（十月十四日申報）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爲什麼呢？因爲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爲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纔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麼。

爲什麼呢？因爲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瀋陽事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于「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

幾條『順』的翻譯

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卻要算趙教授的主張最爲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

『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

這一條格言雖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對於讀者是有效力的。因爲『信而不順』的譯文，一看便覺得費力，要借書來休養精神的讀者，自然就會佩服趙景深教授的格言。至於『順而不信』的譯文，卻是倘不對照原文，就連那『不信』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來對照的讀者，中國有幾個呢。這時候，必須讀者比譯者知道得更多一點，才可以

看出其中的錯誤，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則，就只好胡里胡塗的裝進腦子裏去了。

我對於科學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沒有什麼外國書，只好看譯本，但近來往往遇見疑難的地方。隨便舉幾個例子罷。『萬有文庫』裏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學淺說裏，有這樣的一句——

『最近如尼爾及厄爾兩氏之對於麥……』

據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個生物學名家 Nilsson-Ehle 是考驗小麥的遺傳的，但他是一個人而兼兩姓，應該譯作『尼爾生厄爾』才對。現在稱爲『兩氏』又加了『及』，順是順的，卻很使我疑心是別的兩位了。不過這是小問題，雖然，要講生物學，連這些小節也不應該忽略，但我們姑且模模胡胡罷。

今年的三月號小說月報上馮厚生先生譯的老人裏，又有這樣的一句——

『他由傷寒病變爲流行性的感冒(Influenza)的重病……』

這也是很『順』的，但據我所知道，流行性感胃並不比傷寒重，而且一個是呼吸系病，一個是消化系病，無論你怎樣『變』也『變』不過去的。須是『傷風』或『中寒』

這才變得過去。但小說不比生物學淺說，我們也姑且模模糊糊罷。這回另外來看一個奇特的實驗。

這一種實驗，是出在何定傑及張志耀兩位合譯的美國 Conklin 所作的遺傳與環境裏面的。那譯文是——

『……他們先取出兔眼睛內髓質之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種「代晶質」，足以透視這種外來的蛋白質精以後，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於受孕之雌兔。雌兔經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們的眼睛或晶體並不見有若何之傷害，並且他們卵巢內所蓄之卵，亦不見有什麼特別之傷害，因為就他們以後所生的小兔看來，並沒有生而具殘缺不全之眼者。』

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頗『順』，可以懂得的。但仔細一想，卻不免不懂起來了。一、『髓質之晶體』是什麼？因為水晶體是沒有髓質皮質之分的。二、『代晶質』又是什麼？三、『透視外來的蛋白質』又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原文能對，實在苦惱得很，想來想去，才以為恐怕是應該改譯為這樣的——

「他們先取兔眼內的製成漿狀（以便注射）的水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感應了這外來的蛋白質（即漿狀的水晶體）而生「抗晶質」（即抵抗這漿狀水晶體的物質。）然後再取其血清，而注射于懷孕之雌兔……」。

以上不過隨手引來的幾個例，此外情隨事遷，忘卻了的還不少，有許多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流過去，或者照樣錯誤地裝在我的腦裏了。但即此幾個例子，我們就已經可以決定，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麼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風馬牛

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大將趙景深先生，近來卻並沒有譯什麼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說月報上，將國外文壇消息，來介紹給我們。這自然是很可感謝的。那些消息，是譯來的呢，還是介紹者自去打聽來，研究來的？我們無從捉摸。即使是譯來的罷，但大抵沒有說明出處，我們也無從考查。自然，在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趙先生，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貫徹了宗旨。

然而，疑難之處，我卻還是遇到的。

在二月號的小說月報裏，趙先生將『新羣衆作家近訊』告訴我們，其一道：『格羅潑已將馬戲的圖畫故事，"Alay Cop"脫稿。』這是極『順』的，但待到看見了這本圖

畫卻不盡是馬戲。借得英文字典來，將書名下面注着的兩行英文“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查了一遍，才知道原來並不是『馬戲』的故事，而是『做馬戲的戲子們』的故事。這麼一說，自然有些『不順』了。但內容既然是這樣的，另外也沒有法子想。必須是『馬戲子』這才會有的“Love”。

小說月報到了十一月號，趙先生又告訴了我們『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連最後的一冊「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發白，因為這是茄門話，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濟學校也幾乎無處可借，那里還敢發生什麼貳心。然而那下面的一個名詞，卻不寫尚可，一寫倒成了疑難雜症。這字大約是源于希臘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們還常常看見用它做畫材的圖畫，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卻是馬，不是牛。牛馬同是哺乳動物，爲了要『順』固然混用一回也不關緊要，但究竟馬是奇蹄類，牛是偶蹄類，有些不同，還是分別了好，不必『出到最後的一冊』的時候，偏來『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後，使我聯想起趙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來了。這很像是直譯

或『硬譯，』其實卻不然，也是無緣無故的『牛』了進去的。這故事無須查字典，在圖畫上也能看見。卻說希臘神話裏與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歡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間去，和某女士生了一個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卻偏又是一個很有些嫉妬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後，便將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機會將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滿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頭，便一吸，太太大吃一驚，將他一推，跌落到人間，不但沒有被害，後來還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卻因此一吸，噴了出來，飛散天空，成爲銀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實是『神奶路。』但白種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們看慣了罐頭牛奶上的文字，有時就不免于誤譯，是的，這也是無足怪的事。

但以對於翻譯大有主張的名人，而遇馬發昏，愛牛成性，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卻也可當作一點談助。——不過當作別人的一點談助，並且藉此知道一點希臘神話而已，于趙先生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格言，卻還是毫無損害的。這叫作『亂譯萬歲！』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這『順』的翻譯出現的時候，是很久遠了；而且是大文學家和大翻譯理論家，誰都不屑注意的。但因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順譯模範文大成』稿本裏，翻到了這一條，所以就再來一下子。

卻說這一條，是出在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時報裏的，在頭號字的『針穿兩手……』這一個題目之下，做着這樣的文章：

『被共黨捉去以錢贖出由長沙逃出之中國商人，與從者二名，於昨日避難到漢，彼等主僕，均鮮血淋漓，語其友人曰，長沙有為共黨作偵探者，故多數之資產階級，於廿九日晨被捕，予等係於廿八日夜捕去者，即以針穿手，以秤秤之，言

時出其兩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尙鮮血淋漓。……（漢口二日電通電）

這自然是『順』的，雖然略一留心，即容或會有多少可疑之點。譬如罷，其一、主人是資產階級，當然要『鮮血淋漓』的了，二僕大概總是窮人，爲什麼也要一同『鮮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針穿手，以秤秤之』幹什麼，莫非照斤兩來定罪名麼？但是，雖然如此，文章也還是『順』的，因爲在社會上，本來說得共黨的行爲是古裏古怪；況且只要看過玉歷鈔傳，就都知道十殿閻王的某一殿裏，有用天秤來秤犯人的辦法，所以『以秤秤之』也還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時候，不用稱鈎而用『針』，卻似乎有些特別罷了。

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種日本文報紙上海日報上，也偶然見到了電通社的同一的電報，這才明白時報是因爲譯者不拘拘于『硬譯』而又要『順』，所以有些不『信』了。倘若譯得『信而不順』一點，大略是應該這樣的：

『……彼等主僕，將爲恐怖和鮮血所渲染之經驗談，語該地之中國人曰，共產軍中，有熟悉長沙之情形者……予等係於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時，則在腕上刺孔，穿以鐵絲，數人或數十人爲一串。言時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

示之……』

這才分明知道，『鮮血淋漓』的並非『彼等主僕』乃是他們的『經驗談』兩位僕人，手上實在並沒有一個洞。穿手的東西，日本文雖然寫作『針金』但譯起來須是『鐵絲』不是『針』針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卻連影子也沒有。

我們的『友邦』好友，頂喜歡宣傳中國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黨』的；四年以前，將『裸體遊行』說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國人也跟着叫了好幾個月。其實是，警察用鐵絲穿了殖民地的革命黨的手，一串一串的牽去，是所謂『文明』國民的行爲，中國人還沒有知道這方法，鐵絲也不是農業社會的產品。從唐到宋，因為迷信，對於『妖人』雖然曾有用鐵索穿了鎖骨，以防變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幾乎沒有了。文明國人將自己們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國來，不料中國人卻還沒有這文明，連上海的翻譯家也不懂，偏不用鐵絲來穿，就只照閻羅殿上的辦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謠的和幫助造謠的，一下子都顯出本相來了。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十六世紀末尾的時候，西班牙的文人西萬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說叫作堂·吉訶德，說這位吉先生看武俠小說看厭了，硬要去學古代的遊俠，穿一身破甲，騎一匹瘦馬，帶一個跟丁，游來游去，想斬妖服怪，除暴安良。誰知道時已不是那麼古氣盎然的時分了，因此只落得鬧了許多笑話，吃了許多苦頭，終於上個大當，受了重傷，狼狽回來，死在家裏，臨死才知道自己不過一個平常人，並不是什麼大俠客。

這一個古典，去年在中國曾經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這個諛法的名人，似乎還有點很高興的樣子。其實是，這種書獃子，乃是西班牙書獃子，向來愛講『中庸』的中國，是不會有的。西班牙人講戀愛，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舊教，就燒殺異端，一革命，就搗

爛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子，不是總說女人先來引誘他，諸教同源，保存廟產，宣統在革命之後，還許他許多年在宮裏做皇帝嗎？

記得先前的報章上，發表過幾個店家的小伙計，看劍俠小說入了迷，忽然要到武當山去學道的事，這倒很和『堂·吉訶德』相像的。但此後便看不見一點後文，不知道是否也做出了許多奇迹，還是不久就又回到家裏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測起來，大約以回了家爲合式。

這以後的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准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着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茹鎮；他在磨坊裏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

有如此者，嗚呼！

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裏面有『輿襯』有『戳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擡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在行爲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講二十世紀戰事的小說，舊一點的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稜的戰爭，新一點的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裏面都沒有這樣的『青年團』，所以他們都實在打了仗。

「野草」英文譯本序

馮 Y·S·先生由他的友人給我看野草的英文譯本，並且要我說幾句話。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但我希望，譯者將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陸續發表于期刊語絲上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為那時難于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

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讎第一篇，又因為驚異于青年之消沈，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于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臘葉，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鎗擊徒手民衆

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獄。

後來，我不得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于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爲譯本而作的序言，也應該在這裡結束了。

(十一月五日。)

『智識勞動者』萬歲

『勞動者』這句話成了『罪人』的代名詞，已經足足四年了。壓迫罷，誰也不響；殺戮罷，誰也不響；文學上一提起這句話，就有許多『文人學士』和『正人君子』來笑罵，接着又有許多他們的徒子徒孫來笑罵。勞動者呀勞動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竟又有人記得你起來。

不料帝國主義老爺們還嫌黨國屠殺得不趕快，竟來親自動手了，炸的炸，轟的轟。稱『人民』爲『反動分子』，是黨國的拿手戲，而不料帝國主義老爺也有這妙法，竟稱不抵抗的順從的黨國官軍爲『賊匪』，大加以『膺懲』！冤乎枉哉，這真有些『順』『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于是又記得了勞動者。

于是久不聽到了的『親愛的勞動者呀！』的親熱喊聲，也在文章上看見了；久不見了的『智識勞動者』的奇妙官銜，也在報章上發見了；還因為『感於有聯絡的必要，』組織了『協會，』舉了幹事樊仲雲，汪馥泉呀這許多新任『智識勞動者』先生們。

有什麼『智識？』有什麼『勞動？』『聯絡』了幹什麼『必要』在那里？這些這些，暫且不談罷，沒有『智識』的體力勞動者，也管不着的。

『親愛的勞動者』呀！你們再替這些高貴的『智識勞動者』起來幹一回罷！給他們仍舊可以坐在房裏『勞動』他們那高貴的『智識』即使失敗，失敗的也不過是『體力』『智識』還在着的！

『智識』勞動者萬歲。

「友邦驚詫」論

只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佔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伙。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于葬送土地，這才能够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鎗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佔了遼吉，破壞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

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衆，祕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

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面具。擺什麼『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

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卽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藉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

因爲『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勸阻，』學生們怎會『無法勸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麼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剛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云：

『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爲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爲羣衆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祕書被拉到中大，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消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南京請願學生死傷的確數，則云：『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復旦傷二人，復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係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可見學生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够鎮壓，而且依然能够誣陷，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只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

編輯先生：

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答北斗雜誌社問

——創作要怎樣纔會好？——

編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卻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卻，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面——

-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決不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復，即請

編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

來信

L·S·先生：

要這樣冒昧地麻煩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了，但像我們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會淡漠一個熱忱青年的請教的吧。這樣幾度地思量之後，終於唐突地向你表示我們在文藝上——尤其是短篇小說上的遲疑和猶豫了。

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採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現在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

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慾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裏面，——不知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說得上有貢獻的意義？我們初則遲疑，繼則提起筆又猶豫起來了。這須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指示，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文藝上的努力，對於目前的時代，成爲白費氣力，毫無意義的。

我們決定在這一個時代裏，把我們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藉此表示我們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並不是先生所說的那一輩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便會影響到我們終身的。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普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卻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劃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確又沒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維，只有冒昧地來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Ts.-C. Y. 及 Y.-E. T 上 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先生：

接到來信後，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頭重眼腫，連一個字也不能寫，近幾天總算好起來了，這才來寫回信。同在上海，而竟拖延到一個月，這是非常抱歉的。

兩位所問的，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取來應用的材料的問題。而作者所站的立場，如信上所寫，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如果是戰鬪的無產者，只要所寫的是可以成爲藝術品的東西，那就無論他所描寫的是什麼事情，所使用的是什麼材料，對於現代以及將來一定是有貢獻的意義的。爲什麼呢？因爲作者本身便是一個戰鬪者。

但兩位都並非那一階級，所以當動筆之先，就發生了來信所說似的疑問。我想，這對於目前的時代，還是有意義的，然而假使永是這樣的脾氣，卻是不妥當的。

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鬪的無產者不相干。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裏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裏面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例如法國的戈兼，痛恨資產階級，而他本身還是一個道道地地資產階級的作家。倘寫下層人物（我以

爲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不過空虛的布施，于無產並無補助。而且後來也很難言。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贊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于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但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爲所舉的兩種題材，卻還有存在的意義。如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面具，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則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作這一時代的記錄。所以對於現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不過即使『熟悉』，卻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

因此我想，兩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的。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這樣寫去，到一個時候，我料想必將覺得寫完，——雖然這樣的題材的人物，即使幾十年後，還有作爲殘滓而存留，但那時來加以描寫刻劃的，將是別一種作者，別一樣看法了。然而兩位都是向

着前進的青年，又抱着對於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的意志，那時也一定能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看見新路的。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于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沈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此復，即頌
近佳。

L, S. 啓。

十二月二十五日。

關於翻譯的通信

來信

敬愛的同志：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裏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蹟。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牠們能够於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個人和N同志的努力；可是，誰能够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

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爲着光明而鬪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只是『紗籠』(Salon)裏的哈叭狗，現在粗製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着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牠，像愛自己的女兒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麽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

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着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羣衆！）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歷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啓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適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於牠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现。因此，我們既然進行着創造中國現代的新言語的鬭爭，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衆。

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衆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麼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衆讀者，怎麼能夠『達』！

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寧錯而務順，

毋拗而僅信！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裏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寧可『錯』一點兒的『順』，那麼，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牠的發展。第二、既然要寧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

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着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確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志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

「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爲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這是只是個『防禦的戰術。』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防守爲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

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爲是『順』的翻譯，其實只是梁啟超和胡適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於大眾仍舊是不『順』的。

這裡，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並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係、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羣衆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游擊隊』、『游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于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

羣衆的口頭上的言語裏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的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裏面，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只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裏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裏面，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麼是『順』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里所說的白話，當然又限于『家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麼，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種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種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於一般識字很少的羣衆，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為這種言語，對於一般不識字的羣衆，也還是聽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種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這

種文字已經有了生命，牠已經有了可以被羣衆容納可能性。牠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面上的白話文，如果不注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順』的方面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時候，完全不顧普通羣衆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

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鬭爭。你以爲怎麼樣？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於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爲着保存原作的精神，並不用着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容忍着『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作的精神。

當然，在藝術的作品裏，言語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論文要更加來得精細。

這裡有各種人不同的口氣，不同的字眼，不同的聲調，不同的情緒……並且這並不限于對白。這裡，要用窮乏的中國口頭上的白話來應付，比翻譯哲學、科學……的理論著作，還要來得困難，但是，這些困難只不過愈加加重我們的任務，可並不會取消我們的這個任務的。

現在，請你允許我提出毀滅的譯文之中的幾個問題。我還沒有能夠讀完，對着原文讀的只有很少幾段。這裡，我只把菲理契序文裏引的原文來校對一下。（我順着序文裏的次序，編着號碼寫下去，不再引你的譯文，請你自己照着號碼到書上去找罷。序文的翻譯有些錯誤，這裡不談了。）

（一）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有一種——

『對於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這種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麼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確些：

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

『渴·望·着·一·種·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這個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麼

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這種時候，極大多數的幾萬萬人，還不得不過着這種原始的可憐的生活，過着這種無聊得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的生活，——怎麼能夠談得上什麼新的極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始終還是他自己，——他愛他自己的雪白的骯髒的沒有力量的手，他愛他自己的唉聲嘆氣的聲音，他愛他自己的苦痛，自己的行爲——甚至於那些最可厭惡的行爲。』

(四)『這算收場了，一切都回到老樣子，彷彿什麼也不會有過，——華理亞想着，——又是舊的道路，仍舊是那一些糾葛——一切都要到那一個地方……：可是，我的上帝，這是多麼沒有快樂呵！』

(五)『他自己都從沒有知道過這種苦惱，這是憂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惱，——他這樣苦惱着的想：他已經二十七歲了，過去的每一分鐘，都不能夠再回過來，重新換個樣子再過牠一過，而以後，看來也沒有什麼好的……（這一段，

你的譯文有錯誤，也就特別來得『不順。』現在木羅式加覺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樣的一條道路，他看起來是一直的明白的正當的道路，像萊奮生、巴克拉諾夫、圖潘夫那樣的人，他們所走的正是這樣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個什麼人在妨礙他走上這樣的道路呢。而因為他無論什麼時候也想不到這個仇敵就在他自己的心裏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覺得特別的痛快和傷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這樣正當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不服從他的。』

(七)『開始的時候，他對於他生活的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願意去思索，然而，漸漸的他起勁起來了，他竟寫了兩張紙……在這兩張紙上，居然有許多這樣的字眼——誰也想不到萊奮生會知道這些字眼的。』(這一段，你的譯文裏比俄文原文多了幾句副句，也許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罷？或者是你把菲理契空出的虛點填滿了？)

(八)『這些受盡磨難的忠實的人，對於他是親近的，比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更加親近，甚至於比他自己還要親近。』

(九)『……沈默的，還是潮溼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麥場上的疎遠的人——這些人，他應當很快就把他們變成功自己的親近的人，像那十八個人一樣，像那不做聲的，在他後面走着的人一樣。』(這裏，最後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

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確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複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裏舉一個例：第(八)條『……甚至於比自己還要親近。』這句話的每一個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氣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錯誤是在於(一)丟掉了『甚至於』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氣。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着，彷彿自稱自讚的。對於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於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於翻譯方法的。這就是第(一)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人的產生。』這裏，菲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不但不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複數。這意思是指着革命，國內戰爭……的過程之中產生着一種新式的人，一種新的『路數』(Type)——文雅的譯必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裏面看得出來的。現在，你的譯文，寫着『人類。』萊奮生渴望着一種新的……人類。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彷彿是一般的渴望着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鬥的迫切的任務。在競爭過程之中去創造，去鍛鍊，去改造成一種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美諦克……等等不同的人。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羣衆之中的骨幹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

過籠統的人類，正是羣衆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輩。

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提出來說的。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面前，你的後記也很正確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可是翻譯要精確，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我慶祝你。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於翻譯問題，對於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鬭爭。

J·K·
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愛的J·K·同志：

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氾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歎氣，甚而至于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雖然是勇壯的行爲，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這一句古老話。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衆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衆計劃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着工農還在怎樣喫苦，怎樣忍飢，說得滿紙淒淒慘慘。彷彿惟有他卻是極希望一個筋斗，工農就都住王宮，喫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對着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麼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只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並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裏也挨了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爲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爲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麼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

卻從中可以查考。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喫力的，是穆勒名學和權界論。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爲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幌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稱爲「翻譯」而寫作「侯官嚴復達信」，序例上發了一通「信达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爲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認託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麼，他爲什麼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麼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爲西洋人只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去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于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

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彙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衆，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啓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裡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够。至于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麼，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下』，『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喫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嚥完，卻必須費牙來嚼。

一囑。這里就來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爲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祕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倘若永遠用着糊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喫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爲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裏，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啓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羣衆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使爲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爲度。必須這樣，羣衆的言語纔

能够豐富起來。

什麼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唵』字，據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裏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爲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並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爲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爲原意以山爲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爲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爲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裏。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衆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爲民衆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份，將從『不順』而成爲『順』，有一部份，則因爲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

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並且更「信」，對於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只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于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爲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麼來。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只能成爲一種特別的白話，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話。後一種，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她分布較廣，勢必至于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爲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于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只在一處活着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迴避的。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儘是採用，例如「林冲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冲笑着說。」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於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

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沒有法子，現在只好採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閒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衆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爲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爲有些是從活的民衆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衆裏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我將『……甚至於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這恐怕因爲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於』這樣能够簡單而確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爲這麼拙笨了。二，將『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爲目前的戰鬪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卻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Mensch』，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

戰鬪，是爲了經過階級鬪爭之後的無階級社會，于是就將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將來，並且成爲『人們』——人類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爲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於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里的讀者們的面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製，卻並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鬪，實在够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這面前弄到毫無蹤影。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爲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於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爲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里，壞在那里，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麼，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

關于翻譯的信通

了正確的師範了。

魯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

日本岩崎·昶 作

一 電影與觀衆

電影的發明，是新的印刷術的起源。曾經藉着活字和紙張，而輸運開去，複製出來的思想，是有着使中世的封建底、舊教底社會意識，歸于壞滅的力量的。

有產者底社會的勃興，宗教改革，那些重大的歷史底契機，由此得了結果了。現在，在思想的輸運上，在觀念形態的決定上，電影所負的任務，就更加積極底，更加意識底了。牠是階級社會的擁護，也是新的『宗教改革。』

這新的印刷術，是由于將運動的照相的一系列，印在 Zelluloid 的薄膜上而成立的。那活字，並非將概念傳給讀者，卻給以動作和具像。這在直接地是視覺底的這一種意

義上，是無上的通俗底的而同時也是感銘底的活字，在原則底地沒有言語這一種意義上，則是國際底活字。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的效用，就在這一點。

當考察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之際，比什麼都重大的，是電影和在那影響之下的大眾的關聯。

我想用了具體底的數目字來描寫牠。

據英國的電影雜誌“*The Cinema*”所發表的統計，則一星期中的電影看客之數，其非常之多如下。

亞美利加

常設館數

一五、〇〇〇

人口

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

每星期的看客數

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對於人口的比率

四五%

英吉利

常設館數

三、八〇〇

人口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每星期的看客數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對於人口的比率

三三·三%

德意志

常設館數

三、六〇〇

人口

六三、〇〇〇、〇〇〇

每星期的看客數

六、〇〇〇、〇〇〇

對於人口的比率

一〇·五%

(Hans Buchner! Im Banne des Films S. 21.)

又，這些常設館的收容力的總計，是可以看作每日看客數目的平均底數字的，如下

表所示——

常設館與收容力

	常設館數	收容人員
亞美利加	一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德意志	三、六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英吉利	三、八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于這些數字，乘以三六五則得

八、〇〇〇、〇〇〇 × 三六五 = 二、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亞美利加）

一、五〇〇、〇〇〇 × 三六五 = 五四七、五〇〇、〇〇〇（德意志）

一、二五〇、〇〇〇 × 三六五 = 四五二、五〇〇、〇〇〇（英吉利）

就可以算作一年間的看客總額的大概。

但這些數字，還是一九二五年度的調查，若據較新的統計，則世界各國的常設館數，總計約在六萬五千以上。

內計——

亞美利加

二〇、〇〇〇

德意志	四、〇〇〇
法蘭西	三、〇〇〇
俄羅斯	一〇、〇〇〇
意大利	二、〇〇〇
西班牙	二、〇〇〇
英吉利	四、〇〇〇
日本	一、一〇〇

(Leon Moussinac—Panoramique du Cinéma p. 17) (註一)

(註一) Moussinac 所舉的數字，並未提出調查年度。推想起來，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統計罷。

據一九二八年度的“Film-Daily”及其他的調查，則亞美利加于這數字上，增加二·五%有二萬五百的常設館；日本增加一〇%成爲千二百；德國增加三〇%成爲五千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數一八七六六〇一）了。而這些，還是除掉了移動電影館，非商業底劇場的數字。

由此看來，則美、德、英三國，在常設館數上，顯示着約三成至一成的增加。于看客數，也可以想定為大約同率的增加；于這三國以外的諸國，也可以推為同樣的增加率。

就是，雖在一九二五年度的統計，一年間的電影看客的總額，就已經到了在亞美利加是約二十九億，在歐羅巴是二十億，在亞細亞、臘丁、亞美利加、加拿大、亞非利加等是十億，總計五十九億那樣的好像傳奇的空想底數字了。

電影所支配的這龐大的觀衆，以及電影形式的直接性，國際性，——就證明着電影在分量上，在實質上，都是用于大衆底宣傳，煽動的絕好的容器。

二 電影與宣傳

要正當地認識那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的價值，必須知道所謂「宣傳電影」這一句熟語，以及那概念之無意義。

爲了介紹日本的好風景于外國，以招致游客而作的電影富士山、藝妓、日光、溫泉等，我們常常稱之為宣傳電影。凡這些，有時是因了教導疾病的預防法，獎勵郵政儲金，勸

誘保險之類的目的而照的。那時候，我們便立刻感到裝在那些軟片之中的目的，領會了肺結核之可怕，開始貯金，加入生命保險去。然而利用了公會堂，小學校講堂之類來開演的宣傳電影，往往是不收費用的，既然白給人看，便會立刻發生疑惑，以為來演的那一面，一定有着白給人看的根由。這種宣傳電影，目的意識就馬上被看透。

有着衰老而盲目的母親的獨養子——太郎君，得了召集令，將母親放在她的一切衰老和盲目之中，『爲了君國，』出征去『膺懲可惡的仇敵』了。勇壯的日章旗，萬歲，一太郎呀！我們往往被給看這種軍國美談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乃是×××電影公司所製的商業電影，當開演時，也並不叨公會堂和小學校講堂的光，收取着有名譽的觀覽費，在普通的常設館裏堂皇地開映。一到這樣，善良而無疑的看客，便不覺得這是宣傳電影了。他們就將自己的付過正當的觀覽費這一個事實，做了那影片並非宣傳電影的證明。其實，單純的看客，是沒有覺到陷于被那巧妙地佈置了的宣傳所煽動，所欺騙，然而對於那欺騙，還要付錢的二重欺騙的。

在市民底的用語慣例上的『宣傳電影』的無意義，大略就如此。爲什麼呢，因爲沒

五十九億的看客一同，可以在這鬭爭的秤盤上，加上決定底的重量去的。

三 電影和戰爭

資本主義底宣傳電影之中，占着最重要的部門的，是戰爭影片。

將戰爭收入電影裏去，已經頗早了。當電影剛要脫離襁褓的時候，我們就看見了羅馬、巴比倫、埃及之類的兵卒的打仗。這是那時的電影對於舞臺的唯一的長處，爲了要使利用了自由的 Location（就地攝影）和巨大的 Set（場內陳設）和大衆攝影的光景的魅力，發現到最大限度，所以設法出來的。輝煌的古代的鎧甲、環以城垣的都市、神詞、奇怪的偶像、槍、盾、矛、火箭、石弩，這樣異域情調的，而在當時，又是壯麗的佈置，便忽然眩惑了對於電影還很幼稚的大衆的眼，正合了時尚了。

但在初期的這類的戰爭，歸根結蒂，和大排場的馬戲，比武之類的把戲，也並無區別。古代羅馬和凱爾達戈，都不是現代電影看客的祖國。戰爭也不過仗了那動底的煽情底的視覺，使他們興奮，有趣罷了。

引進近代的戰爭去，而在那裏面分明地裝入有意識的宣傳底要素的最初的電影製作者，我以為恐怕是葛蕾菲士(D. W. Griffith)罷。他在取材于南北戰爭的『一族之誕生』(Birth of A Nation)，『亞美利加』(America)這些影片上，讚美北軍的英雄主義，將所謂合衆國建國的精神，化爲正當，化爲美麗了。凡這些，雖不如後出的許多好戰底影片那樣，積極底地鼓吹了對外戰爭，但那目的，則仍在對於國民中有着駁雜分子的人種博物館一般的合衆國和其居民，涵養其確固的國家底概念，愛國心。『十足的亞美利加人』這一句口號，流行起來，成爲『亞美利加化』運動的有力的武器，對於從愛爾蘭來的巡警，從昔昔利來的菜商，于黑人，于美洲印第安，也都想印上這臉譜去了。

『亞美利加化』的歷程，以歐洲大戰的勃發，亞美利加的參戰，以及和這相伴的急速的帝國主義化爲契機，而告了完成。

亞美利加和對德宣戰同時，還必須送一百萬軍隊到法蘭西去，於是開始了速成的募兵，施行了速成的海軍擴張。奏着煽動底的進行曲的軍樂隊，在各處都市的大街上往

來，各十字路口貼着傳單，報紙獨于此時候說些『亞美利加市民』的義務。易受煽動的青年們，或者爲着不去應募，將被戀人所鄙棄，或者爲着對於生活，覺得厭倦，或者又爲着『進了海軍去看看世界，』就來當募兵了。當此之際，亞美利加政府之宣傳，也是有史以來的最大規模，而且最見效果的了。

在這宣傳之戰，充了最主要的角色的，是新聞和電影。當這時期，在本來的意義上的戰爭電影，這纔製作出來了。

在以根據西班牙的發狂底反對德國者伊本納支（Blasco Ibañez）的原作默示錄的四騎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我們的海（Mare Nostrum）爲代表作品的戰爭影片上，亞美利加的支配階級便描寫出德國軍隊的如何兇殘，德國潛艇的如何非人道，巧妙地煽動了單純的花旗人。

然而花旗帝國主義開始呈露牠本來的銳鋒，卻在歐戰收場之後，懂得了大衆的軍國化，是應該在平時不斷地安排的時候。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前半，切實地支配了全世界人類的腦子的，首先是活潑潑的戰

爭的記憶。於是發生一種慾望，要符世界大戰這一個重大的歷史底事件，在國民底敘事詩的形態上，藝術底地再現出來，正是自然的事。而所作的電影，就切實地傾向大衆的興味和感情上去，也正是自然的事。將這有利的情勢，忽然利用了的，是花旗帝國主義。戰爭的敘事法，便以最爲好戰底的煽動企圖，創作出來了。

戰爭影片的不絕的系列，產生了。『戰地之花』（Big Parade），『飛機大戰』（Wings）以下，許多反動底宣傳影片，列舉名目就不勝其煩。不消說，那些電影是沒有戰時的純粹的煽動影片一般地露骨的，製作之法，是添些樂劇式戀愛的適當的甘甜，以及掩飾些人道主義底的戰爭批評的藥料。弄得易于下咽，使能在較自然，較暗默之中，達到宣傳的目的。但雖然是十分小小的假面，而其究竟目的之所在，則同是將遮眼的東西給與大衆，使不明帝國主義底戰爭的本質，以及讚美亞美利加軍隊的英雄主義，有時還宣傳軍隊生活的放恣和有趣罷了。（我深惜在這里沒有揭出這種戰爭影片的完全的目錄，以那代表底的幾個例子，來使我的敘述更加具體起來的紙面和時間了。但我相信將來會有補正的機會的。）

就戰爭和電影所歷敘的這些事實，那自然，也決不是惟亞美利加所獨有的特別現象。倒是在別的一切帝國主義強國裏，都在爭先興辦的。德國將『大戰巡洋艦』(Emden)『世界大戰』(Weltkrieg)等呈在我們的眼前，法國是製作了『凡爾登——歷史的幻想』(Verdun-Vision d'histoire)『邁克巴什』(L'Equipage)等，英國則以『黎明』(Dawn)，日本則以『礮烟彈雨』、『地球在回旋』和『蔚山洋西的海戰』等，竭力用心于『軍事思想』的普及。

當敘述完戰爭電影之際，而沒有提及作為幾個例外底現象的反對戰爭的傾向，怕是不妥當的罷。

我們在『戰地之花』裏，在幾個段落裏，雖然是太感傷底的，然而總算也看見了描寫着詛咒戰爭的心情。那心理，在『戰地鵲聲』(What Price Glory)中，就更為積極底地表白着。但在這些影片上，對於戰爭的確然的批評和態度，並無一定。只有着和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曾在『從軍夢』(Shoulder Arms)裏，將戰爭化為諷畫了那樣的同一程度的認識。

和這比較起來，技術上非常卓拔的戰爭影片『帝國旅館』（Hotel Imperial）的導演者 Erich Pommer 所作的『鐵條網』（Barbed Wire），倘臨末沒有那高唱人類愛的可笑的誇張，則如猛烈地諷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名喜劇『陣後諸兵』（Behind the Front）一同，大概是可以屬於反戰爭電影的範疇的了。

四 電影與愛國主義

愛國底宣傳電影，也是世界大戰後的顯著的現象。爲什麼呢？因爲這種電影，雖有外形上的差違，但終極之點，是在向帝國主義戰爭的意識的準備，鼓舞，在那君權主義上，在那好戰性上，和戰爭影片是本質底地相關聯的。

那麼，那目的是在那里呢？

直接地，是宣傳團體觀念，國旗之尊嚴，間接地，是獎勵暴力，使民心傾向右翼政黨，當和外國爭奪資本市場之際，即刻有軍事行動的事，成爲妥當化。

這種影片的最活潑的影響，大抵見于選舉國會議員，選舉大總統的時期，如德國的

國權黨，尤其是能够仗了愛國主義的電影，博得許多的投票。

例如叫作『腓立大王』(Fridericus Rex，這在日本，是大加短縮，改題爲『萊因悲愴曲』了)的普魯士勃興的歷史影片，是其中的最獲成功的。那正是大戰後的張皇的時代，且正值跟着德國革命的失敗而來的反動的火頭上，這是有產階級的巧妙的宣傳。窮極，餓透了的小市民們，在這影片中，看見精銳的腓立大王的禁軍的行進，看見七年戰爭的冠冕堂皇的勝利，于是想起了往日的皇帝的治世，便在無智的廉價的感激中，鼓掌蹈足，吹起口笛來了。

接着這個，而國民底英雄俾士麥的傳記，化成電影了，興登堡的傳記，化成電影了。

『俾士麥』(Bismarck)者，單爲了那製作，就設起俾士麥電影公司來，照成了兩部二十餘卷的鉅製，凡在這帝國主義底政治家一生中的一切愛國底、煽情底的要素，都一無遺漏地填進在那裏面。

『興登堡』(Hindenburg)者，是乘這老將軍當選爲大統領——這叨光于影片『腓立大王』和『俾士麥』(註二)之處，是多麼的大呵。——之機，爲了他的收羅人心

而作的。

一九一七年春，德意志國權黨領袖之一，奧古斯德·霞爾書店的事實上的所有者福干培克，乘德國大公司之一烏發公司的財政危機，買進了那股票的過半，坐了烏發公司總經理的交椅了。於是德國的電影事業和那影響力，便全捏在國權黨的手裏。福干培克立刻在烏發公司的出品計劃上，露骨地顯示了他的政治底主張。那最是世界底的例子，是『世界大戰』(Weltkrieg)的二部作。

(註二)『俾士麥』影片公演時所散佈的綱要書上，載着這樣的說明——

『我們的影片的祖國底的目的(der vaterländische Zweck)，也規定了那內面的結構和事件的時間底限制。所以俾士麥的少年時代，僅占了極簡略的開端。(中略)而且這故事，是應該以一八七一年的德意志建國收場的。爲什麼呢？就因爲跟着發生的國內的紛爭，以及他的退隱，是惹起陰沈的回憶，不使觀者結合，卻使之乖離，有違于這電影全體的目的。祖國底的目的緣故。這影片的主要部分，是將從一八七四年，俾士麥入了政治底生活的時候起，至一八七一年止，作爲一個完成了的戲曲的。

(下略)』

對於這，社會民主黨的內閣便即刻取了牽制底手段。就是，使德意志銀行來對抗福干培克，投資于烏發公司。爲了使德國的獨占底大電影公司不成爲國權黨宣傳機關，這是不得已的方法。

『世界大戰』（註三）已有刪節的片子，紹介于日本（譯者按：在上海，去年也大演了一通，）那是有着怎樣的傾向和主張的事，大約現在早可以無須詳說了罷。

在表面上所標榜的，『世界大戰』是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戰爭中所攝的各國（大抵是德法）的照片，憑了純粹的歷史底客觀而編輯的留在軟片上的記錄。

（註三）當『世界大戰』開演之際，關於這影片，有一個將軍述其所感，登在報上

道——

『戰爭是完全可怖的，但我們是認戰爭，因爲在戰爭中，更沒有較之辱沒自己的職務，尤爲可怖的運命了。我們的青年們，對於戰爭的恐怖，應該以平靜的鎮定和確固的意志而進行。所以這影片的悽慘的場面，決不是可以厭惡的東西，卻對於這影片給了意義，增了價值。』

而且這比起專一描寫本國軍隊的勝利的，勇敢的，愛國的亞美利加式電影來，也真好像近于寫實。然而注意較深的觀察者，卻即刻可以看見。從丹南培克之戰起，常只將與登堡將軍的勝利，重複地映出了好幾回。而且和寫着『在戰時屢救祖國的將軍，當平時，也作為大統領而盡力于祖國』等語的字幕一同，這電影也就完結了。（註四）

（註四）作為屬於這範疇的影片，可以列舉出『路易飛送南公子』（Prinz Lennis Ferdinand）『烏第九號』（U. 9.）『貓橋』（Katzensteg）『律查的猛襲』（Luelzows Wilde Verwegene Jagd）『希勒的軍官們』（Schillsehe Offiziere）『大戰巡洋艦』（Emden）『我們的安寧』（Unser Emden 及其他的德國影片；『拿破崙』（Napoleon）『貞德』（Jeanne d'Arc）——但並非輸入日本的 Karl Dreier 的作品——等法國影片；『珂羅內勒和孚克蘭島的海戰』（The Battles of Coronel and Falkland Islands）等英國影片來。

至于亞美利加，則連在『彼得班』（Peter Pan）『紅皮』（Red Skin）之類的童話和樂劇中，也發見了引導 Stars and Stripes（譯者按：星星和條紋，花旗）之尊嚴的機會了。

五 電影和宗教

通一切時代，宗教一向在供支配階級的御用，是已經證明了許多次數的。

這在東洋，則教人以佛教底的忍從和蔑視現世，在西方，則成爲基督教底平和主義，想阻止現存的階級社會的積極底改革。

到二十世紀，宗教雖然已經失卻了昔日的權威、信仰，但倒是因爲失卻，所以對於那支配階級的奴僕狀態，也就愈加露骨、故意起來了。

在物質文明發達較遲的國度中，宗教還有着大大的宣傳煽動力。資本主義于是將宗教和電影相結合，能夠同時利用了。

二
心
集

例如『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基督教徒』(Christian)『賓漢』(Ben Hur)『萬王之王』(King of Kings)『猶太之王，拿撒勒的耶穌』(I. N. R. I.)之類的基督教宣傳電影，『亞細亞之光』(Die Leuchte Asiens)『大聖日蓮』之類的佛教電影，是和感激之淚一同，從全世界的愚夫愚婦，善男信女的衣袋

裏，賺得確實的布施，從商業底方面看起來，也是利益最多的影片。一切宗派中，羅馬加特力教會是最留意于電影的利用的，每年開一回電影會議，議定着那一年中全世界底宣傳的計劃。

在我們的周圍，宗教之力早已幾乎視若無物了。至多，也不過本願寺，日蓮宗之流，組織了巡行電影團，竭力想維繫些鄉下農民的信仰。然而因此便推定宗教的世界底無力，是不可以的。只要看在蘇維埃的文化革命的歷程中，還不能放掉對於宗教的鬭爭，而在實行的事實，大概就可以明白其間情勢了。（註五）

六 電影和有產階級

爲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和有產者政府的監視所拘束的現今電影的一切，幾乎都被用于擁護有產階級的事，我相信是已經很明顯了的。

（註五）在最近的蘇維埃影片『活屍』（Der Lebende Leichnam）中，我們

也能够看見將對於宗教的鬭爭，採爲分明的綱要。

但在這里，卻將電影和有產階級的關係，限于較狹的意義，只來論及直接服役于市民有產階級的光榮和支配的電影這一種。

這種電影，可以分成三樣概括底區別。

那第一種，是和封建底，乃至貴族底社會相對抗，而盡謳歌有產階級之勝利的任務的。因此那全部，幾乎都是取材于市民底社會的勃興的歷史影片。××，或者××的野獸底橫暴，在其下嘗着塗炭之苦的農民，工商階級。到影片的第七卷，而有產階級終于蜂起，將電影底的極頂 (Climax) 和壯大的羣集 (mob scene)，在這里大行展開，這是那典型底的結構。但在大多數的影片上，有產階級是決不作爲一個階級底總體而蹶起的大抵由一個（往往是貴族出身，年青，而又眉目秀麗的）英雄所指導，力點就放在那個人底的英雄主義上。作爲那最是性格底的作品，讀者只要記起『羅賓漢』 (Robin Hood)，『斯凱拉謨修』 (Scaramouche)，『定情之夕』 (A Night of Love) 來，大約就足够了。在日本的時代劇，尤其是劍劇影片之中，我們也有那不少的例子。

但是，我們又能夠在那歷史底時代，發見新興有產階級所演的革命的角色，和現在

的無產階級的鬭爭，其間有很大的類似(Analgie)。倘作者將意識底的強音(Akzent)集中于此的時候，是可以產生優秀的作品的。如『熊的結婚』、『農奴之翼』、『斯各丁城』、『忠次旅行日記』等，便是那僅少的代表。

第二種，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電影。

『黨人魂』(Volga Boatman)是當內務省檢閱之際，惹起了大問題，終于遭了警視廳來制限其開映憂患的影片，但那內容是什麼呢？

『大暴動』(Tempest；譯者按：在上海映演時，名『狂風暴雨』)也靠了長有數卷的小插畫，這纔好容易得以許可開演的影片，然而那所選的是怎樣的主題呢？

這些影片，是只在用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為背景這一點上，因而遭了禁止，或重大的刪剪的。但要之，那所描寫，是將無產階級革命當作了無統制的暴民的一揆。無教育而不道德的農民和勞動者，倚恃着多數，攻入貴族的城堡去，破壞家具，××美麗的少女，酗酒，單喜歡流血。那是在無產階級的勝利上，特地蒙上暴虐的假面，塗些汗泥，使小市民變

成反革命起見而作的有產階級的××。我們于此，看見了如擁護有產者社會而設的宣傳電影，卻被××××××××的××所禁止的那種奇怪而且愉快的現象了。

固然，在『約翰南伊之愛』(Liebe doi Jeanne Ney)和『最後的命令』(The Last Command)上，剪去了十月革命，那卻是檢閱者十分做了他所該做的事的。

最後，就來了以『大都會』(Metropolis)譯者按：在上海映演時，名『科學世界』)爲典型的勞資調和電影的一連串。

關於『大都會』現在已經無須在這裏縷述了。那是揭着『頭和手之間，非有心臟不可』這標語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宣講着資本家和勞動者可以不由戰爭，但靠相互底的協力與愛，即能建設新社會云云的巴培爾塔以前的童話。(註六)

(註六)論難攻擊了“Metropolis”而顯了英雄的英國的改良主義底時行作

家威爾士(H. G. Wells)在那近著“The King Who Was a King”

The Book of a Film”上關於戰爭的絕滅，大要着使日內瓦的政治家們

也要臉紅那樣反動底 Demagogie (籠絡羣衆手段)那是滑稽之至的。

七 電影與小市民

有產階級的電影底宣傳，一到階級間的對立逐漸鮮明地，決定底地尖銳起來，也就陷在無可避免的絕地裏了。

在實際上，電影是以大多數的小市民和無產階級爲看客的。而他們，小市民和無產階級，早已漸漸地覺察出有產階級的詭計來了。就是，已經注意于『支配階級製作了宣布那服從于己的觀念形態的影片，而以此來做掠取無產者的衣袋的手段』這是事實的真相了。

盧那卡爾斯基關於蘇維埃電影，曾經說明過『拙劣的煽動，卻招致反對的結果』這原則，在這里，卻被有產者底地應用了。

露骨的宣傳是停止了。最所希望的，是使電影的看客看不見『階級』這觀念。至少，是坐在銀幕之前的數小時中，使他們忘卻了一切社會底對立。

這樣子，就產生了小市民的影片。（註七）

(註七)關於小市民影片的發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所作的拙稿電影美學以前裏，雖然很簡約，卻已曾略述過了。以下數行，請許其拔萃，以便讀者的理解。(前略)

「登場人物，是在高大的宮殿裏占着王座的富豪。富豪，良善的。富豪的女兒，是美的。小市民出身的年青的男子，溜出階級鬭爭的背後，要高陞到富豪的家族裏面去。他就簡單地只靠了戀愛，走上了一段階級的梯子。爲了他和富豪的女兒，常設館的可憐的樂隊，就奏起結婚進行曲來。」

「富豪由此得到恭維。小市民爲這飛騰故事所激勵，覺得要誓必盡忠于有產階級。」

「但人們，大部分是無產者的人們，這樣卻還不滿足。」

「沒有破綻的商人，於是來設法。他們便想一切都避開『階級』這一個觀念。」

「于是家庭劇發生了。那對於階級的對立，是徹頭徹尾，要掩住看客的眼睛，連兩個不同的階級的存在，也避開不寫。將一切問題和傾向，都置之不顧，但竭力將「謹慎的」小市民的生活，僅在他們的生活圈內，描寫出來。那「大抵是關於戀愛的柔滑的故事」，或則以母性愛爲主題，其中雖一個無產者，一個資本家，也不准登場。只有小市民階級作爲惟一的階級，在獨裁着。(後略)」

在小市民家庭劇中，有兩種特徵底的傾向——

一、是那羅曼主義。

二、是那弄玄妙 (Sophistication)。

粗粗一看，則現在的電影，尤其是電影劇，乃是寫實主義底的。而且許多人，都抱着這樣的幻想。但其實，除了極少數的第一流作品以外，一切全沒有什麼現實底的申訴的。

自然，雖說是羅曼主義，但和給十九世紀時有產階級革命的藝術以特徵的那生着火燄之翼的羅曼主義，是不一樣的。這是爲了平庸、近視、樂天底的小市民們而設的，也是平庸、近視、樂天底的羅曼主義。這于迭克薩的農民，芝加各的公司人員，亞理梭那的牧童，紐藉那的送牛奶人，紐約的速記生，畢茲巴格的野球選手，東京的中學生，橫濱的水手，無不相宜。說起來，就是 Ready-made (現成) 的羅曼主義。作爲那象徵底的形相，則有珂林·謨亞 (Collin Moor)，瑙瑪·希拉 (Norma Shearer)，克萊拉·寶 (Clara Bow)，

從一九二六年起，順次登場來了。就是那樣程度的羅曼主義。

每星期薪水 (美金) 二十五元的大學生出身的公司職員和美爾頓百貨公司的

嬌娃的戀愛故事。珂尼·愛蘭特。新福特式的跑車。爵茲樂舞。打獵。

至于這花旗羅曼主義上所必要的此外的佈置和氛圍氣，則讀者倘一看“Vanity Fair”的廣告欄，更所希望的，是往就近的電影館，一賞鑑任何的亞美利加影片，大約便能自己領悟的罷。

讀者必須明白，這小市民底的羅曼主義，是和亞美利加資本主義還在走着上行線的這一個公式底認識，有不可分的關聯的。這事實，在一方面，是每年將九十億元的國幣，撒在有產階級的懷中，而使發生了叫作所謂（Four Hundreds）的有閑階級，利子生活者的大羣。（註八）

而且有閑階級，利子生活者的大羣，則使他本身的消費底文化，娛樂機關，極端地發達起來了。而從那消費底文化的母胎中，就醱酵了爲一切文化爛熟期之特色的一種像

（註八）據一九二四年的調查，則在亞美利加，每年收入在一萬元以上的人，總數

達二十六萬。但這還是除掉了利息，花紅之類的企業利得，只是直接個人

底收入的計算，所以事實上的數字，大約還要見得若干成的增加的罷。

煞有介事，通人趣味，低徊趣味，諷刺，冷嘲等。這過度地洗鍊了的生活感情，他們稱之爲 Sophistication。賣弄巴黎式的 Chic，以及花旗式地解釋了的 hardboiled 之類的话，都和這相關聯，而爲人們所歡喜。

卓別林在『巴黎一婦人』(A Woman of Paris)裏，居然表現了那 Sophistication 的模範 (Prototype)。劉別謙 (Ernst Lubitsch) 在『婚姻範圍』(Marriage Circle) 裏，表現于一套片子上面了。蒙太·培爾，瑪爾·辛克萊兒，泰巴第·達賴爾等許多後繼者們，都發揮了電影界的玄妙家腔調。

但是，亞美利加雖在那一切的資本主義底興隆，但本身之中，卻已經包藏着到底消除不盡的內底矛盾，而在苦悶。消費不能相副的一面底生產，失了投資市場的大金融資本，荷佛政府的積極底外交，擁抱着五百萬失業者的天國亞美利加，現在是正踏在不可掩飾的階級底對立的頂上了。

這社會情勢，將怎樣地反映在亞美利加影片之中呢！那是很有興味的將來的問題。

譯者附記

這一篇文章的題目，原是『作爲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所謂『宣傳、煽動』者，本是指支配階級那一面而言，和『造反』並無關係。但這些字面，現在有許多人都大喜歡，尤其是在支配階級那方面。那原因，只要看本文第七章『電影與小市民』的前幾段，就明白了。

本文又原是『電影和資本主義』中的一部份，但全書尙未完成，這是據發表在新藝術第一、第二號上的初稿譯出來的。作者在篇末有幾句聲明，現在也譯在下面：

『我的，「電影和資本主義」原要接着本稿，更以社會底逃避的電影，無產階級方面所作的宣傳電影等，作爲順次的問題，臻于完成的。但現在，則僅以對於有產階級電影的如上的研究，暫且擱筆。』

『又，本稿不過是對於每一項目，各能寫出獨立的研究那樣的浩瀚的材料，給了極

概括底的一瞥，在這一端，是全篇過于常識底了。請許我聲明我自己頗以為憾的事。」

但我偶然讀到了這一篇，卻覺得于自己很有裨益。上海的日報上，電影的廣告每天大概總有兩大張，紛紛然競誇其演員幾萬人，費用幾百萬，『非常的風情浪漫、香豔（或哀豔）肉感、滑稽、戀愛、熱情、冒險、勇壯、武俠、神怪……空前鉅片，』真令人覺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現在用這小鏡子一照，就知道這些寶貝，十之九都可以歸納在文中所舉的某一類，用意如何，目的何在，都明明白白了。但那些影片，本非以中國人為對象而作，所以運入中國的目的，也就和製作時候的用意不同，只如將陳舊槍礮，賣給武人一樣，多吸收一些金錢而已。而中國人對於這些的見解，當然也和他們的本國人兩樣，只看廣告中藉以吸引看客的句子，便分明可知，于各類影片，大抵都只見其『非常風情浪漫香豔（或哀豔）肉感……』了。然而，冥冥中也還有功效在，看見他們『勇壯武俠』的戰事鉅片，不意中也會覺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見他們『非常風情浪漫』的愛情鉅片，便覺得太太如此『肉感，』真沒有法子辦——自慚形穢，雖然嫖白俄妓女以自慰，現在是還可以做到的。非洲土人頂喜歡白人的洋鎗，美洲黑人常要強姦白

人的婦女，雖遭火刑，也不能嚇絕，就因看了他們的實際上的『鉅片』的緣故。然而文野不同，中國人是古文明國人，大約只是心折而不至于實做的了。

因爲自己看過之後，大略發生了如上的感想，因此也想介紹給一部份的讀者，費去許多工夫，譯出來了。原文本是很簡短的，只因爲我于電影一道是門外漢，雖是平常的術語，也須查考，這就比別人煩難得多，卽如有幾個題目，便是從去年的舊報上翻出來的，查不到的，則只好『硬譯』，而且誤譯之處，也恐怕決不能免。但就大體而言，我相信于讀者總可以有一些貢獻。

去年，美國的『武俠明星』范朋克 (Douglas Fairbanks) 因爲美金積得太多，到東洋來游歷了。上海有幾個團體使豫備歡迎。中國本來有『捧戲子』的脾氣，加以唐宋以來，偷生的小市民就已崇拜替自己打不平的『劍俠』，于是『七俠五義』、『七劍十八俠』、『荒山怪俠』、『荒林女俠』……層出不窮；看了電影，就佩服洋『七俠五義』卽『三劍客』之類。古洋俠客往矣，只好佩服扮洋俠客的洋戲子，算是『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正如捧梅蘭芳者，和牠所扮的天女，黛玉等輩，決不能說無關一樣，

原是不足怪的。但有些人們反對了，說他在演『月宮寶盒』(The Thief of Bagdad)時摔死蒙古太子，辱沒了中國。其實呢，『月宮寶盒』中的英雄，以一儉兒連爬了兩段階級的梯子，終於做了駙馬，正是譯文第七章細注裏所說，要使小市民或無產者『爲這飛騰故事所激勵，覺得要誓必盡忠于有產階級』的玩藝，決不是意在辱沒中國的東西。況且故事出于一千一夜，范朋克並非作家，也不是導演，我們又不是蒙古太子的子孫或奴才。正不必對於他，爲美金而演劇的個人，如此之忿忿。但既然無端忿忿了，這也是中國常有的慣例，不足怪的，——在見慣者。後來范朋克到了，終於有團體要歡迎，然而大碰釘子，『范氏代表謂范氏絕對不允赴公共宴會，』竟不能得到瞻仰洋俠客的光榮。待到范朋克『到日本後，一切游程，均由日人代爲規定，且到東京後，將赴影戲院，與日本民衆相見，』(見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申報)我們這裏的蒙古王孫乃更不勝其沒落之感，上海電影公會有一封宛轉抑揚的信，寄給這『大藝術家。』全文是極有可供研究的處所的，但這裏限于紙面，只好摘錄了一點——

「會憶『月宮寶盒』劇中，有一蒙古太子，其表演狀態，至爲惡劣，足使觀者

之未知東方歷史，未悉東方民族性質者，發生不良之印象，而能成爲人類相愛進程上絕大之阻礙。因東方中華民國人民之狀態，並不如其所表演之惡劣也。敝會同人深知電影藝術之能力，轉輾爲全世界一切民情風俗知識學問之介紹，換言之，亦能引導全世界人彼此之相愛，及世界人類彼此之相憎。敝會同人以愛先生故，以先生爲大藝術家故，願先生爲向善之努力，不願先生如他人之對世界爲不真實之介紹，而爲盛譽之累也。」

文中說電影對於看客的力量的偉大，是很不錯的，但以爲蒙古太子就是『中華民國人民』卻與反對歡迎者流，同一錯誤。尤其錯誤的是要勸范朋克去引『全世界人彼此之相愛』，忘卻了他是花旗國裏發了財的電影員。因此一念之差，所以竟弄到祇聲下氣，託他去介紹真實的『四千餘年歷史文化所訓練的精神』于世界了——

『敝會同人更敢以經過四千餘年歷史文化訓練之精神，大聲以告先生。我中華人民之尊重美德，深用禮儀，初不異於貴國之人民。更以貴國政府常能於世界國際間主持公道，故爲我中華人民所敬愛。先生於此次東游小住中，想已

見到真實之證據。今日我中華政治之狀態，方在革命完成應經歷之過程中，有國內之戰爭，有不安靜之紛擾，然中華人民對於外來賓客如先生者，仍能不忘應有之禮節，表示愛人之風度。此種情形，先生當能於耳目交接之間，為真實之明瞭。雖間有表示不同之言論者，然此種言論，皆為先生代表以及代表引為己助參加發言者不合禮節隔離人情之宣言及表示所造成……

『希望先生於東游之後，以所得真實之情狀，介紹於貴國之同業，進而介紹於世界，使世界之人類與中華所有四萬萬餘之人民為相愛之親近，勿為相憎之背馳，以形成世界不良之情狀。使我中華人民之敬愛先生，一如敬愛美國之政府。』

但所說明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咱們蒙古王孫即使國內如何戰爭紛擾，而對於洋大人是極其有禮的。就是這一點。

這正是被壓服的古國人民的精神，尤其是在租界上。因為被壓服了，所以自視無力，只好託人向世界去宣傳，而不免有些諂；但又因為自以為是『經過四千餘年歷史文化

訓練』的，還可以託人向世界去宣傳，所也仍然有些驕。驕和諂相糾結的，是沒落的古國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歐美帝國主義者既然用了廢鎗，使中國戰爭紛擾，又用了舊影片使中國人驚異，胡塗。更舊之後，便又連入內地，以擴大其令人胡塗的教化。我想，如『電影和資本主義』那樣的書，現在是萬不可少了！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L。)

偽自由書

前記

這一本小書裏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爲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裏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纔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

很迴避創造社裏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爲隱士，有的化爲富翁，有的化爲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爲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爲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裏，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裏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會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爲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爲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

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爲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爲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裏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爲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幹，有時也用干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爲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于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爲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

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後，都是做着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學者。此外爲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麼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爲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爲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爲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廬，魯迅記。

觀 鬪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鬪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鬪爭，也愛看自己們鬪爭。

最普通的是鬪雞，鬪蟋蟀，南方有鬪黃頭鳥，鬪畫眉鳥，北方有鬪鵪鶉，一羣閒人們圍着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鬪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纔知道金華又有鬪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鬪，我們是使牛和牛鬪。任他們鬪爭着，自己不與鬪，只是看。

軍閥們只管自己鬪爭着，人民不與聞，只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鬪爭，是使兵士們相鬪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

個終于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只是看。

但我們的鬪士，只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制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着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鬪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很，暫時總有一些子遺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

（二月二十四日。）

逃的辯護

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爲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鎗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

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為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裏還坐得住麼？

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並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鎗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這正是這幾年來的教育顯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來罵了。童子軍還在烈士們的輓聯上，說他們『遺臭萬年。』

但我們想一想罷：不是連語言歷史研究所裏的沒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麼？不是學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備的飛機麼？能用本國的刺刀和鎗柄『碰』得瘟頭瘟腦，躲進研究室裏去的，倒能並不瘟頭瘟腦，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礮，炸出研究室外去麼？

阿彌陀佛！

(二月二十四日。)

崇 實

事實常沒有字而這麼好看。

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麼自由地在這裡談着。

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和不准大學生逃難，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些字面，並不是精髓。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于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爲什麼倒搬下不管，單搬

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爲了牠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着，隨時賣出銅錢來。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櫃子裏藏起來的。

但大學生卻多而新，惜哉！

費話不如少說，只剝崔顥黃鶴樓詩以弔之，曰——

關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

（一月三十一日。）

電的利弊

日本幕府時代，曾大殺基督教徒，刑罰很凶，但不准發表，世無知者。到近幾年，乃出版當時的文獻不少。曾見切利支丹殉教記，其中記有拷問教徒的情形，或牽到溫泉旁邊，用熱湯澆身；或周圍生火，慢慢的烤炙，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卻將火移遠，敢死刑為虐殺了。

中國還有更殘酷的。唐人說部中曾有記載，一縣官拷問犯人，四周用火遙焙，口渴，就給他喝醬醋，這是比日本更進一步的辦法。現在官廳拷問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遺下的方法，或則是古今英雄，所見略同。曾見一個囚在反省院裏的青年的信，說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臟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釋放亦不

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陸軍學生，不明內臟構造，其實倒掛灌鼻，可以由氣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卻不能進入心中，大約當時因在苦楚中，知覺替亂，遂疑爲已到心臟了。

但現在之所謂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殘酷又超出于此種方法萬萬。上海有電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頃又醒，則又受刑。聞曾有連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從此牙齒皆搖動，神經亦變鈍，不能復原。前年紀念愛迪生，許多人讚頌電報、電話之有利于人，卻沒有想到同是一電，而有人得到這樣的大害，福人用電氣療病、美容，而被壓迫者卻以此受苦、喪命也。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牠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牠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喫。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蓋不但電氣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航空救國三願

現在各色的人們大喊着各種的救國，好像大家突然愛國了似的。其實不然，本來就是這樣，在這樣地救國的，不過現在喊了出來罷了。

所以銀行家說貯蓄救國，賣稿子的說文學救國，畫畫兒的說藝術救國，愛跳舞的說寓救國于娛樂之中，還有，據煙草公司說，則就是吸吸馬占山將軍牌香煙，也未始非救國之一道云。

這各種救國，是像先前原已實行過來一樣，此後也要實行下去的，決不至于五分鐘。只有航空救國較為別致，是應該刮目相看的，那將來也很難預測，原因是在主張的人們自己大概不是飛行家。

那麼，我們不妨預先說出一點願望來。

看過去年此時的上海報的人們恐怕還記得，蘇州不是有一隊飛機來打仗的麼？後來別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領隊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雙拳不敵四手，終於給日本飛機打落，累得他母親從美洲路遠迢迢的跑來，痛哭一場，帶幾個花圈而去。聽說廣州也有一隊出發的，閩秀們還將詩詞繡在小衫上，贈戰士以壯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還沒有到。

所以我們應該在防空隊成立之前，陳明兩種願望——

- 一、路要認清；
- 二、飛得快些。

還有更要緊的一層，是我們正由『不抵抗』以至『長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時候，實際上恐怕一時未必和外國打仗，那時戰士技癢了，而又苦于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知道會不會炸彈倒落到手無寸鐵的人民頭上來的？

所以還得戰戰兢兢的陳明一種願望，是——

偽 自 由 律

三、莫殺人民！

(二月三日。)

不通兩種

人們每當批評文章的時候，凡是國文教員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學生雜誌上還爲此設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國文其實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馬遷，倘將他的文章推敲起來，無論從文字、文法、修辭的任何一種立場去看，都可以發見『不通』的處所。

不過現在不說這些；要說的只是在籠統的一句『不通』之中，還可由原因而分爲幾種。大概的說，就是：有作者本來還沒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種種關係，不敢通，或不願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報的記載『江都清賦風潮』在『鄉民二度興波作

浪』這一個巧妙的題目之下，述陳友亮之死云：

『陳友亮見官方軍警中，有攜手鎗之劉金發，竟欲奪劉之手鎗，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警察隊亦開空鎗一排，鄉民始後退。』……

『軍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類的費話，這里也且不說。最古怪的是子彈竟被寫得好像活物，會自己飛出膛來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須將上文改作『當被擊斃』纔妥。倘要保存上文，則將末兩句改爲『警察隊空鎗亦一齊發聲，鄉民始後退』這纔銖兩悉稱，和軍警都毫無關係——雖然文理總未免有點希奇。

現在，這樣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現。不過其實也並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緣故。頭等聰明人不談這些，就成了『爲藝術的藝術』家；次等聰明人竭力用種種法，來粉飾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義文學』者，但兩者都是都屬於自己『不願通』即『不肯通』這一類裏的。

(二月三日。)

【因此引起的通論】

『最通的』文藝

王平陵

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看見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裏去了。那麼，像他這種有閒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纔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儘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麼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

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爲着解放勞苦大眾而吶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爲着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麼，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裏，可以遇見他們伴着嬌美的愛侶，一面喝香檳，一面吃朱古力，興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懶，乘着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個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呵！鬪爭呵！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下，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着，歡唱着，熱愛着。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麼苦，喊什麼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糊塗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前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的遺產，是多麼豐富，我們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科學，那一件不是已經到達國際文化的水準。他們有了這些充實的根基，才能產生現在這些學有根蒂的領袖。我們僅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樹，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萬年，中國還是這樣，也許比現在更壞。

不錯，中國的文化運動，也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但是，在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穫到什麼。歐美的名著，在中國是否能有一冊比較可靠的譯本，文藝上的各種派別，各種主義，我們是否都拿得出一種代表作，其他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創造，是否能有一種值得我們記憶。唉！中國的文化低落到這步田地，還談得到什麼呢！

要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如不能從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轉運一些文藝的糧食，多多地樹藝一些文藝的種子，我敢斷言：在現代的中國，決不會產生『最通的』文藝的。

（二月二十日武漢日報的文藝週刊。）

【通論的拆通】

官話而已

家 幹

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論的腔調，就明白是屬於『官方』的。一提起筆，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

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什麼『聽說』什麼『如果』說得好不自在。聽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

乘着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經有人當開學之際，命大學生全體起立，向着鮑羅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經有人做過孫中山與列寧，說得他們倆真好像沒有什麼兩樣；至于聚斂享樂的人們之多，更是社會上大家周知的事實，但可惜那都並不是我們。平陵先生的『聽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

于是還要說到『文化的本身』上。試想就是幾個弄弄筆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監禁，鎗斃，失蹤的災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評，便立刻招來了『聽說』和『如果』的官話，叫作『先生們，』大有一網打盡之概。則做『基本的工夫』者，現在捨官許的『第二種人』和『民族主義文藝者』之外還能靠誰呢？『唉！』然而他們是做不出來的。現在只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爲『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黨，這可真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

（七月十九日。）

賭 咒

『天誅地滅，男盜女娼』——是中國人賭咒的經典，幾乎像詩云子曰一樣。現在的宣誓，『誓殺敵，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這種成語了。

但是，賭咒的實質還是一樣，總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見得來誅他，地也不見得來滅他，現在連人參都『科學化地』含起電氣來了，難道『天地』還不科學化麼！至于男盜和女娼，那是非但無害，而且有益：男盜——可以多刮幾層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幾個『裙帶官兒』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說：你這個『盜』和『娼』的解釋都不是古義。我回答說——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是盜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賭咒也摩登，變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戰略關係

首都救國日報上有句名言：

『浸使爲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見上海日報二月九日轉載。）

雖流血亦所不辭！勇敢哉戰略大家也！

血的確流過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將要流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少。這都是反對運動者的血。爲着什麼？爲着戰略關係。

戰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時候，曾經說：『爲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線，』這樣就退兵；過了兩天又說，爲戰略關係，『如日軍不向我軍射擊，則我軍不得開鎗，着士兵一體遵照，』這樣就停戰。此後，『第二道防線』消失，上海和議開始，談判，簽字，完結。那時候，大

概爲着戰略關係也曾經見過血；這是軍機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於親自流過血的雖然知道，他們又已經沒有了舌頭。究竟那時候的敵人爲什麼沒有『被誘深入？』

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次敵人所以沒有『被誘深入』者，決不是當時戰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於反對運動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還有個原因：原來英國從中調停——暗地裏和日本有了諒解，說是日本呀，你們的軍隊暫時退出上海，我們英國更進一步來幫你的忙，使滿洲國不至於被國聯否認——這就是現在國聯的什麼什麼草案，什麼什麼委員的態度。這其實是說，你不要在這里深入——這里是有賊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說。深入還是要深入，不過地點暫時不同。

因此，『誘敵深入北平』的戰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幾次。

其實，現在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學生，也已經各自喬遷。無論是黃面孔、白面孔、新大陸、舊大陸的敵人，無論這些敵人要深入到什麼地方，都請深入罷。至于怕有什麼反對運動，那我們的戰略家：『雖流血亦所不辭！』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備考】

奇文共賞

周敬儕

大人先生們把『故宮古物』看得和命（當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堅決南遷，無非因為『古物』價值不止『連城』並且容易搬動，容易變錢的原故，這也值得你們大驚小怪，冷嘲熱諷！我正這樣想着的時候，居然從首都一家報紙上見到贊成『古物南遷』的社論；並且建議『武力制止反對』、『流血在所不辭』，請求政府『保持威信』、『貫徹政策』。這樣的宏詞高論，我實在不忍使牠湮沒無聞，因特不辭辛苦，抄錄出來，獻給大眾：

『……北平各團體之反對古物南遷，為有害北平將來之繁榮，此種自私自利完全蔑視國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團體竟敢說出，吾人殊服其厚顏無恥，彼等只為北平之繁榮，必須以數千年古物冒全被敵人劫奪而去之大危險，所見未免太小，使政府為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則古

物必被敵人劫奪而去，試問將來北平之繁榮何由維持，故不如先行遷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後，再行遷回，北平各團體自私自利，固可惡可恥，其無遠慮，亦可憐也，其反對遷移之又一理由，則謂政府應先顧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實非，蓋放棄一部分土地供敵人一時之佔領，以殲滅敵人，然後再行恢復，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棄莫斯科，且將莫斯科燒毀，以因拿破崙，歐戰時，比利時，塞爾維亞，皆放棄全部領土，供敵人蹂躪，卒將強德擊破，蓋領土被佔，只須不與敵人媾和，簽字於割讓條約，則敵人固無如該土何，至於故宮古物，若不遷移，設不幸北平被敵人佔領，將古物劫奪而去，試問中國將何法以恢復之，行見中國文明結晶，供敵人戰利品，可恥孰甚……最後吾人奉告政府，政府遷移古物之政策，既已決定，則不論遇如何阻礙，應求其貫徹，若一經無見識無遠慮之羣愚反對，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張嚴責張學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

（申報自由談。）

頌 蕭

蕭伯納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會因此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各報由『路透電』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

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爲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識余乎？』（十一日路透電）

我們其實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喫的是什麼。但對於蕭——惜哉，

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只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游歷蘇聯以後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爲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殭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爲赤色革命家，因爲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爲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國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偉大的。

此之所以爲蕭伯納！

（二月十五日。）

【又招惱了大主筆】

蕭伯納究竟不凡

大晚報社論

「你們批評英國人做事，覺得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好，也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壞；可是你們總找不出那一件事給英國人做壞了。他做事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要斫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就要不得了。」

這是蕭伯納老先生在『命運之人』中批評英國人的尖刻語。我們舉這一個例來介紹蕭先生，要讀者認識大偉人之所以偉大，也自有其祕訣在。這樣子的冷箭，充滿在蕭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於是蕭先生的名言警句，家傳戶誦，而一代文豪也確定了他的偉大。

借主義，成大名，這是現代學者一時的風尚，蕭先生有嘴說英國人，可惜沒有眼估量自己。我們知道蕭先生是泛平主義的先進，終身擁護這漸進社會主義，他的戲劇、小說、批評、散文中充塞着這種主義的宣傳品，蕭先生之於社會主義，可說是個澈頭澈尾的忠實信徒。然而，我們又知道，蕭先生是銖銖必較的積產專家，是反對慈善事業最力的理論家，結果，他坐擁着百萬鉅資而團團早成了個富家翁。蕭先生唱着平均資產的高調，為被壓迫的勞工鳴不平，向寄生物性質的資產家冷嘲熱諷，因此而贏得全民衆的同情，一書出版，大家搶着買，一劇登場，一百多場做下去，不愁沒有人看，於是蕭先生坐在提倡共產主義的安樂椅裏，笑嘻嘻地自鳴得意，借主義以成名，掛羊頭買狗肉的戲法，究竟巧妙無窮。

現在，蕭先生功成名就，到我們窮苦的中國來玩玩了。多謝他提攜後進的熱誠，在香港告訴我們學生道：『二十歲不為赤色革命家，五十歲要成殭石；二十歲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歲可不致落伍。』原來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祇為自己怕做殭石，怕落伍而已；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本來與個人的前途沒有多大

關係；我們要在社會裏混出頭，祇求不殭，祇求不落伍，這是現代人立身處世的名言，蕭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們五體投地，真不愧『聖之時者也』的現代孔子了。

然而，蕭先生可別小看了這老大的中國，像你老先生這樣時髦的學者，我們何嘗沒有。坐在安樂椅裏發着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戲法已耍得十分純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爾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據我們愚蠢的見解，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的是個誠字。你信仰什麼主義，就該誠摯地力行，不該張大了嘴唱着好聽。若說，蕭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產主義的，就請他散盡了家產再說話。可是，話也得說回來，蕭先生散盡了家產，真穿着無產同志的襤褸裝束，坐着三等艙來到中國，又有誰去睬他呢？這樣一想：蕭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筆】

前文的案語

樂 雯

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祕訣；（二）這祕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爲着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喫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爲殭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贊成這種『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贊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

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着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贊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

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裏發着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喫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着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歷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

（蕭伯納在上海）

對於戰爭的祈禱

——讀書心得——

熱河的戰爭開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戰爭的結束的『紀念日』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一次又一次的印刷着，出賣着；而小兵們的血傷痕、熱烈的心，還要被人糟蹋多少時候？回憶裏的礮聲和幾千里外的礮聲，都使得我們帶着無可如何的苦笑，去翻開一本無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幾句『警句』的閒書。這警句是：

『喂，排長，我們到底上那裏去喲？』——其中的一個問，

『走吧。我也不曉得。』

『丟那媽，死光就算了，走什麼！』

『不要吵，服從命令！』

『丟那媽的命令！』

然而丟那媽歸丟那媽，命令還是命令，走也當然還是走，四點鐘的時候，中山路復歸于沈寂，風和月兒沙沙的響，月亮躲在青灰色的雲海裏，睡着，依舊不管人類的事。

這樣，十九路軍就向西退去。

（黃震遐：大上海的毀滅）

什麼時候『丟那媽』和『命令』不是這樣各歸各，那就得救了。不然呢？還有『警句』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十九路軍打，是告訴我們說，除掉空說以外，還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軍勝利，祇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迷夢！

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無趣！

十九路軍失敗，纔告訴我們非努力，還是做奴隸的好！

（見同書）

這是警告我們，非革命，則一切戰爭，命裏註定的必然要失敗。現在，主戰是人人都會的了——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軍的經驗：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勝，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剛剛適宜的辦法是失敗。『民族英雄』對於戰爭的祈禱是這樣的。而戰爭又的確是他們在指揮着，這指揮權是不肯讓給別人的。戰爭，禁得起主持的人預定着打敗仗的計畫麼？好像戲臺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臺約定了的。嗚呼，我們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從諷刺到幽默

諷刺家，是危險的。

假使他所諷刺的是不識字者，被殺戮者，被囚禁者，被壓迫者罷，那很好，正可給讀他文章的所謂有教育的知識者嘻嘻一笑，更覺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現今的諷刺家之所以為諷刺家，卻正在諷刺這一流所謂有教育的知識者社會。

因為所諷刺的是這一流社會，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覺得好像刺着自己，就一個個的暗暗的迎出來，又用了他們的諷刺，想來刺死這諷刺者。

最先是說他冷嘲，漸漸的又七嘴八舌的說他謾罵，俏皮話，刻毒，可惡，學匪，紹興師爺，等等，等等。然而諷刺社會的諷刺，卻往往仍然會「悠久得驚人」的，即使捧出了做過和

尙的洋人或專辦了小報來打擊，也還是沒有效，這怎不氣死人也麼哥呢！

樞紐是在這里：他所諷刺的是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個人，他的諷刺尙存在，你的諷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這樣的可惡的諷刺家，只好來改變社會。

然而社會諷刺家究竟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學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時代。人們誰高興做『文字獄』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絕，肚子裏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別人，現在的法律上也尙無國民必須哭喪着臉的規定，並非『非法』，蓋可斷言的。

我想：這便是去年以來，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單是『爲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這情形恐怕是過不長久的，『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于是雖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于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

（三月二日。）

從幽默到正經

『幽默』一傾于諷刺，失了牠的本領且不說，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諷刺』來陷害了，倘若墮于『說笑話』則壽命是可以較為長遠，流年也大致順利的，但愈墮愈近于國貨，終將成爲洋式徐文長。當提倡國貨聲中，廣告上已有中國的『自造船來品』便是一個證據。

而況我實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規定國民必須哭喪着臉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東省淪陷，舉國騷然，愛國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結果發見了其一是在青年的愛玩樂，學跳舞。當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時候，一個大炸彈拋下來，雖然沒有傷人，冰卻已經炸了一個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關失守，熱河喫緊了，有名的文人學士，也就更加喫緊起來，做輓歌的也有，做戰歌的也有，講文德的也有，罵人固然可惡，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經文章，裝正經臉孔，以補『不抵抗主義』之不足。

但人類究竟不能這麼沈靜，當大敵壓境之際，手無寸鐵，殺不得敵人，而心裏卻總是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尋求敵人的替代。這時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為他這時便被叫作『陳叔寶全無心肝。』所以知機的人，必須也和大家一樣哭喪着臉，以免于難。『聰明人不喫眼前虧，』亦古賢之遺教也，然而這時也就『幽默』歸天，『正經』統一了剩下的全中國。

明白這一節，我們就知道先前爲什麼無論貞女與淫女，見人時都得不笑不言；現在爲什麼送葬的女人，無論悲哀與否，在路上定要放聲大叫。

這就是『正經。』說出來麼，那就是『刻毒。』

（三月二日。）

王道詩話

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據說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里大火，牠就用翅膀蘸着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牠那一點水怎麼救得熄這樣的大火，牠說：『我總算在這里住過的，現在不得不盡點兒心。』（事出櫟園書影，見胡適人權論集序所引。）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這是不會沒有報酬的。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價錢不算小，這『叫做』實驗主義。

但是，這火怎麼救，在人權論時期（一九二九——三〇年）還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賣價格做出來之後，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報登載胡

博士的談話說：

『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樣，應當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審判……』

這就清楚得多了！這不是在說『政府權』了麼？自然，博士的頭腦並不簡單，他不至于只說：『一隻手拿寶劍，一隻手拿着經典！』如什麼主義之類。他是說還應當拿着法律。中國的幫忙文人，總有這一套祕訣，說什麼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麼幽默，他教你離得殺豬的地方遠遠的，嘴裏喫得着肉，心裏還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詩曰：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
人權王道兩翻新，爲感君恩奏聖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先生熟讀聖賢書，君子由來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遠庖廚。

能言鸚鵡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誇，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爲奢。

（三月五日。）

伸 冤

李頓報告書採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衆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爲中國好友，且爲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纔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着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繫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本苦心？

爲着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復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只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復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佈告』。『這裡可以找着『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佈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爲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

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面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只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為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麼？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佈告上也說：『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託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於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鎗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面也同樣的儘在『縮短陣線。』不但如此，中國方面埋頭勦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

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爲之焦慮』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面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無非是爲着要感動日本，使牠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里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歷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曲的解放

『詞的解放』已經有過專號，詞裏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

曲爲什麼不能解放，也來混帳混帳？不過，『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後臺戲搬到前臺——未免有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調，聲律乖謬，還在其次。

『平津會』雜劇

（生上）連臺好戲不尋常：攘外期間安內忙。只恨熱湯滾得快，未敲鑼鼓已收場。

（唱）

〔短柱天淨紗〕

熱湯混帳——逃亡！

裝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

模倣中央榜樣：

——整裝西望，

商量奔向咸陽。

(生)你你你……低聲！你看咱們那湯兒呀，他那里無心串演，我這里有口難分，一齣

好戲，就此糟糕，好不麻煩人也！

(旦)那有什麼？再來一齣『查辦』好了。咱們一夫一婦，一正一副，也還够唱的。

(生)好罷！(唱)

〔顛倒陽春曲〕

人前指定可憎張，

罵一聲，不抵抗！

(旦背人唱)

百忙裏算甚糊塗帳？

只不過假裝腔，

便罵罵又何妨？

(丑攜包裹急上)阿呀呀，噲噲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兒呀，你這麼心慌！你應當在前面多擋這麼幾擋，讓我們好收拾敗拾。(唱)

〔顛倒陽春曲〕

背人搜定可憐湯

罵一聲，枉抵抗。

戲臺上露甚慌張相？

只不過理行裝，

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們倒要理行裝！我的行裝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兒快快走扶桑，(生)雷厲風行查辦忙。(丑)如此犧牲還值得，堂堂大

漢有風光。(同下)

(三月九日。)

文學上的折扣

有一種無聊小報，以登載誣讒一部分人的小說自鳴得意，連姓名也都給以影射的，忽然對於投稿，說是『如含攻訐個人或團體性質者恕不掲載』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

凡我所遇見的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人中，往往不滿於中國文章之誇大。這真是雖然研究中國文學，恐怕到死也還不會懂得中國文學的外國人。倘是我們中國人，則只要看過幾百篇文章，見過十來個所謂『文學家』的行徑，又不是剛剛『從民間來』的老實青年，就決不會上當。因為我們慣熟了，恰如錢店伙計的看見鈔票一般，知道什麼是通行的，什麼是該打折扣的，什麼是廢票，簡直要不得。

譬如說罷，稱贊貴相是「兩耳垂肩，」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對折，覺得比通常也許大一點，可是決不相信他的耳朵像豬鬃一樣。說愁是「白髮三千丈，」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二萬扣，以為也許有七八尺，但決不相信牠會盤在頂上像一個大草團。這種尺寸，雖然有些模胡，不過總不至於相差太遠。反之，我們也能將少的增多，無的化有，例如戲臺上走出四個拿刀的瘦伶仃的小戲子，我們就知道這是十萬精兵；刊物上登載一篇儼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們就知道字裏行間還有看不見的鬼把戲。

又反之，我們並且能將有的化無，例如什麼「枕戈待旦」呀，「臥薪嘗膽」呀，「盡忠報國」呀，我們也就即刻會看成白紙，恰如還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

但這些文章，我們有時也還看。蘇東坡貶黃州時，無聊之至，有客來，便要他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你姑且胡說一通罷。」我們的看，也不過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會上有這樣的東西，是費去了多少無聊的眼力。人們往往以為打牌，跳舞有害，實則這種文章的害還要大，因為一不小心，就會給牠教成後天的低能兒的。

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蠶起，不是以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

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現在的文人雖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裏卻還埋著老祖宗，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這纔顯出幾分真實。

『文學家』倘不用事實來證明他已經改變了他的誇大，裝腔，撒謊……的老脾氣，則即使對天立誓，說是從此要十分正經，否則天誅地滅，也還是徒勞的。因為我們也早已看慣了許多家都釘着『假冒王麻子滅門三代』的金漆牌子的了，又何況他連小尾巴也還在搖搖搖呢。

（三月十二日。）

迎頭經

中國現代聖經——迎頭經曰：『我們……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

傳曰：追趕總只有向後跟着，普通是無所謂迎頭追趕的。然而聖經決不會錯，更不會不通，何況這個年頭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趕上偏偏說迎頭，向後跟着，那就說不行！

現在通行的說法是：『日軍所至，抵抗隨之，』至於收復失地與否，那麼，當然『既非軍事專家，詳細計畫，不得而知。』不錯呀，『日軍所至，抵抗隨之，』這不是迎頭趕上是什麼！日軍一到，迎頭而『趕』；日軍到瀋陽，迎頭趕上北平；日軍到開北，迎頭趕上真茹；日軍到山海關，迎頭趕上塘沽；日軍到承德，迎頭趕上古北口……以前有過行都洛陽，現在有了陪都西安，將來還有一『漢族發源地』崑崙山——西方極樂世界。至於收復失地云云，

則雖非軍事專家亦得而知焉，於經有之，曰『不要向後跟着』也。證之已往的上海戰事，每到日軍退守租界的時候，就要『嚴飭所部切勿越界一步。』這樣，所謂迎頭趕上和勿向後跟，都是不但見於經典而且證諸實驗的真理了。右傳之一章。

傳又曰：迎頭趕和勿後跟，還有第二種的微言大義——

報載熱河實況曰：『義軍皆極勇敢，認擾亂及殺戮日軍為興奮之事……唯張作相接收義軍之消息發表後，張作相既不親往撫慰，熱湯又停止供給義軍汽油，運輸中斷，義軍大都失望，甚至有認替張作相立功為無謂者。』『日軍既至凌源，其時張作相已不在，吾人聞訊出走，熱湯扣車運物已成目擊之事實，證以日軍從未派飛機至承德轟炸……可知承德實為妥協之放棄。』（張慧冲君在上海東北難民救濟會席上所談。）雖然據張慧冲君所說，『享名最盛之義軍領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義軍的兵士的確是極勇敢的小百姓。正因為這些小百姓不懂得聖經，所以也不知道迎頭式的策略，於是小百姓自己，就自然要碰見迎頭的抵抗了：熱湯放棄承德之後，北平軍委分會下令『固守古北口，如義軍有欲入口者，即開鎗迎擊之。』這是說，我的『抵抗』只是

隨日軍之所至，你要換個樣子去抵抗，我就抵抗你；何況我的退後是預先約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協，那就只有『不要你向後跟着』而要把你『迎頭趕上』梁山了。右傳之二章。

詩云：『惶惶』大軍，迎頭而奔，『噬噬』小民，勿向後跟！賦也。

（三月十四日。）

這篇文章被檢查員所指摘，經過改正，這纔能在十九日的報上登出來了。

原文是這樣的——

第三段『現在通行的說法』至『當然既』原文爲『民國廿二年春×三月某日，當局談話曰：『日軍所至，抵抗隨之……至收復失地及反攻承德，須視軍事進展如何而定，余』又『不得而知』下有注云：（申報三月十二日第三張）。

第四段『報載熱河……』上有『民國廿二年春×三月』九字。

（三月十九夜記。）

「光明所到……」

中國監獄裏的拷打，是公然的祕密。上月裏，民權保障同盟曾經提起了這問題。

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揭載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詳述胡適博士曾經親自看過幾個監獄，「很親愛的」告訴這位記者，說「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最輕微的證據，……他們很容易和犯人談話，有一次胡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的情形，他（胡適博士——幹注）說，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雖然他們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幹注）訴說待遇的惡劣侮辱，然而關於嚴刑拷打，他們卻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慎重調查」的光榮，但在十年以前，是參觀過北京的模

範監獄的。雖是模範監獄，而訪問犯人，談話卻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約三尺，旁邊站一獄卒，時間既有限制，談話也不准用暗號，更何況外國話。

而這回胡適博士卻『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真是特別之極了。莫非中國的監獄竟已經改良到這地步，『自由』到這地步；還是獄卒給『英國話』嚇倒了，以為胡適博士是李頓爵士的同鄉，很有來歷的緣故呢？

幸而我這回看見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適博士的題辭：

『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無新式標點，這是我僭加的——幹注。）

我于是大澈大悟。監獄裏是不准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但不知這位『光明』回府以後，監獄裏可從此也永遠允許別人用『英國話』和

犯人會談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來』了也。

而這位『光明』又因為大學和庚款委員會的事務忙，不能常跑到『黑暗』裏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調查』監獄之前，犯人們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說『英國話』的幸福了罷。嗚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監獄裏的光明世界真是暫時得很！

但是，這是怨不了誰的，他們千不該萬不該是自己犯了『法』。『好人』就決不至於犯『法』。倘有不信，看這『光明』

（三月十五日。）

止哭文學

前三年，『民族主義文學』家敲着大鑼大鼓的時候，曾經有一篇黃人之血說明了最高的願望是在追隨成吉思皇帝的孫子拔都元帥之後，去勦滅『幹羅斯』。『幹羅斯者，今之蘇俄也。那時就有人指出，說是現在的拔都的大軍，就是日本的軍馬，而在『西征』之前，尚須先將中國征服，給變成從軍的奴才。

當自己們被征服時，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是很苦痛的。這實例，就如東三省的淪亡，上海的爆擊，凡是活着的人們，毫無悲憤的怕是很少很少罷。但這悲憤，于將來的『西征』是大有妨礙的。于是來了一部大上海的毀滅，用數目字告訴讀者以中國的武力，決定不如日本，給大家平平心；而且以為活着不如死亡（『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

無趣！』但勝利又不如敗退（『十九路軍勝利，祇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迷夢！』）。總之，戰死是好的，但戰敗尤其好，上海之役，正是中國的完全的成功。

現在第二步開始了。據中央社消息，則日本已有與滿洲國簽訂一種『中華聯邦帝國密約』之陰謀。那方案的第一條是：『現在世界只有兩種國家，一種係資本主義，英、美、日、意、法，一種係共產主義，蘇俄。現在要抵制蘇俄，非中日聯合起來……不能成功』云（詳見三月十九日申報）

要『聯合起來』了。這回是中日兩國的完全的成功，是從『大上海的毀滅』走到『黃人之血』路上去的第二步。

固然，有些地方正在爆擊，上海卻自從遭到爆擊之後，已經有了一年多，但有些人民不悟『西征』的必然的步法，竟似乎還沒有完全忘掉前年的悲憤。這悲憤，和目前的『聯合』就大有妨礙的。在這景況中，應運而生的是給人們一點爽利和慰安，好像『辣椒和橄欖』的文學。這也許正是一服苦悶的對症藥罷。爲什麼呢？就因爲是『辣椒雖辣，辣不死人，橄欖雖苦，苦中有味』的。明乎此，也就知道苦力爲什麼吸鴉片。

而且不獨無聲的苦悶而已，還據說辣椒是連『討厭的哭聲』也可以停止的。王慈先生在提倡辣椒救國這一篇名文裏告訴我們說：

『……還有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裏，大哭的時候，倘使母親拿一隻辣茄子給小兒咬，很靈驗的可以立止大哭……』

『現在的中國，彷彿是一個在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制止他討厭的哭聲，祇要多多的給辣茄子他咬。』（大晚報副刊第十二號）

辣椒可以止小兒的大哭，真是空前絕後的奇聞，倘是真的，中國人可實在是一種與衆不同的特別『民族』了。然而也很分明的看見了這種『文學』的企圖，是在給人一辣而不死，『制止他討厭的哭聲，』靜候着拔都元帥。

不過，這是無效的，遠不如哭則『格殺勿論』的靈驗。此後要防的是『道路以目』了，我們等待着遮眼文學罷。

（三月十五日。）

【備考】

提倡辣椒救國

王 慈

記得有一次跟着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點心館子裏去，坐定了以後，堂倌跑過來問道：

「老鄉！喫些什麼東西？」

「兩盤鍋貼兒！」那位北方朋友用純粹的北方口音說。

隨着鍋貼兒端來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見那位北方朋友把鍋貼和着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的送進嘴裏去，觸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險般的把一個鍋貼悄悄的蘸上一點兒辣椒，送下肚去，祇覺得舌尖頓時麻木得失了知覺，喉間癢辣得怪難受，眼眶裏不自主湧着淚水，這時，我大大的感覺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見了我這個樣子，大笑了起來，接着他告訴我，北方人的善

喫辣椒是出于天性，他們是抱着『飯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喫』的主義的；他們對於辣椒已經是彷彿吸鴉片似的上了癮！還有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裏，大哭的時候，倘使母親拿一隻辣茄子給小兒咬，很靈驗的可以立止大哭……』

現在的中國，彷彿是一個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制止他討厭的哭聲，祇要多多的給辣茄子他咬。

中國的人們，等於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喫辣椒是不會興奮的！

（三月二十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硬要用辣椒止哭：】

不要亂咬人

二 慈

當心咬着辣椒

上海近來多了趙大爺趙秀才一批的人，握了尺棒，拚命想找到『阿Q相』的人來出氣。還好，這一批文人從有色的近視眼鏡裏望出來認為『阿Q相』的，偏偏不是真正的阿Q。

不知道是什麼來歷的何家幹，看了我的提倡辣椒救國（見本刊十二號，）認北方小孩的愛嗜辣椒，為『空前絕後』的『奇聞』。倘使我那位北方朋友告訴我，是吹的牛皮，那末，的確可以說空前。而何家幹既不是數千年前的劉伯溫，在某報上做文章，卻是像在造『推背圖』。北方小孩子愛嗜辣椒，若使可以算是『奇聞』，那麼吸鴉片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為什麼也有煙癮呢？

何家幹既抓不到可以出氣的對象，他在撲了一個空之後，卻還要振振有詞，說什麼：『倘使是真的，中國人可實在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別民族了。』

敢問何家幹，戴了有色近視眼鏡捧讀提倡辣椒救國的時候，有沒有看見『北方』兩個字？（何家幹既把有這兩個字的句子，錄在他的談話裏，顯然是看到了。）既已看到了，那末，請問斯德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個的日耳曼亞

伯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個的不列顛羣島？

在這裏我真懷疑，何家幹的腦筋，怎的是這麼簡單？會前後矛盾到這個地步！趙大爺和趙秀才一類的人，想結黨來亂咬人。我可以先告訴他們：我和辣椒與橄欖的編者是素不相識的，我也從沒有寫過黃人之血，請何家幹若使一定要咬我一口，我勸他再架一副可以透視的眼鏡，認清了目標再咬。否則咬着辣椒，哭笑不得的時候，我不能負責。

（三月二十八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但到底是不行的：】

這叫作愈出愈奇

家 幹

斯德丁實在不可以代表整個的日耳曼的，北方也實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國。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卻是事實，也實在沒有法子想。

吸鴉片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也有煙癮，是的確的。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

育出來的嬰孩，卻沒有辣椒癮，和嗜醋者的孩子，沒有醋癮相同。這也是事實，無論誰都沒有法子想。

凡事實，靠發少爺脾氣是還是改不過來的。格里萊阿說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燒死他，他怕死，將主張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爲什麼呢？就因爲地球是實在在回旋的緣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對，倘將辣椒塞在哭着的北方（！）孩子的嘴裏，他不但
不止，還要哭得更加利害的。

（七月十九日。）

「人話」

記得荷蘭的作家望藹覃 (F. van Eeden) ——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話小約翰裏，記着小約翰聽兩種菌類相爭論，從旁批評了一句「他們倆都是有毒的，」菌們便驚喊道：「你是人麼？這是人話呵！」

從菌類的立場看起來，的確應該驚喊的。人類因為要喫牠們，纔首先注意于有毒或無毒，但在菌們自己，這卻完全沒有關係，完全不成問題。

雖是意在給人科學知識的書籍或文章，為要講得有趣。也往往太說些「人話。」這毛病，是連法布耳 (J. H. Fabre) 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蟲記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也是在所不免的。隨手抄撮的東西不必說了。近來在雜誌上偶然看見一篇

教青年以生物學上的知識的文章，內有這樣的敘述——

「烏糞蜘蛛……形體既似烏糞，又能伏着不動，自己假做烏糞的樣子。」

「動物界中，要殘食自己親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要算前面所說的蜘蛛和現今要說的螳螂了……」

這也未免太說了「人話」。烏糞蜘蛛只是形體原像烏糞，性又不大走動罷了，並非牠故意裝作烏糞模樣，意在欺騙小蟲豸。螳螂界中也尚無五倫之說，牠在交尾中喫掉雄的，只是肚子餓了，在喫東西，何嘗知道這東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但經用「人話」一寫，一個就成了陰謀害命的兇犯，一個是謀死親夫的毒婦了。實則都是冤枉的。

「人話」之中，又有各種的「人話」：有英人話，有華人話。華人話中又有各種：有「高等華人話」，有「下等華人話」。浙西有一個譏笑鄉下女人之無知的笑話——

「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歎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麼快活。這時還不是在牀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柿餅來！」」

然而這並不是「下等華人話」，倒是高等華人意中的「下等華人話」，所以其實

是『高等華人話』。在下等華人自己，那時也許未必這麼說，即使這麼說，也並不以為笑話的。

再說下去，就要引起階級文學的麻煩來了，『帶住。』

現在很有些人做書，格式是寫給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說的一定是『人話』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種『人話』？為什麼不寫給年齡更大的人們？年齡大了就不屑教誨麼？還是青年和少年比較的純厚，容易誑騙呢？

（三月二十一日。）

出賣靈魂的秘訣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着『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適博士對症發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

據博士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見報載胡適之的最近談話，下同。）這是值得憂慮的：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征服中國麼？法子是有。『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係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澈底停止侵略中國，反』

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爲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祕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麼，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爲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爲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爲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這『唯一方法』的實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覺悟。如果不覺悟，那又怎麼辦？胡博士回答道：『到無可奈何之時，真的接受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無可奈何的呵——因爲那時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這始終是中國民族性的污點，卽爲日本計，也非萬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準備出席太平洋會議，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國並

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所謂『澈底停止侵略，』原
只要執行『公平的』李頓報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文人無文

在一種姓「大」的報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張的」在「要求中國有爲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犯着可詬病的惡癖。」這實在是對透了的。但那『無行』的界說，可又嚴緊透頂了。據說：『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指不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爲，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爲，也都包括在內。』

接着就舉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惡癖』的例子，來作中國的有爲的青年的殷鑒，一條是『宮地嘉六愛用指爪搔頭髮，』還有一條是『金子洋文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乾和頭皮癢，古今的聖賢都不稱牠爲美德，但好像也沒有斥爲惡德的。不料一到中國上海的現在，愛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頭髮罷，也成了『不近人情的

惡劣行爲』了。如果不舒服，也只好熬着。要做有爲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了。

但中國文人的『惡癖』其實並不在這些，祇要他寫得出文章來，或搔或舐，都不關緊要，『不近人情』的並不是『文人無行』而是『文人無文』。

我們在兩三年前，就看見刊物上說某詩人到西湖吟詩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萬字的小說了，但直到現在，除了並未豫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別的大作都沒有出現。

拾些瑣事，做本隨筆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講一通昏話，稱爲評論；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爲世界文學史家；湊一本文學家辭典，連自己也塞在裏面，就成爲世界的文人的也。然而，現在到底也都是中國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無文，武人也一樣不武。說是『枕戈待旦』的，到夜還沒有動手，說是『誓死抵抗』的，看見一百多個敵兵就逃走了。祇是通電宣言之類，卻大做其駢體，『文』得異乎尋常。『偃武修文』古有明訓，文星全照到營子裏去了。于是我們的『文人』就只

好不舐嘴唇，不搔頭髮，揣摩人情，單落得一個『有行』完事。

(二月二十八日。)

【備考】

惡癖

若谷

『文人無行』久爲一般人所詬病。

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爲，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爲，也都包括在內。

只要是人，誰都容易沾染不良的習慣，特別是文人，因爲專心文字著作的緣故，在日常生活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怪異的舉動，而且，或者也因爲工作勞苦的緣故，十人中九人是染着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歡服用刺激神經的興奮劑，捲煙與咖啡，是成爲現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現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煙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着各樣的怪奇惡癖。前田

河廣一郎愛酒若命，醉後嘔鳴不休；谷崎潤一郎愛聞女人的體臭和嗜女人的痰涕；今東光喜歡自炫學問宣傳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細田源吉喜作猥談，朝食後熟睡二小時；宮地嘉六愛用指爪搔頭髮；宇野浩二醺醉後悔慢侍妓；林房雄有姦通癖；山本有三乘電車時喜橫膝斜坐，勝本清一郎談話時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日本現代文人所犯的惡癖，正和中國舊時文人辜鴻鳴喜聞女人金蓮同樣的可厭，我要求現代中國有爲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着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再犯着和日本文人同樣可詬病的惡癖。

（三月九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風涼話？】

第四種人

周木齋

四月四日申報自由談，載有何家幹先生文人無文一文，論中國的文人，有云：

「不近人情」的並不是「文人無行」而是「文人無文」。拾些瑣事，做本隨筆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講一通昏話，稱為評論；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的是有的。甚至於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為世界文學史家；湊一本文學家辭典，連自己也塞在裏面，就成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現在到底也都是中國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誠如這文所說，「這實在是對透了的。」

然而例外的是：

「直到現在，除了並未預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別的大作卻沒有出現。」

「文」的「界說」也可借用同文的話，「可又嚴緊透頂了。」

這文的動機，從開首的幾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種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關於「文人無行」的話而起的。此外，聽說「何家幹」就是魯迅先生的筆名。

可是議論雖『對透』，『文』的『界說』雖『嚴緊透頂』，但正惟因為這樣，卻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裏面了；縱然魯迅先生是以『第四種人』自居的。中國文壇的充實而又空虛，無可諱言也不必諱言。不過在矮子中間找長人，比較還是有的。我們企望先進比企圖誰某總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總要容易收穫些。以魯迅先生的素養及過去的造就，總還不失為中國的金鋼鑽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來又是怎樣？單就他個人的發展而言，卻中畫了，現在不下一道罪己詔，頂倒置身事外，說些風涼話，這是『第四種人』了。名的成人！『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無文』，最要緊的還是『文，人不行』（『行』為動詞。）『進，吾往也！』

（四月十五日，濤聲二卷十四期。）

【乘涼】

兩誤一不同

家 聲

這位木齋先生對我有兩種誤解，和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

第一是關於『文』的界說。我的這篇雜感，是由大晚報副刊上的惡癖而來的，而那篇中所舉的文人，都是小說作者。這事木齋先生明明知道，現在混而言之者，大約因為作文要緊，顧不及這些了罷。『第四種人』這題目，也實在時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詔』。我現在作一個無聊的聲明：何家幹誠然就是魯迅，但並沒有做皇帝。不過好在這樣誤解的人們也並不多。

意見不同之點，是凡有所指責時，木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內為『風涼話』；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內為『風涼話』，如身居上海，而責北平的學生應該赴難，至少是不逃難之類。

但由這一篇文章，我可實在得了很大的益處。就是：凡有指摘社會全體的癥結的文字，論者往往謂之『罵人』。先前我是很以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們的意見，是認為這類文章，決不含自己在內，因為如果兼包自己，是應該自

下罪己詔的，現在沒有詔書而有攻擊，足見所指責的全是別人了，于是乎謂之「罵」。且從而羣起而罵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癥結，沈入深淵，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最藝術的國家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的可貴，是在於兩面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的，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麼？譬如說，中國的固有文化是科舉制度，外加捐班之類。當初說這太不像民權，不合時代潮流，於是扮成了中華民國。然而這民國年久失修，連招牌都已經剝落殆盡，彷彿花旦臉上的脂粉。同時，老實的民衆真個要起政權來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參政權。這對於民族是不忠，對於祖宗是不孝，實屬反動之至。現在早已回到恢復固有文化的『時代潮流』，那能放任這種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過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誰有代表國民的資格，須由考試決定。

第二，考出了舉人之後，再來挑選一次，此之謂選（動詞）舉人而被挑選的舉人，自然是被選舉人了。照文法而論，這樣的國民大會的選舉人，應稱爲『選舉人者』而被選舉人，應稱爲『被選之舉人』。但是，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麼？因此，他們得扮成憲政國家的選舉的人和被選舉人，雖則實質上還是秀才和舉人。這草案的深意就在這裏：叫民衆看見是民權，而民族祖宗看見是忠孝——忠于固有科舉的民族，孝于制定科舉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經實現的民權，是納稅的方有權選舉和被選，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雖是捐班——有錢的爲主，然而他們一定會考中舉人，甚至不補考也會賜同進士出身的，因爲洋大人膝下的榜樣，理應遵照，何況這也並不是一面違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憲政民權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從這一方面看過去是抵抗，從那一面看過來其實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實業家、銀行家，一面自稱『小貧而已』。其四，一面日貨銷路復旺，一面對人說是『國貨年』……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兩面光滑的。

呵，中國真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三月三十日）

現代史

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直到現在，凡我所曾經到過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見有『變把戲』的，也叫作『變戲法』的。

這變戲法的，大概只有兩種——

一種，是教一個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槍；騎了羊跑幾圈。還有一匹用稀粥養活，已經瘦得皮包骨頭的狗熊玩一些把戲。末後是向大家要錢。

一種，是將一塊石頭放在空盒子裏，用手巾左蓋右蓋，變出一隻白鴿來；還有將紙塞在嘴巴裏，點上火，從嘴角鼻孔裏冒出烟燄。其次是向大家要錢。要了錢之後，一個人嫌少，裝腔作勢的不肯變了，一個人來勸他，對大家說再五個。果然有人拋錢了，於是再四個，三

個……

拋足之後，戲法就又開了場。這回是將一個孩子裝進小口的鑊子裏面去，只見一條小辮子，要他再出來，又要錢。收足之後，不知怎麼一來，大人用尖刀將孩子刺死了，蓋上被單，直挺挺躺着，要他活過來，又要錢。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uazaa!』變戲法的裝出撒錢的手勢，嚴肅而悲哀的說。

別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細的看，他是要罵的；再不聽，他就會打。

果然有許多人Huazaa了。待到數目和預料的差不多，他們就檢起錢來，收拾傢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來，一同走掉了。

看客們也就跌頭跌腦的走散。

這空地上，暫時是沈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過沉寂的幾日。

我的話說完了，意思也淺得很，不過說大家 Huzaa Huzaa 一通之後，又要靜幾天了，然後再來這一套。

到這里我才記得寫錯了題目，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東西。

(四月一日。)

推背圖

我這裏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說：從反面來推測未來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談裏，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為得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先前一定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本草家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字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間有一個笑話：某甲將銀子三十兩埋在地裏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豎一塊木板，寫道：『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的阿二因此卻將這掘去了，也怕人發覺，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會偷。』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們日日所見的文章，卻不能這麼簡單。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

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這樣，竟這樣的。難就在這地方。

例如近幾天報章上記載着的要聞罷：

- 一、××軍在××血戰，殺敵×××人。
- 二、××談話：決不與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 三、芳澤來華，據云係私人事件。
- 四、共黨聯日，該偽中央已派幹部××赴日接洽。
- 五、×××××：

倘使都當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駭人了。但報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餘隻大火，』『××××廉價只有四天了』等大概無須『推背』的記載，于是乎我們就又胡塗起來。

聽說，推背圖本是靈驗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裏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實證明之後，人們這才恍然大悟。

我們也只好等着看事實，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總出不了今年。

(四月二日。)

『殺錯了人』異議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殺錯了人，覺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覺得有些還不免是憤激之談了，所以想提出幾句異議——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斗，從『國民公僕』變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裏，連飯店客棧中，都滿佈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

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着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爲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這事情，一轉眼竟已經是二十年，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那時還在吸奶，時光是多麼飛快呵。

但是，袁世凱自己要做皇帝，爲什麼留下他真正對頭的舊皇帝呢？這無須多議論，只要看現在的軍閥混戰就知道。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只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爲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爲我們看錯了人。

臨末，對於『多殺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張，我也有一點異議，但因爲自己早在『中

年以上』了，爲避免嫌疑起見，只將眼睛看着地面罷。

（四月十日。）

記得原稿在『客客氣氣的』之下，尙有『說不定在出洋的時候，還要大開歡送會』這類意思的句子，後被刪去了。

（四月十二日記。）

【備考】

殺錯了人

曹聚仁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爲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嘆息道：『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制紊亂之害，咸以積重難返，諉爲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卽畢乃事？』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爲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于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會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復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

難返，誘爲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斲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中國人的生命圈

『螻蟻尙知貪生，』中國百姓向來自稱『蟻民，』我爲暫時保全自己的生命計，時常留心着比較安全的處所，除英雄豪傑之外，想必不至于譏笑我的罷。

不過，我對於正面的記載，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種另外的看法。例如罷，報上說，北平正在設備防空，我見了並不覺得可靠；但一看見載着古物的南運，卻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機，並且由這古物的行蹤，推測中國樂土的所在。

現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來了，可見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上。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貴起來的了。

這在『蟻民』也是一個大打擊，所以還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想來想去，想到了一個『生命圈』。這就是說，既非『腹地』也非『邊疆』是介乎兩者之間，正如一個環子，一個圈子的所在，在這裡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於×世』的。

『邊疆』上是飛機拋炸彈。據日本報，說是在勦滅『兵匪』；據中國報，說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礫。『腹地』裏也是飛機拋炸彈。據上海報，說是在勦滅『共匪』，他們被炸得一場胡塗；『共匪』的報上怎麼說呢，我們可不知道。但總而言之，邊疆上是炸，炸，炸；腹地裏也是炸，炸，炸。雖然一面是別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則一。只有在這兩者之間的，只要炸彈不要誤行落下來，倒還有可免『血肉橫飛』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國人的生命圈』。

再從外面炸進來，這『生命圈』便收縮而為『生命線』；再炸進來，大家便都逃進那炸好了的『腹地』裏面去，這『生命圈』便完結而為生命○。

其實，這預感是大家都有的，只要看這一年來，文章上不大見有『我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套話了，便是一個證據。而有一位先生，還在演說上自己說中國人是『弱

小民族』哩。

但這一番話，闊人們是不以為然的，因為他們不但有飛機，還有他們的『外國！』

（四月十日。）

內 外

古人說內外有別，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賤內』。傷兵在醫院之內，而慰勞品在醫院之外，非經查明，不准接收。對外要安，對內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先生歎氣：『當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內外不同的。

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兩害取其輕也。所以，外面的身體要牠死，而內心要牠活；或者正因為那心活，所以把身體治死。此之謂治心。

○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過于活。

○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結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鎮靜。心過于活了，就胡思亂想，當真要鬧抵抗：這種人，『絕對不能言抗日。』

○ 爲要鎮靜大家，心死的應該出洋，留學是到外國去治心的方法。

○ 而心過于活的，是有罪，應該嚴厲處置，這才是在國內治心的方法。

○ 何香凝先生以爲『誰爲罪犯是很成問題的，』——這就因爲她不懂得內外有別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透底

凡事澈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見得高明。因為連續的向左轉，結果碰見了向右轉的朋友，那時候彼此點頭會意，臉上會耍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復辟的自由，或者屠殺大眾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卻連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來只剩得一個無底洞。

譬如反對八股是極應該的。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甚麼代聖賢立言，甚麼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的八股，無論新

舊，都應當掃蕩。但是，這是爲着要聰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過要保存蠢笨的人，卻有一種策略。他們說：『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樣。』——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後，舊的蠢笨的『我』卻總是偷偷地又站起來，實惠是屬於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說：『他們都像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活人，統統打倒；回來，偶像會贊賞一番，說打倒偶像而打倒『打倒』者，確是透底之至。其實，這時候更大的蠢笨，籠罩了全世界。

開口詩云子曰，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達爾文說，蒲力汗諾夫曰』也算做新八股。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圓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環遊地球一週；要製造汽機的，也要先坐在開水壺前格物……這自然透底之極。其實，從前反對衛道文學，原是說那樣喫人的『道』不應該衛，而有人要透底，就說什麼道也不衛；這『什麼道也不衛』難道不也是一種『道』麼？所以，真正最透底的，還是下列的一個故事：

古時候一個國度裏革命了，舊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來。旁人說：『你這革命黨，原先是反對有政府主義的，怎麼自己又來做政府？』那革命黨立刻拔出劍來，割下了自己

的頭；但是，他的身體並不倒，而變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裏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說：這主義的實現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後呢。

（四月十一日。）

【來信】

家幹先生：

昨閱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發表論新八股之處，至為欣幸。惟所『譬』云云，實出誤會。鄙意所謂新八股者，係指有一等文，本無充實內容，祇有時髦幌子，或利用新時裝包裹舊皮囊而言。因為是換湯不換藥，所以『這個空虛的宇宙』仍與『且夫天地之間』同為八股。因為是掛羊頭賣狗肉，所以『達爾文說』、『蒲力汗諾夫說』仍與『子曰詩云』毫無二致。故攻擊不在『達爾文說』、『蒲力汗諾夫說』與『這個宇宙』本身（其實『子曰』、『詩云』如做起一本中國文學史來，仍舊要引用，斷無所謂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

成爲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舉『地球』『機器』之例。『透底』『衛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覺曲解。

今日文壇，雖有蓬勃新氣，然一切狐鼠魍魎，仍有改頭換面，衣錦逍遙，如禮拜六、禮拜五派等以舊貨新裝出現者，此種新皮毛舊骨髓之新八股，未審先生是否認爲應在掃除之列？

又有借時代招牌，歪曲革命學說，口唸阿彌，心存罔想者，此種借他人邊幅，蓋自己臭腳之新八股，未審先生是否認爲應在掃除之列？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實質上固知大有區別，但仍有今之主席與古之皇帝一模一樣者，則在某一意義上非難主席，其意自明，苟非志在捉虱，未必不能兩目了然也。

予生也晚，不學無術，但雖無『澈底』之聰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誤會耳。尙望賜教到『底』，感『透』感『透』！

祝秀俠上。

【回信】

秀俠先生：

接到你的來信，知道你所謂新八股是禮拜五六派等流。其實禮拜五六派的病根並不全在他們的八股性。

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我是已經說過了；禮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餘的人也會有新八股性。例如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會弄得讀者疑心你空虛，疑心你已經不能答辯，只剩得『國罵』了。

至於『歪曲革命學說』的人，用些『蒲力汗諾夫曰』等來掩蓋自己的臭腳，那他們的錯誤難道就在他寫了『蒲……曰』等等麼？我們要具體的證明這些人是怎樣錯誤，為什麼錯誤。假使簡單地把『蒲力汗諾夫曰』等等和『詩

云子曰』等量齊觀起來，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誤會。先生來信似乎也承認這一點。這就是我那『透底』裏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最後，我那篇文章是反對一種虛無主義的一般傾向的，你的論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過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這是必須解除的一個『誤會。』而那文章卻並不是專為這一個例子寫的。

家 幹。

『以夷制夷』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這是中國祖傳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彷彿有些像的，但是，其實不然。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的確將國聯看作『青天大老爺』，心裏何嘗還有一點兒『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爺』們卻常常用着『以華制華』的方法的。

例如罷，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犯人』，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只是鬆鬆爽爽的送給華人，叫你自己去殺去。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們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

孫的巡捕和西崽，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

我們自誇了許多日子的「大刀隊」，好像是無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報上，有一個用頭號字印我斬敵二百的題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覺得勝利的，但我們再來看一看本文罷——

「（本報今日北平電）昨日喜峯口右翼，仍在灤陽城以東各地，演爭奪戰。敵出現大刀隊千名，係新開到者，與我大刀隊對抗。其刀特長，敵使用不靈活。我軍揮刀砍殺，敵招架不及，連刀帶臂，被我砍落者縱橫滿地，我軍傷亡亦達二百餘……」

那麼，這其實是「敵斬我軍二百」了，中國的文字，真是像「國步」一樣，正在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但我要指出來的卻並不在此。

我要指出來的是「大刀隊」乃中國人自誇已久的特長，日本人雖有擊劍，大刀卻非素習。現在可是「出現」了，這不必遲疑，就可決定是滿洲的軍隊。滿洲從明末以來，每年即大有直隸、山東人遷居，數代之後，成為土著，則雖是滿洲軍隊，而大多數實為華人也。

決無疑義。現在已經各用了特長的大刀，在灤東相殺起來，一面是『連刀帶臂，縱橫滿地』，一面是『傷亡亦達二百餘』，開演了極顯著的『以華制華』的一幕了。

至於中國的所謂手段，由我看來，有是也應該說有的，但決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華』。然而『夷』又那有這麼愚笨呢，卻先來一套『以華制華』給你看。

這例子常見於中國的歷史上，後來的史官爲新朝作頌，稱此輩的行爲曰：『爲王前驅！』

近來的戰報是極可詫異的，如同日同報記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後，冷口方面之戰，非常激烈，華軍……頑強抵抗，故繼續未曾有之大激戰，』但由宮崎部隊以十餘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後繼，『卒越過長城，因此宮崎部隊犧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過一個險要，而日軍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稱爲『未曾有之大激戰』，也未免有些費解。所以大刀隊之戰，也許並不如我所猜測。但既經寫出，就姑且留下以備一說罷。

(四月十七日。)

【跳跟】

『以華制華』

李家作

報紙不可不看。在報上不但可以看到虔修功德如唸唸阿彌陀佛，選拔國士如徵求飛簷走壁之類的『善』文，還可以隨時長許多見識。譬如說殺人，以前只知道有斫頭絞頸子，現在卻知道還有吃人肉，而且還有『以夷制夷』、『以華制華』等等的分別。經明眼人一說，是越想越覺得不錯的。

尤其是『以華制華』那樣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覺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華對華並不會親熱；而且爲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當然非解決別人不可。所以那『制』是，無論如何要『制』的。假如因爲制人而能得到好處，或是因爲制人而能討得上頭的歡心，那自然更其起勁。這心理，夷人就善於利用，從侵略土地到賣賣肥皂，都是用的這『華人』善於『制華』的美點。然而，華人對華人，其實也很會利用這種方法，而且非常巧妙。雙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

得其所；旁人看來，不露痕蹟，據說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吧狗，即走狗。但細細甄別起來，倒並不祇是哈吧狗一種，另外還有一種是警犬。

做哈叭狗與做警犬，當然都是『以華制華』，但其中也不無分別。哈叭狗只能聽主人吩咐，向仇人搖搖尾，狂吠幾聲。他知道他是什麼樣的身分。警犬則不然：老於世故者往往如此。他只認定自己是一個好漢，是一個權威，是一個執大義以繩天下者。在那門庭間的方寸之地，祇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吶喊吶喊。他的威風沒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較起來，哈吧狗真是淺薄得可憐。但何以也是『以華制華』呢？那是因為雖然老於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綻。破綻是他儼若嫉惡如仇，平時蹲在地上冷眼旁觀，一看到有類乎『可殺』的情形時，就躡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決不是亂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當然不能不有一個寄身的地方，他決不傷害，有了也祇當不看見，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頭的，尤其是，圈子外頭最礙眼的仇人。這便是勇，這便是執大義，同時，既可顯出自己的權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歡心：因為，他所

咬的，往往會是他和他東家的共同的敵人。主人對於他所痛恨，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給你一些供養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連三的奮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機會。旁觀者不免有點不明白，覺得這仇太深，卻不知道這正是老於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謂向惡社會『搏戰』『周旋』是也。那樣的用心，真是很苦！

所可哀者，爲了要掙扎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員外府君之類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莊院的門樓邊，暫且作個『江湖一應水碗不得騷擾』的招貼紙兒。也可見得做中國人的不容易，和『以華制華』的效勞，雖賢者亦不免焉。

——三，四，二一。

（四月二十二日，大晚報副刊火炬。）

【搖擺】

過而能改

傅紅藜

孔老夫子，在從前教訓着那麼許多門生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是錯誤人人都有，只要能夠回頭。我覺得孔老夫子這句話尚有未盡意處，譬如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之後，再加上一句：『知過不改，罪孽深重，』那便覺得天衣無縫了。

譬如說現在前線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而有人覺得這種爲國犧牲是殘酷，是無聊，便主張不要打，而且更主張不要講和，只說索性藏起頭來，等個五十年。俗諺常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看起來五十年的教訓，大概什麼都够了。凡事有了錯誤，才有教訓，可見中國人尙還有些救藥，國事弄得烏烟瘴氣到如此，居然大家都恍然大悟自己內部組織的三大不健全，更而發現武器的不充足。眼前須要幾十年頭，來作準備。言至此，吾人對於熱河一直到灤東的失守，似乎應當有些感到失得不大冤枉。因爲吾黨（借用）建基以至於今日，由軍事而至於憲政，尙還沒有人肯認過錯，則現在失掉幾個國土，使一些負有自

信天才的國家棟梁學貫中西的名儒，居然都肯認錯，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塞翁失馬，又安知非福的聊以自慰，也只得閉着眼睛喊兩聲了，不過假使今後『知過尙不能改，罪孽的深重』比寫在訃文上，大概也更來得使人注目了。

譬如再說，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華制華』裏說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觀，等到有可殺的時候，便一躍上前，猛咬一口，不過有的時候那警犬被人們提起棍子，向着當頭一棒，也會把專門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頭來，伸出舌頭在暗地裏發急。這種發急，大概便又是所謂『過』了。因為警犬雖然野性，但有時被棍子當頭一擊，也會被打出自己的錯誤來的，於是『過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裏發急時，自又便會想懺悔，假使是不大曉得改過的警犬，在暗地發急之餘，還想乘機再試，這種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國人只曉得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記了底下那一句。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報副刊火炬。）

【只要幾句】

案語

家 幹

以上兩篇，是一星期之內，登在大晚報附刊火炬上的文章，爲了我的那篇『以夷制夷』而發的，揭開了『以華制華』的黑幕，他們竟有如此的深惡痛嫉，莫非真是太傷了此輩的心麼？

但是，不盡然的。大半倒因爲我引以爲例的××報，其實是大晚報，所以使他們有這樣的跳跟和搖擺。然而無論怎樣的跳跟和搖擺，所引的記事具在，舊的大晚報也具在，終究掙不脫這一個本已扣得緊緊的籠頭。

此外也無須多話了，只要轉載了這兩篇，就已經由他們自己十足的說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們真實的嘴臉。

（七月十九日。）

言論自由的界限

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

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

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於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於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

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牠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誌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學士的團體，這時也就來了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迹的『離騷經』。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祕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爲文藝的文藝』了。

這就是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在究竟比乾隆時候光明：三民主義。

然而竟還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論自由。世界上沒有這許多甜頭，我想，該是明白的罷，這誤解，大約是在沒有悟到現在的言論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寬宏大度的說些『老爺，你的衣服……』爲限，而還想說開去。

這是斷乎不行的。前一種，是和新月受難時代不同，現在好像已有的了，這自由談也就是一個證據，雖然有時還有幾位拿着馬糞，前來探頭探腦的英雄。至於想說開去，那就足以破壞言論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

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這我是親眼見過好幾回的，非「賣老」也，不自覺其做奴才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鑒焉。

（四月十七日。）

世造英雄（說『美人』要妥當些，）還是美人兒多年閱歷的結果？

美人兒而說『多年』自然是閱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從窰姐兒升任了老鴇婆；然而她丰韻猶存，雖在賣人，還兼自賣。自賣容易，而賣人就難些。現在不但有手無寸鐵的人，而且有了……況且又遇見了太露骨的強姦。要會應付這種非常之變，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現在的壓軸戲是要似戰似和，又戰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這是多麼難做的戲。沒有半推半就假作嬌癡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說，『以天下與人易。』其實，能够簡單地雙手捧着『天下』去『與人』倒也不爲難了。問題就在於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聲浪氣的訴苦說：我不入火坑，誰入火坑。

然而娼妓說她自己落在火坑裏，還是想人家去救她出來；而老鴇婆哭火坑，卻未必有人相信她，何況她已經申明：她是敞開了懷抱，準備把一切都拖進火坑的。雖然，這新鮮壓軸戲的玩笑卻開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進場，玩笑且出場，大觀園的人才着實不少！

（四月二十四日）

文章與題目

一個題目，做來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樣，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幫閒的敲邊鼓，給人們聽慣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來最主要的題目，是安內與攘外罷，做的也着實不少了。有說安內必先攘外的，有說安內同時攘外的，有說不攘外無以安內的，有說攘外即所以安內的，有說安內即所以攘外的，有說安內急於攘外的。

做到這里，文章似乎已經無可翻騰了，看起來，大約總可以算是做到了絕頂。

所以再要出新花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用現在最流行的諛法來說，就是大有

『漢奸』的嫌疑。爲什麼呢？就因爲新花樣的文章，只剩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了。

這三種意思，做起文章來，雖然實在希奇，但事實卻有的，而且不必遠徵晉、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滿洲人早在窺伺了，國內卻是草菅民命，殺戮清流，做了第一種。李自成進北京了，關人們不甘給奴子做皇帝，索性請『大清兵』來打掉他，做了第二種。至於第三種，我沒有看過清史，不得而知，但據老例，則應說是愛新覺羅氏之先，原是軒轅黃帝第幾子之苗裔，遯於朔方，厚澤深仁，遂有天下，總而言之，咱們原是一家子云。

後來的史論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現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這是後來和現在的話，當時可不然，鷹犬塞塗，乾兒當道，魏忠賢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廟麼？他們那種辦法，那時都有人來說得頭頭是道的。

前清末年，滿人出死力以鎮壓革命，有『寧贈友邦，不給家奴』的口號，漢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齒。其實漢人何嘗不如此？吳三桂之請清兵入關，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實例了……

目 題 與 章 文

附記：

原題是安內與攘外

(四月二十九日。)

(五月五日。)

新藥

說起來就記得，誠然，自從九一八以後，再沒有聽到吳稚老的妙語了，相傳是生了病。現在剛從南昌專電中，飛出一點聲音來，卻連改頭換面的，也是自從九一八以後，就再沒有一絲聲息的民族主義文學者們，也來加以冷冷的訕笑。

爲什麼呢？爲了九一八。

想起來就記得，吳稚老的筆和舌，是盡過很大的任務的，清末的時候，五四的時候，北伐的時候，清黨的時候，清黨以後的還是鬧不清白的時候。然而他現在一開口，卻連躲躲閃閃的人物兒也來冷笑了。九一八以來的飛機，真也炸着了這黨國的元老吳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閃閃的人物兒的小膽子。

九一八以後，情形就有這麼不同了。

舊書裏有過這麼一個寓言，某朝某帝的時候，宮女們多數生了病，總是醫不好。最後來了一個名醫，開出神方道：壯漢若干名。皇帝沒有法，只得照他辦。若干天之後，自去察看時，宮女們果然個個神采煥發了，卻另有許多瘦得不像人樣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喫了一驚，問這是什麼呢？宮女們就囁嚅的答道：是藥渣。

照前幾天報上的情形看起來，吳先生彷彿就如藥渣一樣，也許連狗子都要加以踐踏了。然而他是聰明的，又很恬淡，決不至於不顧自己，給人家熬盡了汁水。不過因爲九一八以後，情形已經不同，要有一種新藥出賣是真的，對於他的冷笑，其實也就是新藥的作用。

這種新藥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則須先講烈士的殉國，再敘美人的殉情；一面贊希特勒的組閣，一面頌蘇聯的成功；軍歌唱後，來了戀歌；道德談完，就講妓院；因國恥日而悲楊柳，逢五一節而憶薔薇；攻擊主人的敵手，也似乎不滿於他自己的主人……總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單方，此後出賣的卻是複藥了。

複藥雖然好像萬應，但也常無一效的，醫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過對於誤服這藥的病人，卻能够使他不再尋求良藥，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裏胡塗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多難之月』

前月底的報章上，多說五月是『多難之月』。這名目，以前是沒有見過的。現在這『多難之月』已經臨頭了。從經過了的日子來想一想，不錯，五一『勞動節』可以說很有些『多難』；五三是濟南慘案紀念日，也當然屬於『多難』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揚，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的佳日，爲什麼都包括在『難』字堆裏的呢？這可真有點兒希奇古怪！

不過只要將這『難』字，不作國民『受難』的『難』字解，而作令人『爲難』的『難』字解，則一切困難，可就渙然冰釋了。

時勢也真改變得飛快，古之佳節，後來自不免化爲難關。先前的開會，是聽大衆在空

地上開的，現在卻要防人『乘機搗亂』了，所以只得函請代表，齊集洋樓，還要由軍警維持秩序。先前的要人，雖然出來要『清道』（俗名『淨街』）但還是走在地上的，現在卻更要防人『謀爲不軌』了，必得坐着飛機，須到出洋的時候，纔能放心送給朋友。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現在卻『微服』『微服』的嚷得人耳聾，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廟，比較的免掉大驚小怪。總而言之，可靠的國之柱石，已經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樓峻嶺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實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難分，一有慶弔，總不免『假名滋擾』。向來雖靠『華洋兩方當局，先事嚴防』，沒有鬧過什麼大亂子，然而總比平時費力的，這就令人爲難，而五月也成了『多難之月』，紀念的是好是壞，日子的爲戚爲喜，都不在話下。

但願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來；但願中國裏慘案不要再有；但願也不再有什麼政府成立；但願也不再有什麼偉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則，日積月累，不久就會成個『多難之年』，不但華洋當局，老是爲難，連我們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遠身帶『嫌疑』，奉陪戒嚴，嗚呼哀哉，不能喘氣了。

（五月五日。）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新近報上說，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車。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報效坦克捐。我倒記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個自稱姓『張』的說過，『我是擁護言論不自由者……唯其言論不自由，纔有好文章做出來，所謂冷嘲、諷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負言論責任的文體，在壓迫鉗制之下，都應運產生出來了。』這所謂不負責任的文體，不知道比坦克車怎樣？

諷刺等類爲什麼是不負責任，我可不知道。而聽人議論『風涼話』怎樣不行，『冷箭』怎麼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罵人不敢充好漢，膽小。其實，躲在厚厚的鐵板——坦克車裏面，砰砰碰碰的轟炸，是着實痛快得多，雖然也

似乎並不膽大。

高等人向來就善于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面來殺人的。古時候有厚厚的城牆，爲的要防備盜匪和流寇。現在就有鋼馬甲、鐵甲車、坦克車。就是保障『民國』和私產的法律，也總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臉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禮的。

獨有下等人要這麼自衛一下，就要受到『不負責任』等類的嘲笑：

『你敢出來出來！躲在背後說風涼話不算好漢！』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當，真的赤膊奔上前陣，像許褚似的充好漢，那他那邊立刻就開給你一槍，老實不客氣，然後，再學着金聖嘆批三國演義的筆法，罵一聲『誰叫你赤膊的』——活該。總之，死活都有罪。足見做人實在很難，而做坦克車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盛氏的祖宗積德很厚，他們的子孫就舉行了兩次『收復失地』的盛典：一次還是在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治下，一次就在當今國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時候，說盛宣懷是第一名的賣國賊，將他的家產沒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後，就發還了。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袁世凱是『物傷其類』，他自己也是賣國賊。不是年年都在紀念五七和五九麼？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憑實據的。

最近又在報上發見這麼一段消息，大致是說：『盛氏家產早已奉命歸還，如蘇州之留園，江陰、無錫之典當等，正在辦理發還手續。』這卻叫我喫了一驚。打聽起來，說是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初到滬寧的時候，又沒收了一次盛氏家產：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

豪劣紳，」紳而至于「劣，」再加上賣國的舊罪，自然又該沒收了。可是爲什麼又發還了呢？

第一，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爲並無真憑實據——現在的人早就誓不簽訂辱國條約，他們不比盛宣懷和袁世凱。第二，現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見政府財政並不寬裕。那麼，爲什麼呢？

學理上研究的結果是——壓迫本來有兩種：一種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還高利貸，交田租之類；這壓迫的「理」寫在布告上：「借債還錢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納稅乃千古不易之成規。」無理的，就是沒收盛宣懷的家產等等的；這種「壓迫」鉅紳的手法，在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

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告工友書上說：「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一喫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鬭爭麼？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樣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說：「必須克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之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之一切糾紛。」還有說「中國工人沒有外國工人那麼苦」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沒有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天下的事情總是有道理的，一切壓迫也是如此。何況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總不會沒有的。

（五月六日。）

王 化

中國的王化現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了。

溥儀的弟媳婦跟着一位廚司務，捲了三萬多元逃走了。於是中國的法庭把她緝獲歸案，判定『交還夫家管束』。滿洲國雖然『偽』，夫權是不『偽』的。

新疆的回民鬧亂子，於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離失所了，於是特別組織蒙古王公救濟委員會。

對於西藏的懷柔，是請班禪喇嘛誦經念咒。

而最寬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廣西對付獠民的辦法。據大晚報載，這種『寬仁政策』是在三萬獠民之中殺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飛機到獠洞裏去『下蛋』，使他們『驚詫爲

天神天將而不戰自降。』事後，還要挑選獠民代表到外埠來觀光，叫他們看看上國的文化，例如馬路上，紅頭阿三的威武之類。

而紅頭阿三說的是：勿要嘩啦嘩啦！

這些久已歸化的『夷狄』近來總是『嘩啦嘩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時候，『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這原是當然的道理。

不過我們還是東奔西走，南征北勦，決不偷懶。雖然勞苦些，但『精神上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等到『偽』滿的夫權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濟了，喇嘛的經咒唸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獠民『不戰自降』了，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遠人』的旧本了。這時候，我們印度阿三式的責任算是盡到了。

嗚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逃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

（五月七日。）

這篇被新聞檢查處抽掉了，沒有登出。幸而既非獠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國貨

的飛機來『下蛋』然而『勿要嘩啦嘩啦』卻是一律的，所以連『歡呼』也不許，——然則惟有一聲不響，裝死救國而已！

(十五夜記)

天上地下

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燬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

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

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

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于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

文章。

住在租界裏的人們是有福的。但試閉目一想，想得廣大一些，就會覺得內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敵軍在天上，沒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損害正詳查中』而太平之區，卻造起了寶塔。釋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此之謂也。

但又試閉目一想，想得久遠一些，可就遇着難題目了。假如炸進去慢，炸進來快，兩種飛機遇着了，又怎麼辦呢？停止了『安內』，回轉頭來『迎頭痛擊』呢，還是仍然祇管自己炸進去，一任他跟着炸進來，一前一後，同炸『匪區』，待到炸清了，然後再『攘』他們出去呢……

不過這只是講笑話，事實是決不會弄到這地步的。即使弄到這地步，也沒有什麼難解決：外洋養病，名山拜佛，這就完結了。

（五月十六日。）

記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養病，背脊生瘡，名山上拜佛，小便裏有糖，這

天 上 地 下

就完結了。』

（十九夜補記。）

保 留

這幾天的報章告訴我們：新任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的專車一到天津，卽有十七歲的青年劉庚生擲一炸彈，犯人當場捕獲，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綁赴新站外梟首示衆云。

清朝的變成民國，雖然已經二十二年，但憲法草案的民族民權兩篇，日前這纔草成，尙未頒布。上月杭州曾將西湖搶犯當衆斬決，據說奔往賞鑑者有『萬人空巷』之概。可見這雖與『民權篇』第一項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卻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項的『發揚民族精神』。南北統一，業已八年，天津也來掛一顆小小的頭顱，以示全國一致，原也不必大驚小怪的。

其次，是中國雖說『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電，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題字之外，總有許多『童子愛國』、『佳人從軍』的美談，使壯年男兒索然無色。我們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到得老年，纔又脫盡暮氣，據訃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則十七歲的少年而來投擲炸彈，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這一節，因爲這就是所謂賣國。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大衆公認爲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後來依然逍遙自在。至于少年和兒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稚弱的心力和體力，攜着竹筒或撲滿，奔走于風沙泥濘中，想于中國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數了。雖然因爲他們無先見之明，這些用汗血求來的金錢，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愛國之心是真誠的，賣國的事是向來沒有的。

不料這一次卻破例了，但我希望我們將加給他的罪名暫時保留，再來看一看事實，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掛着的頭顱還未爛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誰是賣國者。

從我們的兒童和少年的頭顱上，洗去噴來的狗血罷！

（五月十七日。）

這一篇和以後的三篇，都沒有能夠登出。

（七月十九日。）

再談保留

因為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里——

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裏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Q』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爲主任，靠俄款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爭了。這雖然是

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偽』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將為讀者所不滿。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面，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並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

幸而還好，報上果然只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日既非敵，漢何云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頭來，掛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報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經過敏，豫先改稱為『上國』

留 保 談 再

或『天機』的。

(五月十七日。)

『有名無實』的反駁

新近的戰區見聞記有這麼一段記載：

『記者適遇一排長，甫由前線調防於此，彼云，我軍前在石門寨、海陽鎮、秦皇島、牛頭關、柳江等處所做陣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萬元，木材重價尙不在內……艱難締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傳出，卽行後退，血汗金錢所合併成立之陣地，多未重用，棄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峯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不幸生爲中國人！尤不幸生爲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五月十七日申報特約通信。）

這排長的天真，正好證明未經『教訓』的愚劣人民，不足與言政治。第一，他以爲不

抵抗將軍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台，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為化了三四十萬大洋建築了防禦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總算還好，他沒有想到進攻。）這是不懂策略：防禦工程原是建築給老百姓看看的，並不是教你死守的陣地，真正的策略卻是『誘敵深入』。第三，他雖然奉令後退，卻敢于『痛心』。這是不懂哲學：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額手稱慶』實在高興得太快了。這是不懂命理：中國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癡呆的排長，難怪他連叫兩個『不幸』，居然自己承認『是有名無實的抗日軍人』。其實究竟是誰『有名無實』，他是始終沒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長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說，他們只會『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弟兄，處於今日局勢，若非對外，鮮有不譁變者』（同上通信。）這還成話麼？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以前我總不大懂得這是什麼意思：既然連敵國都沒有了，我們的國還會亡給誰呢？現在照這兵士的話就明白了，國是可以亡給『譁變者』的。

結論：要不亡國，必須多找些『敵國外患』來，更必須多多『教訓』那些痛心的愚

劣人民，使他們變成「有名有實。」

（五月十八日。）

不求甚解

文章一定要有註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學家自己做的文章還要自己來註釋，覺得很麻煩。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們有的是祕書，或是私淑弟子，替他們來做註釋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種文章，卻是註釋不得的。

譬如說，世界第一要人美國總統發表了『和平』宣言，據說是要禁止各國軍隊越出國境。但是，註釋家立刻就說：『至於美國之駐兵於中國，則為條約所許，故不在羅斯福總統所提議之禁止內』（十六日路透社華盛頓電。）再看羅氏的原文：『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及重行莊嚴聲明其限及減少軍備之義務，並在簽約各國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國境。』要是認

真註解起來，這其實是說：凡是不『確切』不『莊嚴』並不『自己承允』的國家，儘可以派遣任何性質的軍隊越出國境。至少，中國人且慢高興，照這樣解釋，日本軍隊的越出國境，理由還是十足的；何況連美國自己駐在中國的軍隊，也早已聲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這種認真的註釋是叫人掃興的。

再則，像『誓不簽訂辱國條約』一句經文，也早已有了不少傳註。傳曰：『對日妥協，現在無人敢言，亦無人敢行。』這裏，主要的是一個『敢』字。但是：簽訂條約有敢與不敢的分別，這是拿筆桿的人的事，而拿鎗桿的人卻用不着研究敢與不敢的爲難問題——縮短防線，誘敵深入之類的策略是用不着簽訂的。就是拿筆桿的人也不至于只會簽字，假使這樣，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說，謂之『一面交涉』。于是乎註疏就來了：『以不承認爲責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頭交涉……清算無益之抗日。』這是日本電通社的消息。這種洩漏天機的註解也是十分討厭的，因此，這不會不是日本人的『造謠』。

總之，這類文章渾沌一體，最妙是不用註解，尤其是那種使人掃興或討厭的註解。

『解』者，就是不去看註解，而只讀本文的意思。註解雖有，確有人不願意我們去看的。

小時候讀書講到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先生就給我講了，他說：『不求甚

（五月十八日。）

後 記

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裏已經說過了。到這里，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讎，是因為我引用了牠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牠前生有讎，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着這樣的一段——

『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復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

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姦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姦十餘次，當派探員將楊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係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姦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纔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姦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云。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姦，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係被告將我喚去，並着我不可對父母說知云。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爲叔，縱欲姦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係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尙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裏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爲『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爲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

號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乾叔姦姪女

女自稱被姦過十餘次

男指係遊玩並非風流』

牠在『叔』上添一『乾』字，於是『女』就化爲『姪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准『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只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麼『員外』什麼『警犬』的狂嘍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羣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裏是很難得的。但這祕密，在這裡不再研究牠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但手段巧妙得遠了，牠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只驅使着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牠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生）上看來的——

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

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砲，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吶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爲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歷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

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爲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爲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衆，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復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只要看陳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

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揣揣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爲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啓其端。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爲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爲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裏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爲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

〔微知〕

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爲『守舊文化的堡壘』的

動搖惋惜——

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

水手

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歷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闆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闆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是兩個守舊文化

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闆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

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係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

亦什九係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係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云。

〔逸〕

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

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羣衆，取得滿意的收穫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嘗試，想復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

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衆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

〔農〕

這些記載，于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卻在文壇進行曲裏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介紹，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于私怨之有無，是不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爲巧妙：要只用寥寥十六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爲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爲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爲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游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

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啓事——

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籥，既有所不忍，佈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

編者

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羣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裏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

曹聚仁等爲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爲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谷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峯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闆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爲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伙計當然屈伏於老闆，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復見於近日矣。

（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大家多猜測爲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麼信，只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局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爲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只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蘆蘆絮語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

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

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鶩，遽蘆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牠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牠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

法 魯

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里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裏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面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面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稜角，摸着正面，卻要把牠當做反面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兒『要自由』，一回兒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覆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裏，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虫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嚙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嘗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効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

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只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裏，還描出左翼作家的儒怯來——

左翼作家紛紛離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麼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闢老消夏之區，神往尙且不敢，而況身遊。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聽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教授傳道的聖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確的。否則，一羣流氓，幾枝手鎗，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着另一種消息——

自由的風月

頤 石

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祇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卽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復」者，卽陳子展，「何如」者，卽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塗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種『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爲『頑石』，靈氣之不鍾于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爲『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案。

自由談上原登着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轟傳爲『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復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只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裏有一篇文章，據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

張資平擠出『自由談』

粹 公

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爲而爲的地盤，是『烏鴉』『阿Q』的播音台，當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爲什麼那個色慾狂的『迷羊』——郁達夫卻能例外？他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於創造嗎？一樣唱着『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例外。因爲郁達夫雖則是個色慾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與今日自由談的後台老板魯（？）老夫子是同志，成爲『烏鴉』『阿Q』的伙伴了。

據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於時代與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種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闆，固然可以不惜幾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籠，但在靠賣文爲活的張資平，卻比宣佈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氣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爲了要復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於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谷、章衣萍等爲『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

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着，致觸了這個大霉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後，以常情論，誰都嚥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關係是著名的，他爲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鬪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鬪爭，於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紅蘿蔔鬚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摩團，將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的『解放詞』據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

曾今可準備反攻

曾今可之爲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於如願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衆，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禦，因亦着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爲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

〔如〕

那時我想，關於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文第十五篇）裏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爲『侮辱』罷；胡懷琛雖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爲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麼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

文藝座談遙領記

棗 仁

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機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不曾與座談而遙領盛情之經過也。

解題既畢，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課，休息室的檯子上赫然一個請帖；展而恭讀之，則新時代月刊之請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請帖！摺而藏之，以爲傳家之寶。

新時代請客而文藝座談生焉，而反攻之陣線成焉。報章煌煌記載，有名將在焉。我前天碰到張鳳老師，帶便問一個口訊；他說：『誰知道什麼座談不座談呢？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起人啦。』昨天遇到龍榆生先生，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我說：『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於被強奸，遙領盛情，誌此謝謝！

但這『文藝漫談會』的機關雜誌文藝座談第一期，卻已經羅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專爲我而作的——

內山書店小坐記

白羽選

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卻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祕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着書報。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閒談。因為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卻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懷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髮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聽了並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

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裏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麼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幹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幹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強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麼話，不想理他。因為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麼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後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不到一禮拜（七月六日），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就加以應援，並且廓大到『左聯』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該寫作『魯迅』的故意的錯誤，爲的是令人不疑爲出于同一人的手筆——

內山書店與左聯

文藝座談第一期上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確屬的，而尤其與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誌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而此類材料之獲得，半由受過救命之恩之共黨文藝份子所供給；半由共黨自行送去，為張揚勢力之用，而無聊文人為其收買甘願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聞此種偵探機關，除內山以外，尚有日日新聞社、滿鐵調查所等，而著名偵探除內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島、中村等。

〔新說〕

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種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衊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據書本的，現在卻可

以從別人的嘴裏聽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于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但也有人來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談上，竟揭載了這樣的一篇文章——

談『文人無行』

谷春帆

雖說自己也忝列於所謂『文人』之『林』，但近來對於『文人無行』這句話，卻頗表示幾分同意，而對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視爲『道學先生』的偏激之言。實在，今日『人心』險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謂『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種種卑劣行爲如陰謀中傷，造謠誣蔑，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舉不勝舉。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覲然以『天才』與『作家』自命，偷竊他人唾餘，還沾沾自喜的種種怪象，也是『無

醜不備有惡皆臻，『對着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們還能夠否認『文人無行』這句話的相當真實嗎？（自然，我也並不是說凡文人皆無行。）我們能不興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嗎？

自然，我這樣的感觸並不是毫沒來由的。舉實事來說，過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與『打打麻將』等屁話來實行其所謂『詞的解放』，被人斥為『輕薄少年』與『色情狂的急色兒』。曾某卻嘮嘮叨叨辯個不休，現在呢，新的事實又證明了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萬秋的名字爲自己吹牛（見二月崔在本報所登廣告，）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個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於小報，指他的朋友爲×××，並公佈其住址，把朋友公開出賣（見第五號中外書報新聞。）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陰毒，這樣的無聊，實在使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卻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當不

能不佩服曾某的大無畏的精神。

聽說曾某年紀還不大，也並不是沒有讀書的機會，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種吹牛拍馬的精力和那種陰毒機巧的心思用到求實學一點上，所得不是要多些嗎？然而曾某卻偏要日以吹拍爲事，日以造謠中傷爲事，這一方面固愈足以顯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見青年自誤之可惜。

不過，話說回頭，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專寫三角戀愛小說出名，並發了財的張××，彼固動輒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嘯，完全一副滿懷毒恨的『棄婦』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甯，簡直想要置你於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惡辣，可說空前絕後，這樣看來，高等教育又有何用？還有新出版之某無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內山書店小坐記一文，公然說某人常到內山書店，曾請內山書店救過命保過險。我想，這種公開告密的勾當，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樣。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造謠中傷，怎樣陰謀陷害，明眼人一見便知，害人不着，不過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的卑污與無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對於這班醜類，實在不應當像現在一樣，始終置之不理，而應當振臂奮起，把牠們驅逐於文壇以外，應當在污穢不堪的中國文壇，做一番掃除的工作！

于是禍水就又引到自由談上去，在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便看見一則啓事，是方寸大字的標名——

張資平啓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後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壞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於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

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於『造謠偽造信件及對於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皆爲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爲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誣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願意投稿。但對於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爲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覆，特此申明。

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對於自由談編輯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也登出相對的啓事來——

黎烈文啓事

烈文去歲游歐歸來，客居滬上，因申報總理史量才先生係世交長輩，故常往訪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過任何黨派，且留歐時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館

編輯自由談。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因烈文停登其長篇小說，懷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謠誣衊，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與目的過於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置答，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啓事，含沙射影，肆意誣毀，其中有『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啓事既係對自由談而發，而烈文現爲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釋羣疑。烈文只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據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既無一人嫁人爲妾，亦無一人得與『大商人』結婚，張某之言，或係一種由衷的遺憾（沒有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的遺憾），或另有所指，或係一種病的發作，有如瘋犬之狂吠，則非烈文所知耳。

此後還有幾個啓事，避煩不再剪貼了。總之較關緊要的問題，是『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者是誰？但這事須問『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漢張資平本人纔知道。

可是中國真也還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歲小農居』這

洋樓底下去請教他了。『訪問記』登在中外書報新聞的第七號（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關於『爲妾』問題等的一段——

（四）啓事中的疑問

以上這些話還祇是講刊登及轉載的經過，接着，我便請他解答啓事中的幾個疑問。

『對於你的啓事中，有許多話，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讓我問一問？』
『是那幾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這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影射？』

『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過順便在啓事中，另外指一個人。』

『那個人是誰呢？』

『那不能公開。』自然他既然說了不能公開的話，也就不便追問了。

『還有一點，你所謂「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

表，」這又何所指？」

『那是講我在文藝以外的政治見解的東西，隨筆一類的東西。』

『是不是像新時代上的「望歲小農居日記」一樣的東西呢？」（參看新

時代七月號）我插問。

『那是對於魯迅的批評，我所說的是對政治的見解，文藝座談上面有。』（參

看文藝座談一卷一期從早上到下午。）

『對於魯迅的什麼批評？』

『這是題外的事情了，我看關於這個，請你還是不發表好了。』

這真是『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寥寥幾筆，就畫出了這位文學家的嘴臉。社會新

聞說他『關儒』固然意在博得社會上『濟弱扶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啓事上的自白，卻也須照中國文學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內山書店小坐，』一定又會從老板口頭聽到，）因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後，也就說『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雖然『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而無奈『還是不發表好了』

何但既然『還是不發表好了，』則關於我的一筆，我也就不再深論了。

一枝筆不能兼寫兩件事，以前我實在閑卻了文藝座談的座主，『解放詞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寫起來卻又很簡單，他除了『準備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藝。

崔萬秋先生和這位詞人，原先是相識的，只爲了一點小糾葛，他便匿名向小報投稿，誣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萬秋先生的手裏，製成銅版，在中外書報新聞（五號）上精印了出來——

崔萬秋加入國家主義派

大晚報屁股編輯崔萬秋自日回國，即住在愚園坊六十八號左舜生家，旋即由左與王造時介紹於大晚報工作。近爲國家主義及廣東方面宣傳極力，夜則留連於舞場或八仙橋莊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來是很容易的。而同時又診出了一點小毛病，是這位詞人曾

經用了崔萬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詩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裏又大稱贊了一通自己的詩。輕恙重症，同時夾攻，漸使這柔嫩的詩人兼詞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時事新報（七月十日）上卻又是一個啓事，好像這時的文壇是入了『啓事時代』似的——

曾今可啓事

鄙人不日離滬旅行，且將脫離文字生活。以後對於別人對我造謠誣蔑，一概置之不理。這年頭，只許強者打，不許弱者叫，我自然沒有什麼話可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反抗，我將在英雄們勝利的笑聲中悄悄地離開這文壇。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當他是尊我爲『英雄』。此啓。

這就完了。但我以爲文字是有趣的，結末兩句，尤爲出色。

我剪貼在上面的『談「文人無行」』其實就是這會張兩案的合論。但由我看來，這事件卻還要壞一點，便也做了一點短評，投給『自由談』。久而久之，不見登出，索回原

稿，油墨手印滿紙，這便是曾經排過，又被誰抽掉了的證據，可見縱「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資本家的出版者」也還是爲這一類名公「後援」的。但也許因爲恐怕得罪名公，就會立刻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爲性命計，不如不登的也難說。現在就抄在這里罷——

駁「文人無行」

「文人」這一塊大招牌，是極容易騙人的。雖在現在，社會上的輕賤文人，實在還不如所謂「文人」的自輕自賤之甚。看見只要是「人」，就決不肯做的事情，論者還不過說他「無行」，解爲「瘋人」，恕其「可憐」。其實他們卻原是販子，也一向聰明絕頂，以前的種種，無非「生意經」，現在的種種，也並不是「無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雖是極低劣的三角戀愛小說，也可以賣掉一批的。我們在夜裏走過馬路邊，常常會遇見小癩三從暗中來，鬼鬼祟祟的問道：

『阿要春宮？阿要春宮？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生意也並不清淡。上當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鄉下人。然而這至多也不過四五回，他們看過幾套，就覺得討厭，甚且要作嘔了，無論你『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也無效。而且因時勢的遷移，讀書界也起了變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這樣的東西了；一部份是簡直去跳舞，去嫖妓，因為所化的錢，比買手淫小說全集還便宜。這就使三角家之類覺得沒落。我們不要以為造成了洋房，人就會滿足的，每一個兒子，至少還得給他賺下十萬塊錢呢。

于是乎暴躁起來。然而三角上面，是沒有出路了的。于是勾結一批同類，開茶會，辦小報，造謠言，其甚者還竟至于賣朋友，好像他們的鴻篇鉅製的不再有人賞識，只是因為有幾個人用一手掩盡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誤解，以為他真在這樣想。他是聰明絕頂，其實並不在這樣想的，現在這副嘴臉，也還是一種『生意經』，用三角鑽出來的活路。總而言之，就是現在只好經營這一種買賣，才又可以賺些錢。

譬如說罷，有些「第三種人」也曾做過「革命文學家」，藉此開張書店，吞過郭沫若的許多版稅，現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還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裝飾的。此刻那里還能做這樣的生意呢？此刻要合夥攻擊左翼，並且造謠陷害了知道他們的行爲的人，自己才是一個乾淨剛直的作者，而況告密式的投稿，還可以大賺一注錢呢。

先前的手淫小說，還是下部的勾當，但此路已經不通，必須上進才是，而人們——尤其是他的舊相識——的頭顱就危險了。這那里是單單的「無行」文人所能做得出來的？

上文所說，有幾處自然好像帶着了會今可、張資平這一流，但以前的「腰斬張資平」卻的確不是我的意見。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簡單：我腦子裏不要三角四角的這許多角。倘有青年來問我可看與否，我是勸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簡單：他腦子裏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許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費，出版賣錢，即使他無須養活老婆兒子，我也滿不管，理由也很簡單：我是從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許

多角的。

然而多角之輩，竟謂我策動『腰斬張資平。』既謂矣，我乃簡直以X光照其五臟六腑了。

『後記』這回本來也真可以完結了，但且住，還有一點餘興的餘興。因為剪下的材料中，還留着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極爲可惜的，所以特地將牠保存在這里。

這篇文章載在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的火炬裏——

新儒林外史

柳絲

第一回 揭旗紮空營 興師佈迷陣

卻說卡爾和伊理基兩人這日正在天堂以上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忽見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面，殺氣騰騰，塵沙瀰漫，左翼防區裏面，一位老將緊追一位小將，戰鼓震天，喊聲四起，忽然那位老將牙縫開處，吐出一道白霧，卡爾聞到

氣味立刻暈倒，伊理基拍案大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爾趕快走開去了。原來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區裏頭，近來新紮一座空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無產階級文藝營壘受了奸人挑撥，大興問罪之師。這日大軍壓境，新紮空營的主將兼官佐又兼士兵楊邨人提起筆槍，躍馬相迎，只見得戰鼓震天，喊聲四起，爲首先鋒揚刀躍馬而來，乃老將魯迅是也。那楊邨人打拱，叫聲『老將軍別來無恙？』老將魯迅並不答話，躍馬直衝揚刀便刺，那楊邨人筆槍擋住又道：『老將有話好講，何必動起干戈？小將別樹一幟，自紮空營，只因事起倉卒，未及呈請指揮，並非倒戈相向，實則獨當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鑒。老將軍試思左翼諸將，空言克服，驕盈自滿，戰術既不研究，武器又不製造。臨陣則軍容不整，出馬則拖槍而逃，如果長此以往，何以維持威信？老將軍整頓紀綱之不暇，勞師遠征，竊以爲大大對不起革命羣衆的呵！』老將魯迅又不答話，圓睜環眼，倒豎虎鬚，只見得從他的牙縫裏頭噓出一道白霧，那小將楊邨人知道老將放出毒瓦斯，說的遲那時快，已經將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

無理講，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將究竟能不能將毒瓦斯悶死那小將，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編輯者的信，大意說：茲有署名柳絲者（『先生讀其文之內容或不難想像其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題為『新儒林外史』，但並無傷及個人名譽之事，業已決定為之發表，倘有反駁文章，亦可登載云云。使刊物暫時化為戰場，熱鬧一通，是辦報人的一種極普通辦法，近來我更加『世故』，天氣又這麼熱，當然不會去流汗同翻筋斗的。況且『反駁』滑稽文章，也是一種少有的奇事，即使『傷及個人名譽事』，我也沒有辦法，除非我也作一部『舊儒林外史』來辯明『卡爾和伊理基』的話的真假。但我並不是巫師，又怎麼看得見『天堂』、『柳絲』是楊邨人先生還在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者』時候已經用起的筆名，這無須看內容就知道，而曾幾何時，就在『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子下做着這樣的幻夢，將自己寫成了這麼一副形容了。時代的巨輪，真是能够這麼冷酷地將人們輾碎的。但也幸而有這一輾，因為韓侍桁先生倒因此從這位『小將』的腔子裏看見了『良心』了。

這作品只是第一回，當然沒有完，我雖然毫不想『反駁』，卻也願意看看這有『良心』的文學，不料從此就不見了，迄今已有月餘，聽不到『卡爾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將』『小將』在地獄裏的消息。但據社會新聞（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說，則又是『左聯』阻止的——

楊村人轉入A B團

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鬥之旗的楊村人，近已由漢來滬，聞寄居於A B團小卒徐翔之家，並已加入該團活動矣。前在大晚報署名柳絲所發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楊手筆，內對魯迅大加諷刺，但未完即止，聞因受左聯警告云。

〔預〕

左聯會這麼看重一篇『諷刺』的東西，而且仍會給『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鬥之旗的楊村人』以『警告』，這才真是一件奇事。據有些人說，『第三種人』的『忠實于自己的藝術』是已經因了左翼理論家的凶惡的批評而寫不出來了，現在這『小資

『產戰』的英雄，又因了左聯的警告而不再『戰』，我想，再過幾時，則一切割地吞款，兵禍水災，古物失蹤，鬧人生病，也要都成爲左聯之罪，尤其是魯迅之罪了。

現在使我記起了蔣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過去，恐怕有四五年了，當蔣光慈先生組織太陽社和創造社聯盟，率領『小將』來圍剿我的時候，他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幾句，大意是說，魯迅向來未曾受人攻擊，自以爲不可一世，現在要給他知道知道了。其實這是錯誤的，我自作評論以來，即無時不受攻擊，即如這三月中，僅僅關於自由談的，就已有這許多篇，而且我所收錄的，還不過一部份。先前何嘗不如此呢，但牠們都與如駛的流光一同消逝，無蹤無影，不再爲別人所覺察罷了。這回趁幾種刊物還在手頭，便轉載一部份到『後記』裏，這其實也並非專爲我自己，戰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對於別人的攻擊，想來也還要用這一類的方法，但自然要改變了所攻擊的人名。將來的戰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白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的。

所引的文字中，我以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學者』。但他們現在是另一個筆名，另一副嘴臉了。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家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藉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發現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難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沈默，壞就成爲叭兒的。這不是我的『毒瓦斯』，這是彼此看見的事實！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記。

魯迅全集

第四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總經售兼印刷者：作 家 書 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封
底